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胡子昂钢铁巨擘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钢铁巨擘

本书以一个世纪的历史画卷为背景，以传神生动的笔触，着力展示我国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政治活动家胡子昂傲骨铮铮、光明磊落的传奇生涯：在北京求，发动“改大”、驱逐校运动，震惊朝野；毕业后不到两年即由中学教员升任重庆市教育局局长，却发动教育界奋起驱逐省教育厅长；后入军阀文辉部策划通电反蒋，险遭杀身之祸；担任陪都参议长时，又与国民党当局大唱反调，三呼和平，再次险遭不测；解放战争胜利前夕，爱党派只身闯入虎穴策反，有通有谋；新中国成立伊始，即将所有企业股票及房产无偿交给国家……

他的独特经历，引起了赫鲁晓夫极大兴趣！

作者简介

赵建国，1962 年生于安徽肥西乡下，1980 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84 年毕业，从军，当过教员、参谋、干事。1991 年又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就读，1993 年毕业，现为总参某部宣传科副科长，少校军衔。经老加笔名发小说，先后在《解放军文艺》、《昆仑》、《上海文学》、《清明》《大家》等军内外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 50 余万字，创作（或与朋友合著）其他体裁文学作品近百万字。

胡子昂钢铁巨擘

第1章 挥斥方遒

贫寒少年的梦想

奔腾不息的长江水一泻千里。

一叶年深月久的小木船，就在这奔腾不息、一泻千里的长江之水中颠簸、漂浮，顺水而下。

小木船的船头上，站着一位身材挺拔、面容俊秀的青年，他高昂着头，双眉紧锁着，任凭强劲的江风撩着他浓密的中分式长发，撩着他罩在烟色马甲下的青布长衫。

高耸的江岸上，虬曲的松树缀布在一片衰黄的草丛中，不时有猿啼鹰飞，嗜鱼的鸟儿一阵阵成群结队掠过江面。清凛凛的阳光从两岸的峭壁上扑洒下来，使江水有如银练似的，既遒劲又飘逸。

这是 1919 年，即后来成为中国划时代的那个伟大年度的初春，天气尚带着料峭的寒意。

站在船头的青年叫胡鹤如，也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为重庆商界奇才、政界黑马的胡子昂。

这一年，他 22 岁，正是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年纪。

胡鹤如的名字是父亲给他起的，由此可见父亲对他寄予一片厚望，希望他如鹤一样清高自洁，卓尔不凡。子昂则是他的字，后来他的字被叫开了，倒把本名给忘了。

此刻，他的心，早随着这一江春水，奔腾而去。

他无法不激动。

因为他将要去的是他心仪已久的首都北平。就要告别这生他养他的巴山蜀水了，告别那个与繁华山城仅一江之隔的家乡小镇南坪场！遥远的古都北平，即将开始的求学读书生涯对于他来说，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是，围绕着这次赴京求学所发生的一切，却让他心情难以平静，难以释怀。

为了这一趟远行，他筹划已久。

子昂在家居七兄妹之长。父亲胡幹丞是清末的入学补廪，家中有承继祖业的 27 石 5 斗租的田地，父亲还要以教书为业，才能维持这个清贫的家境。因此，父亲对他寄予厚望。自小，父亲就教导他要好好读书，在经史古籍中寻求为官致富之路。

父亲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父亲的话，二伯父胡型芝的金榜题名，恰好作了个很好的注脚。

对于少年子昂来说，刻骨铭心的一件事，就是二伯父那次衣锦还乡。

那一年，子昂随父亲送二伯父赴京赶考。站在铜元局渡口，子昂看着身穿长袍马褂、一根长辫搭在腊染布包袱上的二伯父。

由于长期闭门读书，作八股文章，子昂看见二伯父脸呈菜色，立在小小的渡船上，犹如瘦竹临风。他的心随着二伯父的小船飘向巴蜀以外的世界。

不想半年多之后，二伯父金榜题名，高中解元。那是举人考试第一的荣耀角色，是读书人梦寐以求的境界，也是官职财富的保证。

当巴县衙门敲锣打鼓把喜报送上家门的时候，整个南坪场都轰动了。而二伯父更是得意，一口气做了 20 余块金字木牌，以“钦赐解元”四个金字牌为前引，自己披红戴花，前面鸣锣开道，后面鞭炮齐鸣，前呼后拥，上坟

祭祖。往后数日，二伯父的家宅屋檐，大红灯笼高挂，高朋满座，宾客如云。二伯父又大修祠堂，在落成的那天，连着请名戏班子唱戏三天，酬谢宾客。此一举，不仅南坪场轰动，整个巴县亦为之轰动。

而最受震撼的，却是少年子昂的心。

他的眼里，闪着熠熠的光。他暗暗立下誓言，要发奋读书，求取功名，光宗耀祖，光耀门庭。

然而，在本世纪初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他的这一宏图大志，是注定难以实现的。

更因为，他还有一个不安分的心灵。

14岁那年，他刚上中学，就开始不守清规戒律，带头在学校“闹事”。这种情状一直贯穿着他整个青少年时代，从中学到大学到工作，从巴县到北平，直至重回巴蜀。

子昂14岁由巴县小学提前一年进入巴县中学，并被任命为新班班长。

那时巴县中学只有两个班，另一个老生班的班长是他的堂兄胡云汉。两人都是少年早慧，课余常在一起谈论学业，畅想未来。

这一日，两人坐在校园里的一株黄桷树下的青石板凳子上，谈起英文老师曾小桐，均有不满之辞。

子昂说：“这个曾小桐，实是可恶。都什么年代了，还用体罚的方式惩罚学生，提问稍回答不出，就用教鞭扣击手心，或是罚站整整半天。”

云汉道：“他哪里是教学，分明是刁难嘛。我们班的同学也都不喜欢他。”

子昂说：“既然是两个班所有的同学都不喜欢他，那就把他轰走好罗。”

云汉笑道：“这可不是在南坪场，也不像你父亲开的马家店小学，要他走，他不敢不走。”

子昂觉着也对，想了一下，又说：“可以想个办法嘛，比如，他曾小桐上课，咱们都不去，他还上啥子课哟？”

胡云汉当即抚掌大笑道：“要得，要得！这叫罢课。明天咱就不上曾小桐的课，咱们分头去做班上同学的工作。”

第二天上午第三节是新生班的英文课，全班教室空无一人。

第四节是老生班的课，教室同样是空空如也。

英文教员曾小桐自知学生对自己成见颇深，这次罢课是冲着自己来的，于是便去找校长文伯鲁。

文先生身材瘦高，满腹诗书，是巴县的名士，在学生中声望很高。他是从巴县小学的国文教员直接调任巴县中学校长的，以治学严谨闻名巴县。

文校长闻报大怒，拍案道：“这还了得！小小年纪不好好读书，倒学会造反了。给我把两个班长找来问话。”

胡云汉、胡子昂双双立在校长室，垂手听训。

文先生道：“古人有云：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我毕生致力于教学，只闻师道尊严，没听说过教师严之有错。既然你们不想在此上课，那你们可以背上书包，走罗！”

胡子昂向前急迈一步，分辩道：“我们不是不想上课，只是不想上曾小桐这样老师的课……”

文先生挥挥手，斥道：“退下！回去听从发落。”

次日巴县中学张榜公告，云：……学生班长胡云汉等人无心学业，带头滋事，为首胡云汉开除学籍。新班学生亦有附和，姑念为新招，从宽免咎……

堂兄弟两人又来到黄桷树下。此时，满院的花依然开得很欢，异香扑鼻，只是二人的心境与前次已大不相同。同是班长，云汉独当错责，自己得留校，因此子昂的心中便多了些愧怍。子昂执着堂兄的手，久久无语。

胡云汉明了他的心思，安慰道：“你留下来是好事。文先生是很想培植一批优秀学生的，他在巴小的时候就很器重你，这次对你，也算是手下留情了。好好读书吧，别忘了我们的约定：一定要出人头地，好好干一番事业。”

子昂点点头，含泪问道：“不知兄今后将作何打算？”

云汉说：“我要去北京。那里才是我们读书人大有作为的天地。”

后来胡云汉果然去了北京，进了法政专门学校。他给堂弟的信中满怀深情地写道：“夜发青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洲……来京以后，方知巴山以外的天有多宽，地有多广，人的心有多大。盼弟将来亦能来京读书求学，谋求发展。”

这些话，深深地烙在少年子昂的心里。

不久辛亥革命爆发，统治着中国几千年的王朝制度，就这样覆水舟沉。

胡子昂是巴县最早剪去辫子的人之一。他像革命党人那样留起了中分头，这使他看上去格外青春、俊气。

他在给胡云汉的信中激情昂扬地写道：

……革命已然爆发，兄在京都，想必更是感触良深。在渝有同盟会会员杨沧白、朱叔痴等同志，组织领导学生结队上街游行，一同宣传。兄知弟乃向往革命之人，自然亦是满腔热情参加，走上街头，振臂高呼！

十月初二日，绅商学界各同胞，振精神，国旗高竖，一望入云霄，民国根基万古牢！……

辛亥革命对于胡子昂内心的冲击，由此可见一斑。

胡子昂把对于革命的热情以及革命所带给他的种种兴奋与激动，都化作对于学业的勤奋努力。因为他知道，民国既已成立，天下大约就该太平了，因此作为个人就该趁年轻多学点真本事，将来好为国家建设多作些贡献。故对少年子昂来说，外面的世界愈热闹，他读书愈勤奋。

在巴县中学读书四年，子昂始终是文校长最得意的门生。每学期考试总是名列前茅，不是第一，便是第二，从没有下过第彼时，政府为鼓励学习，成绩前三名的都是官费。子昂乃节俭之人，心地又极善良，他的奖学金所得，除了自给，还长期资助一位叫唐及甫的比他更为贫寒的农家子弟。

1916年，子昂中学毕业，赴当时的省府所在地成都，以成绩第一考入成都农业专门学校，又获官费资助。

光阴荏苒，子昂在成都农校闭门读书，一晃便是数月。

1917年4月的一天，子昂等人正在教室上课，忽闻街上枪声大作。先是零散如星，继而密集如豆，渐渐的，离农校越来越近了。

这一节早园苑学课。授课的是一位方姓的中年教员，他翘着兰花指，扶着金边眼镜，静静的站在讲台上，和学生一道倾听着枪声、杂乱的脚步声、口令和吵嚷声卷进平时寂静的校园。良久，叹了口气，合上书页，自语道：

“打起来了。这川军和滇军，终于又打起来了……”

说着，慢条斯理的收起课本教案，夹到腋下，向着大家挥了一下手，道：“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大家各自逃命吧！”

随后一个箭步，跃下讲台，冲出教室，消失在校园里的常青灌林丛中，无影无踪了。

胡子昂抄一条近道从后门跑出农校，回头一看，只有平时要好的胡文渊、

涂仿欧两位重庆同乡跟在身后。三人站在马路上，茫然四顾，皆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迎面过来几个背枪的士兵，从他们说话的口音听出是云南人。这才知道，学校是被滇军给占领了。

滇军是在蔡锷将军发动的第一次护国战争中由云南入川的。护国战争结束后，入川护国军的滇军总司令罗佩金和黔军总司令戴戡，分别当上了四川的督军和省长。

罗佩金是云南军阀唐继尧的部属。而唐继尧暗存独占四川之心久焉，这一点，当时川军驻扎成都实力又较雄厚的一军军长刘存厚是不可能不知道的，而他所代表的四川地方势力，显然也不可能容忍滇军久居成都，对川军形成威胁之势。如此，川滇之战，不可避免的就发生了。

川滇军阀混战是本世纪初中国军事舞台大混乱、大混战的一个侧面，而无数的无辜百姓在这场混战中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如胡子昂这样能在枪口下逃得性命的，算是走运的了。

惊魂甫定，胡文渊同学说：“铺盖卷都丢在学校里了，我身上是一文钱都没有，这以后可如何是好？”

涂仿欧也说：“学校是回不去了。而且我身上本来就没钱，前些日子捎信让家里寄些钱款来，到现在也没有回音，这可咋办罗？”

胡子昂在身上摸索了半天，找出百来文铜元，掬在手心，对胡、涂二人说：“我也就只剩下这一笔糊涂帐了。”

二人不禁苦笑，糊（胡）涂帐本是他们同学之间常开的玩笑话。不过胡、涂二人倒是对子昂同学在这种时候还能幽他们一默，心里暗暗敬佩，当下请这位班上的高材生拿主意。胡子昂说：“还能怎么办，先回重庆，再作打算吧。”

二人仍是愁肠百结，道：“可你这点钱，也只够三五顿饭钱啊。”

胡子昂说：“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你们就放心跟我走吧。”

三人徒步出了成都市区，来到涪江岸边，寻到了一条装运木柴的小船。胡子昂找到船老板，凭着他的这一副伶牙利齿，极力渲染了这次落荒而逃的种种惊险之处，保证到重庆后付给全部船费，恳请捎他们一程。船老板倒也义气，见他们一介书生，也实在别无他法，便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三人于是上了船，顺江而下。

此时正是下午，大半天没有吃饭了，腹中早已是饥肠如鼓。1917年4月的涪江，一片青山绿水，风光无限。但他们哪还有欣赏景物的这一份闲情雅致，都把全部精力用在对付饥饿上了。

子昂平时读书颇多，又出身书香之家，当时社会上还不大多见的《三国》、《水浒》、《石头记》（《红楼梦》）等明清小说，颇有涉猎。此时，为了转移大家的注意力，便捡了平时最喜欢的红楼故事，说给胡、涂二人听。从宝玉衔玉而生，直说到黛玉泣血葬花，不仅说得胡、涂两学子如痴如醉，就连那船上摇橹的船工粗人也听得唏嘘不已。

船老板抹了一把鼻子，对胡子昂竖起大拇指，连连说：“这位公子要是在茶坊说书，生意一定了得哟！”

一句话指出了迷津：何不靠知识吃饭？就去说书，好挣一顿饭钱。

第二天，船靠码头，三人下船，说妥了由胡子昂去茶馆说书挣钱。毕竟未曾做过这份营生，心中发怯，找了一家客人少些的馆子，找到茶馆老板说

明来意，老板倒是十分欢迎如他们这样的人为他招徕顾客。他们捡了个靠墙的角度，刚坐下来，胡文渊、涂欧仿便开始一边一脚踢胡子昂的脚。胡子昂无奈，只得红着脸，清了半天嗓子，终于开了口。

第一次说的是一段《三国》，因初上场，没有经验，加之又是人们已经烂熟于心的桃园三结义，故而听众不多，得钱也少。但是，这一开了头，胡子昂便渐入佳境，情况有了很大好转，听众扔钱很是踊跃。

三人一路靠子昂说书吃饭，居然还吃得可以，偶尔还能请仗义的船老板吃一盘辣子鸡，就着两岸的风光，饮一壶辣辣的老白干酒……

船就要进入三峡了。

胡子昂依然立在船头。想起那次成都历险，由乐山到宜宾，沿长江又回重庆一路说评书的经历，他的嘴角不禁浮起一丝笑意。

人也许就是这样。他想，许多事，意想不到的事，以为不会做的事，若为情势所迫，都会做了，而且还能做得不惜。

1917年4月由成都回重庆后，胡子昂的学业被打断了。父亲忧心忡忡，不忍长子的美好前程就此半途而废，问子昂今后的打算。子昂说：“我想眼下先去学校教书，积存点钱。”

父亲又问：“然后呢？”

子昂答道：“然后去北平，上大学。”

北平是胡子昂青年时代的梦想。

父亲默然颌首。他知道儿子的心思，他知道儿子心比天高，是绝不会在南坪这样的小地方默默无闻度过一生的。恰好舅父刘衡仿来看他，子昂便把自己的心思说给舅父听，舅父便说：“那你就到我的学校来教书吧。”

舅父刘衡仿亦是高等学校毕业，此时在巴县的木洞小学任校长。就这样，子昂夹着一个小包袱，只身来到远离南坪的那个叫木洞的小学，做了孩子王。月薪20余元。

那时的胡子昂，心情是宁静的。

过着清贫的教员生活。每日，有辣辣的泡菜、稀饭、馍填饱肚子即可，用他那微薄的薪水，积攒着他那个大大的梦。放学之后，大石块垒成的校舍变得异常空旷，他便捧了厚厚的书卷，坐在校门口的场地上，静静地读。偶尔会抬起头，放眼满目的青山、巨石、飞鸟，心尝试着飞往大山以外的地方。只在节假日，买些当地母亲爱吃的风味点心，回家看看双亲。

教书不到两年，居然存了200多元。

眼看着高校招生的准备工作又要开始了，子昂在木洞小学终于呆不住了，他想自己与世隔绝太久了，再呆下去，自己就会变成这大山里的一块石头了。于是，他跟舅父辞了教职，回到南坪的家里。

怀里揣着200多块钱，他知道，这远远不够远赴北平求学的费用。无奈之下，便去求助大伯父。

大伯父叫胡仙庭，在南坪镇上开了个山货庄，几年后，山货庄变成了庆源洋行，拥有家资银元几十万两。其实，胡家的人都知道，那是他勾结洋商经营烟土赚来的黑心钱。

子昂穿过深深的庭院来找大伯父的时候，胡仙庭正躺在桃心木架子床上抽大烟。等他过足了烟瘾，才拖着长腔问子昂：“子娃子呀，你来啥事嘛？”

胡子昂答道：“大伯父，我想去北平读书，可是身上的钱不，不太够……”

“要钱？”大伯父的脸上明显掠过不悦之色。

“不，是借。”子昂强调说，“我会还你的。”

大伯父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用手里的烟枪点着胡子昂数落道：“我没听说过一个人一定要读书，而且还要到北平读书，才有出息。你瞧你大伯父我，没读过几天书，斗大的字识不过一箩，不是也做生意发了财吗？北平你就不要去罗，就在我这里当个算徒，记个帐，慢慢也能混出个人样来的……”

没等大伯父把话说完，胡子昂扭头就走。他气得满脸通红，离开了庆源洋行。

回到家，正自生气，大伯父却又派了个小学徒送来了 50 块钱，说是送给他做盘缠。胡子昂断然拒绝，并对庆源洋行的小学徒说：“请转告大伯父，人穷不一定志短。还有，鸦片是毒害、蚀杀国民的毒物，这种生意是做不得的。”

父亲嘉许地点点头，对子昂说：“找他这种人借钱，简直是与虎谋皮。你是对的，人要活得有骨气。”

就这样，胡子昂搭上亲戚家的一条小木船，独自踏上了东出巴川、北上求学之路……

看见夔门了。

这正是 1919 年初春水枯的季节，一座巨大的礁石轰然出水，高高耸立在夔门峡口，犹如出水猛兽，横卧江心，紧锁夔门。

这就是“群龙翻地轴，一象塞天门”的夔门滟预堆吗？子昂面向着巨石，想象着夏秋洪汛季节到来的时候，它隐于江底，宛如水下蛟龙，激起浪漩千重，狂浪万卷，回水西流，涛声如雷的情景，心中不禁更加豪情万种，气贯长虹。

接下来便是诗城白帝城了。

胡子昂眺望着那青葱苍郁坠翡滴翠的白帝山，那红墙彩亭的白帝庙，怀想着古人的动人事迹，脱口吟诵出李白那首已流传千古的名诗：

朝辞白帝彩云间，
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
轻舟已过万重山。

青年子昂正诗意盎然，不想前途险象重生。

忽然，风乍起，白浪高卷，扑向这江心中孤零零无援无助的小木船。顿时，水涌船舱，可怜那几箱衣物，尽被江水浸透。

随后更是历尽艰险，才抵宜昌。

在宜昌换船，驶至汉口，然后转车去北平。

1919 年初春一个艳阳高照的日子，胡子昂终于看到了紫禁城。

那一堵堵高不可攀的朱色墙壁，那一片片看上去辉煌夺目的琉璃瓦，便是历代皇帝的龙蟠虎踞之地吗？越过这些堂皇的宫殿，胡子昂更清楚的看见了那满街飞奔的轿车、马车、黄包车，看见高大的洋人傲立在缩着脖子叫卖冰糖葫芦、卤煮火烧、牛肚羊杂的灰色百姓之中，看见了连绵不绝的黑色平房四合院和被大脚板踩得凹凸不平的青砖道路……

胡子昂看到的是一个已然破败的北平。

他感到有些失望。因为这不是他想象中的首都。

一介书生惊朝野

1920年，深秋。北平。

出阜成门，由望海楼往西，连着钓鱼台、罗道庄、蔡公庄，是一片广阔的原野，著名的京城八校之一的北平农业专门学校就座落在这里。

是下午自修的时间了，一位身穿灰布长衫，脖子围一条白色围巾的青年学子走出农校的拱形大门，他慢慢地走在郊外的道路上，欣赏着这荒野的景色。

深秋的北平，满眼是一片萧瑟的秋意。尤其是这京城郊外，早已是葑黄林枯，正是黄沙吹白杨，老树映残照，偶尔，会有一只野鹤从林中飞起，远处不时传来骆驼悠闲的铃声。

他就是胡子昂。

到北平已是一年多了。

这一年多来，胡子昂感到自己从内心到外在都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他已经是北平农业专门学校的一名莘莘学子了。而内心的变化，只有他自己知道。

这种变化是巨大的，从未有过的。

1919年的春天，他由重庆来北平之后，先是住在当法官的二伯父的家中，靠了他的介绍，进入崇德教会学校补习英语、数学，为报考大学作准备。

刚进入教会学校，五四运动就爆发了。这场带有革命性的大风暴，源起于北京学生反对北洋政府在列强控制的巴黎和会上签订丧权辱国的条款，工、商、学界一起奋起，迅即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反帝反封建、要民主要科学的巨大浪潮。这在青年子昂的内心里不能不掀起巨大的波澜。

胡子昂在教室里坐不住了，不顾校方的明令反对，约集了几个同学，也顾不得和其他学校联系，便跑到长安街，加入到工人学生的示威游行的行列。

当然，那时他还不知道什么叫革命，但是他真切地感觉到一种心灵的巨大撞击，感受到身体里血液的灼烫和奔涌。他感到祖国大地就如他的身体，已经开始苏醒，开始跳跃搏动，古老的中华民族出现了新生的希望。

他就是怀着这样的激情，于是年秋，考入了北京农业专门学校……

“鹤如，鹤如！”一位同学边跑边摇着手里的纸片，来找胡子昂。胡子昂这时的名字叫胡鹤如。“尹聘，什么事这么着急？”胡子昂问道。

尹聘是胡子昂的同学，也是志同道合的挚友，尹聘喘着气，激动他说：“鹤如，你起草的《国立北京农业专科学校全体学生请改建本校为农业大学意见书》，在同学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真的？”胡子昂也兴奋起来，“同学们怎么说？”

“大家都说，你这长达3000多字的‘改大’理由书，简直写得太好了！特别是这五个计：为改良农业计、为扩张农业教育计、为振兴实业计、为巩固国家根本计、为维持国家体面计，确实让人觉得‘不得不亟设农业大学’。还有这改大的条件，”尹聘翻了几页，念道：“本校地址广大，足敷农事实验之用。设备虽未完全，而扩充颇易。且本校又在首都，交通便利，四方同志咸可来校。故改大学，地不必增，费不需多，一旦扩充顿可改观。故改大学，尤以本校为最宜。”

胡子昂击掌道：“好！立即拿出去发表。”

1920年12月10、11日两天，《晨报》全文登载由胡子昂撰写的北京农专改大学《理由书》。

这就是由胡子昂发起的、轰动京城乃至全国的北农改大运动。

北京农专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农科、农科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农科大学。

1914年（民国3年），教育部下令将农科大学改为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归教育部直辖，学制三年。

1917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提出议案，要将大学组织进行根本改组，建议大学专文理科，其他附设的法、医、工、农、商专科别立为大学，得到广泛的支持。次年，教育部公布《修正大学校令》，使专门学校改组称大学有了正式的法律依据。但由于当时的形势正处于新文化运动以及五四运动的高潮，改大的事就被搁了下来。

胡子昂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北京，上了北京农业专门学校。

胡子昂一入学，正赶上国立八校（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美术学校）开展支援救亡的募捐活动，于是胡子昂热情洋溢地一头扎进了这些极富政治意义的社会活动中。

青年胡子昂容貌俊秀，声音宏亮，立即成了北农新剧团的台柱子。

北农新剧团在当时北京高校的舞台上曾经十分活跃，五四时期以一出《美人剑》誉满京城，当时的演出说明书作为革命历史文物至今仍保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为唤起民众，开展募捐，胡子昂等人自编自演话剧《鹊巢鸠居》。为扩大影响，胡子昂等人决定把这出话剧推向社会。

但是，在哪儿演，才能产生更好的影响呢？这是他们必须面对的第一个问题。

胡子昂找到了老师周建侯，合计了半宿，忽然脑子一亮，柳暗花明，去找国会议员蒲伯英。

一来，他的儿子蒲耀文和胡子昂是同学，二来，蒲伯英是四川人，前清解元，胡子昂可以和他拉这个关系。蒲伯英又曾任过北洋政府的内务部次长和北平市督办等职，在社会上很有些影响，而且，他对新文化运动又是比较支持的，因此如能取得蒲议员的支持，这个戏就算成功一半了。

胡子昂于是去蒲府，以老乡和晚生的名义登门造访。蒲议员对子昂很客气，当子昂说明来意后，蒲议员果然很热心，说了许多鼓励的话，并为他们联系到了新民大剧院作为演出场地，话剧《鹊巢鸠居》得以面向社会，公开演出。

那天晚上，新民大剧院座无虚席。大灯熄灭，胡子昂踩着追光灯走上前台，发表演讲，他振臂大声疾呼：“我们决不能做亡国奴，大家要齐心起来救国。”

一席简短讲话几次博得热烈掌声，反响十分强烈，第一次演出获得极大成功，收到的捐款超过以往的任何一次。

新生胡子昂也因此在北农成了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

次年，胡子昂又约集赖宪伯、郑昌明、胡继康等志同道合、热心于社会活动的同学，组织起农声社，创办了《新农业》杂志，致力于发展科学、改良农业技术、振救中华的宣传活动。活动经费由同学和部分教职员募集赞助。极力支持他们的是学校农科主任许璇和教师周建侯。这个杂志办了几期，后来由于主办人忙于干别的事，便停办了。

1920年4月20日，《晨报》首次披露“农校将改农大”的消息，称：“教育部以国立农业专门学校规模宏大，设备亦完善，拟改农业大学，以资

造就高深人才，日内可望提出国务会议讨论。”

农校的师生因此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然而，他们很快就失望了。好几个月过去了，政府毫无动静，倒是法政学校改大学已被提到议事日程。

专科改大学，不仅是名字上好听了，而且涉及编制、经费、学制及学生毕业后就业等诸多问题，因此，农校人感到不能再这样等待下去了，必须去争取。

其中最活跃的人物又是胡子昂。虽然他才刚入学不久，但却处处显示出一种领袖的风范。这年11月的21日，农校全体同学开会决定，成立大学促成会，胡子昂被推举为会长，由他负责起草有关文件，广为散发，目的是联络全国农业专家发表意见，取得支持。

于是，就有了开头的一幕。

12月中旬，胡子昂等人请来梁启超到农专发表演说，这位中国改良主义的先驱在演说中明确表态，支持农专“改大”。

梁启超的话无疑给胡子昂等一批学生激进分子以极大的鼓励。“鹤如，下一步怎么办？”正在兴头上的大学促成会的同学们，纷纷要会长胡子昂拿主意。

“找我们农专的创始人严修，”胡子昂沉思他说，“我想严修先生会支持我们的，而他在中国知识界是很有些说服力的。”

此时严修正在天津的家中养病。严修（1860—1929）先生是清末教育界的一位知名人物，1908年，担任过清廷的学部左侍郎，后因病免职；辛亥革命后的1914年，曾被任命为教育总长，但未就职。京师大学堂办农科，严修是决策者之一。因此，胡子昂要找严修，是很有道理的。

不久，胡子昂和尹聘三下天津，求见严修。第一次，严修因病不能接见，两人无功而返；第二次，胡子昂又登严府，严修依然卧在病榻，此时正是1920年的严冬，他患的又是哮喘，说话都很困难，只让家人收下了胡子昂带来的那份长达3000言的“农专改大理由书”。

胡子昂转而奔南开，约见南开大学校长张伯龄，征询张伯龄对于北京农专“改大”的意见。张伯龄回了一句话：“我认为如果条件成熟的话，专科‘改大’是可以的，这是趋势。”

虽然所指不明，能得到著名教育家、学者张伯龄这样的回答，胡子昂已经感到很满足了。

不几日，胡子昂三下天津，再度求见严修。

严修依然不能接见，但是他让他的儿子接待了胡子昂，严修之子说：“胡同学等人三度登门以求‘改大’之意见，家父深为感动。家父因抱病在身，不能亲见，让我转告说，他一向主张设农业大学，京师大学堂设农科时，家父曾亲自勘察校址。并说，有胡鹤如等诸位这样的同学，农业大学就有了莫大的希望。”

胡子昂高兴地返回北京。有了严修这样一段评语，胡子昂无疑是多了一份驱动力。

这一年，通过大学促成会的不懈努力，农专“改大”的运动已造成了广泛的舆论影响，得到教育界的同情和支持，国内外表示支持的来函不断，山东省教育会、湖北省教育会、黑龙江实业厅及日本鹿儿岛农林学校的中国留学生纷纷致函北京农专大学促成会或胡子昂本人，表示支持。

由此，胡子昂在北平农专掀起了第一个高潮。

正当胡子昂等人在为农专“改大”奔走呼吁并且有了眉目（教育部已经口头认可）的时候，北京教育界掀起了另一场风波：

1921年3月，北京国立八校校长在北大校长蔡元培的率领下，联名代表本校教职员，向北洋政府要求解决教育经费，速发欠款。因为从上年的11月起，北洋政府已经一连4个月没有向八校的教职员发薪了。

这件事越闹越大，先是八校长联名上书，到北洋政府请愿，八校罢课，到新华门请愿，与军方发生流血冲突，八校长两次集体总辞职——所有书生们能做的都做了，但北洋政府就是不予解决。

正在西南大学的陈独秀、汪精卫，闻讯后派人来京，表示愿将西南大学的经费充作八校经费，如政府不同意，则请八校辞职教员南下。

孙中山在广州也致电八校校长，要求“在非法政府之下，难望教育事业上之发展”，请相率南下。

这场风波直到7月24日，北洋政府派代表向教育界道歉而告结束。不过，政府并未履行解决经费的许诺，北京高校生存已经非常困难，胡子昂等专科“改大”的事业自然而然也就被搁置下来。

然而，不久之后，胡子昂和他的同学们，却又在农专掀起了另一个更大、影响更为深远的波澜。

1922年6月。北京农专。

黄昏时分，学校里刚刚开过晚饭。照理，这个时候，学生们应该是夹着书向教室里走去，准备复习迎接期末考试了。但是农专的教室却是空荡荡的，学生们无心学业，老师们也无心上课。校园里，大家总是三三两两一群，交头接耳，在议论着什么。有心的人能明显地感觉到，农专正在酝酿着一场风波。

山雨欲来风满楼。

胡子昂等一群刚放下饭盒的学生便匆匆来到校外的一片野地里，此时，他们的老师农科主任许璇、农化教授周建侯等已在河边等着他们了。

来的学生大多是农专大学促成会的成员，他们是学校里的一群活跃分子，是精英阶层。

他们在一片草地上坐下来，胡子昂首先发话，说：“大家都很清楚，两年来，农专师生一直在积极要求‘改大’，我们大学促成会通过努力，也在社会上取得了广泛的影响，得到了农学专家们的一致支持，可是，我们的要求却迟迟得不到教育部的批准。为什么？因为校长吴季青，他一再延宕，怕惹火上身，丢了乌纱帽；最近，我们又一次跟他要求，重新把‘改大，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下学期扩大招生。你们猜他怎么说？”

胡子昂扫了大家一眼，模仿农专校长吴季青的浙江口音说道：“这个嘛，没得商量。饭都吃不饱哩，还扩大招生？胡闹嘛。”

大家立即议论开了，历数校长吴季青自1920年担任校长以来，学校经费困难，每年不到10万元，学校得不到发展，有时计划订得头头是道，但实行起来却是虎头蛇尾；学校房屋如旧，没有什么增建；图书资料又很少，学生借书还要找教员借阅他们的私人藏书；教员人数不足，学生不过200人……发展如此缓慢，农专还有什么前途？

农科教务主任许璇摸着他漂亮的小胡子，慢条斯理他说道：“在农专，是任劳者获酬少，安闲者反得酬多。比如吧，我们专任教员报酬仅160元，

而教二三点钟点的国文兼职教员，居然得酬 220 元之多。”

周建侯老师也说：“学校里的教职员有不满情绪的确实很多，农场里也是这样的，在外面兼外差的农技师每月 80 元，而专任的才 30 多元。有不少教员就职不久，便离职他去了。这样的局面亟等改进。”

胡子昂说：“要改变目前的状况，办法只有一个：赶走吴季青。”

大学促成会的另一个活跃人物商承业说：“吴留学日本，又不是学农业的，不过是一政客，由他当校长，农专永远不会发展，‘改大’亦成空谈。”

驱逐校长吴季青的意见，很快在他们中间统一了。许璇老师说：“驱吴可也，但如无合适候补人选，驱吴必然不能成功。”

人群立即安静下来，因为这个问题太敏感了。其实，在此之前，他们也有过议论，但都没有统一意见。坐在许璇身边的一位同学首先打破沉默，道：“我提议由许璇先生接任校长之职。”

但是，马上又有同学提名另外的老师，有本校的老师，也有外校的农学名教授，其中，周建侯老师的呼声比较高。

其实，从胡子昂的内心来说，他是倾向于周建侯老师的，但他是大学促成会的会长，又是农专学生会的主席，不便过早表态，于是说：“关于校长人选的问题，我们稍后再议，目前，首先要把驱吴的声势造起来。今天就到这里吧，回头大家分头行动。”

此时天色已然黑了下來，四野里草色朦胧，树影婆娑，夜风沾着清露，空旷的四周蛙鼓蝉鸣响成一片。往回走的路上，农科主任许璇朗声吟道：“愿学为农意岂奢，田间风味足桑麻；未知锄月耕云里，可合桃源小住家。哈哈，这就是我的理想啊，我是没有多少想法的啊。”

此时，胡子昂正被一种斗争的热情激动着，所以听了这话，就不很舒服。

驱逐校长吴季青的声势，很快就在农专造成了。

10 月，闻风而来的《晨报》记者在给报馆的稿件中写道：“见到学生寄宿舍中，到处都是驱吴的匿名揭贴（大小字报），显示了农专学生对校长政绩的不满。”此后，《晨报》一直跟踪报道了北京农专驱吴运动的始终。

吴季青，浙江绍兴人，1903 年派往日本留学，是朝廷从京师大学堂速成科派往日本的 31 人之一，回国后于 1920 年 9 月接任农专金邦正的校长之职。

迫于舆论，吴季青于 10 月上旬向教育部提出辞职。教育部为暂时缓解矛盾，于 11 月 6 日发表第 31 号委任令，决定委任许璇暂行代理校长职务，批准吴季青病假半个月。

委任令公布后，农大的学生立即炸了窝。

这不是他们所要的结果。

胡子昂以学生会主席的名义，于 11 月 7 日下午召开全体学生的紧急会议，专题讨论对此委任的态度和对付办法。胡子昂在会上说：“教育部竟然用这种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来对付我们，对此公然蔑视民意之举，非极力反对不可。”

11 日，农专学生会呈文教育总长汤尔和，要求教育部立即收回成命，另选贤能，称许璇学识有所长，但才力为其所短，因此，与许先生愿做切磋之良师，不阅用其所短。

教育部对学生的意见搁置不批，这时，学校又盛传许璇正在加紧活动，以谋求正式升迁校长。

为此，学生会搞了一次民意调查，征求同学们对许璇担任正式校长的意见。结果，签名反对的 160 余人，占学生总数的 70% 强，仅一人投赞成票。

11 月 15 日中午，胡子昂等率几乎是农专的全体学生，步行入城，到教育部请愿。

事也凑巧，这一天，教育部职员也在罢工，结果谁也没见到。

几经周折，才找到教育部次长马叙伦，马告之教育部并没有要正式任命许璇，并表示一定要选一个学富才长之人当农校校长。学生的情绪稍有缓解。

不想不多的 11 月下旬，代理校长许璇正式行使他的职权，以整顿校风为名开除了两名学生代表。

学生方面针锋相对，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大会决议自 22 日起罢课，并提出三点要求：一、收回开除学生代表的成命；二、驱许出校；三、速委贤能校长。以上三条不得到圆满解决，誓不上课。

25 日，《晨报》刊登农专全体学生《启事》，称敝校农科主任许璇，居心险诈，学术陈腐，此次代理校长，我同学因其无能，曾一再呈部反对。许于是怀恨在心，滥施淫威，捏罪开除代表。

在启事签名的有左正元、胡鹤如（子昂）等 170 余人。

这时，校方一面派教员代表出面调停，一面致函教育部，表明对学生的强烈反对的态度。

11 月 27 日，《晨报》又登载以农校名义的启事，针对 25 日的学生启事说，系少数人所捏造。

随后，《晨报》不断刊登学生、教师的启事，头天说某人并无不满意许先生之辞，第二天马上就又有本人的启事，说，对于昨日启事不胜惊诧……类似的笔墨官司打得非常热闹。

11 月 30 日，农校职员开全体大会，决定全体辞职，并在《晨报》刊登上书校长和教育部的辞职宣言，说学生“近日骄纵愈甚，秩序荡然，同人等无法维持，弥深惭愧”，不得已全体辞职。

12 月 7 日，学生方面在《晨报》发表长达 1300 余字的《紧急宣言》，与教师宣言针锋相对。一方面强调驱许确系大多数同学的意见，另一方面，又趁此机会把“改大”问题，提了出来。

此时学校已近瘫痪，吴季青被迫辞职，已经久不到校；许璇在这场风潮中弄得十分狼狈，再三表示不愿代理校长职务，而且也是数周不到学校上课了；学生罢课，教员罢教，完全呈无人负责状态。胡子昂等学生会领导为了尽可能减少同学们的学习损失，组织各种团体活动以资补救，如学术研究团、农村讲演团、博物标本采集团，还组织了辩论会、新剧团等活动，并拟订计划请国内外名人来校讲演，“以暂救知识之饥饿”。

农专由驱吴风波发展为驱许风潮，由内部矛盾发展为在报纸上打笔墨官司，至此达到了顶峰。那些日子的《晨报》因此大出风头，非常好卖。

这是一场由校长问题引起的当时国内最突出的风潮。当时的报界称：“教育界最近的风潮，似以农专为最大。”

而胡子昂正是这次风潮站在风口浪尖上的人物。

就在《紧急宣言》发表的这一天，传来消息，说北洋政府要逮捕胡子昂这个闹事的头头。听到这个消息后，校学生会、大学促成会以及在促成会基础上成立的校务促进会（驱吴驱许组织）的同学们，聚在一起紧急商量对策，

大家感到事关重大，纷纷劝胡子昂去东交民巷外国租界躲一躲，胡子昂慨然说：“我们没有错，为什么要躲？况且在自己的国土上，还要去求庇外国人，这不是一种耻辱吗？”

尹聘等同学说：“子昂，不要意气用事，你还是躲一躲避开这个风头吧。因为我们的促成会还要活动，大家离不开你。这是大事。”

胡子昂无语。当天晚上，胡子昂在一大群同学的掩护下，出了农专的校门，住进了东交民巷的一家旅馆里。

与此同时，农专的同学和支持学生的老师们也在积极为胡子昂奔走呼号。一直坚定地站在学生一边的周建侯老师再一次想到了国会议员蒲伯英，于是周老师来到蒲府寻求援助。蒲议员对子昂的印象颇深，也一直在关注着农校事态的发展，当下慨然允诺。在国会上，蒲伯英慷慨陈词，批评当局抓人，迫使农校的学生躲起来，并指出，这样不但会让外国人笑话，还会激起更大的风潮。

北洋政府实在无计可施，终于向学生让步了。

1922年12月12日，教育部批准吴季青辞职。

同日，教育部发表训令，委任刚从欧洲回国不久的章士钊担任农校的校长。

12月14日，教育部再次下文，同意农专升格，改办大学。

从‘改大’到驱逐校长，北京农校一场历时两年之久、风波迭起、震惊朝野的学生风潮，到此，算是告一段落了。

胡子昂带着胜利者的喜悦，从东交民巷回到同学之中，受到热烈欢迎。同学们像欢迎凯旋的英雄一般，迎接他的归来。

12月21日，章士钊衔命至北农大就任校长之职。

这一上班，校方的人就找到胡子昂，说新任校长要找胡子昂谈话。同学都为他捏了一把汗，说：“新校长一定是想给你个下马威：你要想好对策。”

胡子昂说：“我胡鹤如做事光明正大，何惧之有。”

于是一路咚咚登上办公楼，敲开校长办公室的门，径直走了进去。

新任校长章士钊穿一身黑色马褂，梳着发亮的背头，上唇留一抹小胡子，显得儒雅而有风度。他端坐在朱漆办公桌的后面，金丝眼镜的后面，是一副傲然的眼神，他直直地盯着胡子昂，半天没说话。

胡子昂却并不发怯，开门见山地问道：“请问校长找我来，有什么事吗？”

章士钊挺身往椅背上一靠，这才慢腾腾地问道：“你就是胡鹤如？你很活跃啊，组织什么‘促成会’，想干什么？”

胡子昂当即答道：“我个人没有什么打算，只不过代表同学想把农专改为农大。农业是国家的根本，没有发达的农业，就吃不饱饭，就谈不上富国。将农专改农大，有利于发展农业科学技术，对国家有什么不好？我们的要求就是这些。”

章士钊仍咄咄逼人，问：“那要赶走吴校长，也是你带的头吧？”

胡子昂答道：“我们想请才贤能兼备的人来当农校的校长，难道也是错了吗？”

章士钊这才缓和了口气，说道：“其实你们的想法是对的，但是你们年轻人，动不动就成立什么会，搞什么运动，有失商量。我在外洋多年，从来没见过像我们国立八校这样闹学潮的。”

胡子昂说：“民主是需要过程的，而这个过程往往就是合法的斗争，比

如示威，请愿……”

章士钊挥了挥手，大度他说：“好啦，年轻人，你们是热血青年，可以理解。农校以前的事，我可以不追究。至于学校兴革的事体，我准备添设一个意见箱，诸位有什么意见，可以投入箱内，我每周开察一次至两次。”

胡子昂马上说：“校长这一举措必将深得民心。”

章士钊接着说：“我也有个要求，不知你们年轻人能不能接受？”

胡子昂说：“请校长明示。”

章士钊说：“现在，农校‘改大’也改成了，校长也换了，你们促成会的使命是不是就算完成了？”

胡子昂道：“我明白了，回去后我一定和同学商量，适时解散促成会。”

不久，大学促成会由于已经实现了宗旨，宣布解散。

此后，胡子昂潜心读了两年书。临毕业时，重庆家乡来了电报，欢迎他回家乡工作。

家乡的呼唤是任何力量都挡不住的。于是，子昂打点行装，于1923年夏，离开了这座让他激动过，让他奋争过，也让他失望过的古老都城，回到了巴县。

重庆教育界的新星

1923年，夏。重庆南坪场马家店镇。

夏初的这天一大早，早起的药材铺老板，看见一位身穿长衫、手提柳条箱、读书模样的年轻人，走过长长、弯曲的石板路，向胡家的院坝的方向走去。这人好眼熟呀？药材老板挠了一会儿由于出汗而变得湿漉漉的头发，恍然大悟道：“老胡家的读书娃回来了。”

真的是胡子昂回来了。他又看见家乡那熟悉的高山流水，那青砖红瓦、竹林藕塘、花香鸟语，还有那连绵无尽的金色稻浪。他不禁醉了。

正是这家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孕育造就了他这五尺之躯，造就了他这傲然不屈的性格。他想，我现在回来了，是我回报的时候了，我就是生长在这里的一棵草，一株木。

胡家在南坪是个大家族，子昂初回的那些天，亲友登门来访不断，都说：“子昂，你现在的功名就是个举人了吧？”

“哪还有什么举人哟！”子昂苦笑道：“我还是我，只不过是多读了几年书而已。”

大家似信非信，又问京城是什么样子，皇帝老子住的地方是不是很气派，他们现在还有没有辫子，等等，不一而足。他们想问的问题太多了，难怪，他去过他们都没有去过的地方：京城，那是大得不能再大的地方，那是天边，一万多里地哩。

胡子昂笑着应酬，尽可能给他们以满意的回答，心里却苦，想着这些大山把乡亲都隔在时代的后面了，他们需要科学，需要文化，犹如给饥者以粮食。

这一日，他的母校巴县中学的校长张筱门来访，他一进门就说：“我是代表巴县中学的全体师生来盛情邀请你的。子昂，去我们学校吧，学生们都希望你去当校长哩。”

这一点胡子昂是知道的，北农毕业前夕，巴县中学的师生就曾给他去过

电报，欢迎他学成后回到那里去当校长。但是，他却不是冲着这个校长才回来的，所以他笑道：“子昂何才何德，能取代你去当巴中校长。”

张筱门说：“你在北京那些轰轰烈烈的事迹，我们可是都很清楚啊。”

胡子昂不解地问道：“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张筱门笑道：“《民生日报》告诉我们的。”

胡子昂明白了。

胡子昂在北农读书时，他有个舅父叫刘映星，在北平警官学校读书，刘映星兼着四川同盟会会员杨沧白主办的《民生日报》的驻京记者，每天搜集北平各大报的重要新闻给《民生日报》摘发电稿，同时剪寄报刊上的重要文章。北农大学潮震惊朝野，刘映星不可能不在民生报上作出反应，而且在谈到外侄胡子昂时一定会更作一番添油加醋。刘映星毕业离京后，这份工作他就介绍胡子昂接替了。胡子昂在组稿的同时，还常写些通讯、短评文章，因此每月有二三十元的进项。胡子昂在读书时经济还是比较紧张的，家里不能按时寄钱来，正是靠了这二三十元，他的学杂费得以维持，而且日子过得还比较宽裕。

见胡子昂沉吟不语，张筱门问道：“子昂，你是否有了更好的去处，不愿在我们教育界混了？”

“不，我要当个教书先生。”胡子昂沉思着说，“今日中华欲自立自重，非得请来德先生、赛先生不可。”

“好一个民主和科学，”张筱门不禁击掌称赞，“这么说，巴县中学你是来定了？”

胡子昂说：“我去巴中，但是去当教员，而不是当校长。一个最实际的理由是，我在巴中读书的时候，你就是那里的教员了，你是我的良师，也是益友，我不能去抢你的饭碗。”

就这样，胡子昂在紧靠重庆的巴县中学当了一名普通教员，主讲农学，兼授国文。他讲课注重示范，有声有色，很快成为深受学生欢迎的教师。比如上农学课时，喜欢从“植物自述”的角度来说明问题，尽可能地让学生参与育种的过程，有时干脆把学生带到水田边上去上课。

胡子昂教学的名气很快就在县城响了起来，那时教自然科学的教师尤其缺乏，好多学校听说胡子昂有新教材，有新的教学思路，争相聘请，重庆几乎所有有名的中等学校（当时重庆还没有大学）他都去任过教，先后在重属联中、二女师、巴县甲种工业学校、甲种农业学校等担任过生物、动物、园艺、农业经济等课程的教学，每周授课 30 多个小时，非常累，但由于备受学生的欢迎，所以心里还是感到很充实的。

他是巴县教育界升起的一颗新星。

但是在许多方面，胡子昂和县城里的生活行为准则格格不入。他不像那种常见的教书先生：用白帕子包书，平时满口仁义道德，不苟言笑，下课钟一响夹着书本立马走人。胡子昂不是这样的，他喜欢和学生待在一起，喜欢和他们聊天，谈笑，和学生一起从事文艺和体育活动。

有一次，张筱门有事找他，听说他在足球场和学生一起踢球，他跑到足球场，连着转了三圈，硬是分不出来谁是学生，谁是老师。

在教师中，他是最先穿中山装的人，他那班级的女学生，受到他的鼓动，竟破天荒地留起了短发。为此差点气疯了县城的某几位遗老遗少。

新知识、新时尚像一股强劲的风吹着山区和城市。别人又奈他何？

在巴县小城，还是有人欣赏胡子昂的，梅念石就是其中之一。梅念石是巴县最后一个举人，中举后还没来得及做官，大清朝廷就倒台了。梅念石虽无官做，但在巴县的威望却很高，说话很有分量。梅举人既不陈腐，也不保守，他眼见着胡子昂给巴县教育界带来一股新风，教学工作颇富实效，于是写信给县长，说胡子昂“诸多建树、人所共知、有口皆碑”，建议予以重用。不久之后，从教刚两年的胡子昂果然被任命为巴县视学所视学（相当于教育局局长），还兼着巴县中学校长。

胡子昂在任巴县视学期间为巴县的教育界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巴县本有几十万亩的学田、学地、房产，但长期以来，由于管理不善，帐项不清，这几十万亩的学产已经名存实亡，它原来用于资助清贫学生的功能已经不存在了。胡子昂本是贫寒出身，对于清贫家庭的学生怀有格外的同情心，因此，他当上视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理学产。经过详细的踏勘，编成了《巴县学产图说》，责成有关部门按图经管，按年公布收支情况，并商请梅举人念石来主持学产委员会，使学产收入大大增多，而受到补助的青年学生也大大多了起来。

重庆商埠督办公署成立后，胡子昂又担任教育科长、巴县农会会长、重庆市教育局局长等职。

这时候，他和妻子杨翠芬搬到重庆城里居住。由于胡子昂曾名胡鹤如，他给自己的宅第取名“鹤庐”。杨翠芬是胡子昂父母包办的结发妻子，一个小脚女人，但感情尚好。

虽说做了官，但胡子昂毕竟是胡子昂，他是永远不会安分的。他的眼睛永远关注着大众，他和不顾人民死活的权贵永远不妥协。

子昂做了重庆商埠督办公署教育科长时，创办了一份《市政周刊》，主要是广泛地让人们发表关于重庆市政建设的意见。这份刊物当时是非常富有远见卓识的，主张筹办自来水、兴修公路、治理下水道、植树造林，同时力主严惩贪污腐败，革除弊政。

但是，胡子昂的这些主张在当时掌权的割据军阀们的眼里，只是一些书生意气和异想天开。这个时代的四川正是军阀割据最火的时候，各军将领在自己的领地里，自己委任官吏，同时也自己筹集款项，军、民、财权和行政管理都是自己说了算，省府是不能过问的。为了一块地盘，为了一个钱字，军阀们连年混战，大打出手，还有谁有心思过问市政建设？

此时，驻扎重庆的是黔军袁祖铭。早在1922年胡子昂尚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四川的两个老牌军阀熊克武和刘湘反目为仇，打得不亦乐乎，最后刘湘失利。曾被一度赶出四川的黔军以援助刘湘为借口，再度入川，与刘湘联手攻打熊克武。1924年2月，熊克武败走广东，黔军袁祖铭率部驻扎重庆。

黔军翻山涉水来到四川，日子并不好过，首先是粮饷供给就很困难，不得已只得依靠造钱来维持军饷。当时市面上流通的主要货币还是银子和铜元，银元不好造假，便在铜钱上下功夫。

主要办法是把收回制钱和收回当十、当二十、当五十、当百的铜元收铸为当二百铜元，铸工日益粗劣且不说，关键是袁所造的钱越来越假，造出来的二百铜元，比从前的一百元还小，因此当时的钱越来越不值钱，钱价愈趋下跌，银元已由每元换铜元千文猛涨至换十余千文，同时也就引得物价上涨，市面不宁，老百姓怨声载道，叫苦不迭。

当时，胡子昂还兼着巴县的农会会长，市场如此混乱，他深感自己有责

任力挽狂澜，于是去找同样颇有正义感的巴县副议长李奎安。

二人商量，感到光凭两人的力量是不够的，只能唤醒大众，共同反抗。于是印制了大量花花绿绿的传单，在重庆大街小巷里广为散发，揭出袁造钱真相，果然引起全市共鸣，群起罢市。一时，重庆市所有大小店铺一律关门停业，街上几乎看不见行人。

如此一来，袁祖铭着实慌了手脚，派出探子，打探到罢市乃胡子昂、李奎安所为，随即拉了一卡车警卫部队，将重庆农协和议会机关围得水泄不漏，叫嚷着要将胡、李二人拘捕法办。

正僵持不下之际，重庆商会的头面人物赵资生站出来，和袁祖铭交涉，晓以利害，迫使袁作出让步：袁停止铸造当二百元，也不捕人，商界恢复营业。铜元风波得以平息。

在重庆教育界做着小官的胡子昂，依然葆有他那学生时代的热情。他的“鹤庐”成了朋友们聚会的沙龙。经常去他家的是他的诚学会的朋友们。

诚学会是胡子昂在北京读书时期成立的一个自发组织，是当时在北京大专院校读书的一些四川老乡们在一起海阔天空侃出来的。他们经常聚在一起，谈时局，也谈毕业后的设想打算，于是大家忽发奇想：成立一个团体，好在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后，大家有一个团体的力量作后盾，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在事业上有所作为。他们给它取了个文绉绉的名字：诚学会。

因为没有任何政治主张，也没有草拟什么章程，更没有举行正式成立仪式，大家便戏称这个结构松散的团体是为吃饭着想的“饭碗团体”。因为胡子昂在农校的名气，大家公推胡子昂为诚学会的会长，每隔一两周召集大家聚会一次。最早参加这个团体的除胡子昂外，还有刘伯量、杨叔明、罗承烈、舒启元、鄢公复、邹明初、孔宗庆、刘明扬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了活跃在四川、重庆的工商界、政界、教育界知名人物，诚学会也因此被载入史册。

诚学会的名气不是在北京而是在四川打响的。这无疑应归功于胡子昂。

胡子昂二十六七岁就在巴县、重庆的教育界有了名气，也算是有了一官半职，别人都说他少年得志。此时，诚学会的朋友们也都陆续毕业回川，这个团体也就很自然的在重庆活动起来，许多其他城市大学毕业的学生也都慕名来到胡府，希望加入诚学会。只要有老会员介绍，也都可以加入。这样，诚学会囊括了100多名大学生，的确是一个不小的团体。

那个时代的大学生，最好找的职业是从事教育。当时的四川省府设在重庆，赖心辉是省长，教育厅长叫贺执中，他掌握着全川的教育大权。

贺执中喜欢显摆。当时的教育经费来自屠宰税，本来就是已被军阀们“吃”过几道所剩的“残羹剩饭”，贺却异想天开，将其挪用来盖豪华的办公楼，以此展示他的个人“政绩”。

不想此一举触动了他的下属、在重庆任教育局长的胡子昂那根刚正倔傲的神经，胡子昂在他辖下的那些学校里大声疾呼：“凡有血性之教育界同仁，岂能容忍此等胡作非为之辈！”

此话很快传到贺执中的耳朵里，他冷冷一笑，道：“好啊，姓胡的，给我来这一手，聚众反对我。你以为你一个局长就有什么了不起了吗？竟如此不自量力，你只不过是我口袋里的一个虱子，想怎么捏就怎么捏。”

随后一纸训令下达各县，规定：凡在四川教书，必须是师范学校毕业才有资格。他想，赶走你的诚学会的支持者，让你胡子昂没有市场，看你还怎么混？

这时有好心人来劝他：“县官不如现管，你年轻有为，前途无量，顶头上司可是万万冒犯不得的呀。”

胡子昂彻底地被激怒了，他拍着胸口昂然答道：“古有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今天我也铁了心了，就是要跟这种鱼肉百姓的贪官斗到底，大不了扔了这顶乌纱帽，不当这个破局长，回到我的南坪乡下办农场。”

这是 1924 年秋的事。

这一次，贺执中打错了算盘看走了眼，他一定不知道胡子昂这一介书生在北京竟惊动朝野的那些轰轰烈烈的事迹，更不了解他的骨之硬、志之刚、性之烈，发起运动，开展斗争，这正是他的长项。因此这位贺厅长注定是要后悔的。

正当贺执中精心筹划排除异己的时候，胡子昂却在遍发“英雄帖”，将诚学会的“各路豪杰”召集至重庆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开会，发起驱贺运动。

会毕，胡子昂即在二女师起草《驱贺宣言》，和会友共同编发了一个《驱贺特刊》，遍发全川中小学和各大院校，声讨省教育厅长的渎职。

很快，全川各学校几乎都发动起来了，一时，“贺执中滚蛋”的声音在全川教育界响成一片。

与此同时，诚学会利用刘明扬与省府秘书长沈与白交谊不错这一点，取得了沈与白的支持，也就等于取得了官方的支持，贺执中不得不向省长提出辞呈。

贺执中被轰走后，诚学会便抬出沈与白做了省教育厅长。胡子昂抓住机会，以教育局局长的名义，适时提出和推荐重属联中舒启元、涪陵中学、成都法政学校刘明扬等八个校长人选，省教育厅全部认可。

诚学会在驱贺运动中声名大振，而胡子昂在这次斗争中作为领袖人物，备受称道，声誉日隆，同时也就奠定了他在重庆、乃至整个四川教育界发展的坚实基础，可谓前途无量。

但是，正当胡子昂在教育界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却突然激流勇退，投身军界。

第2章 军阀马背上的青年才俊

初遇刘文辉

1927年，3月。成都西较场。

这是成都美丽的春天。阳光明净，天气高爽，和风温润得令人微醺。

在西较场练兵场上，四川军阀后起之秀刘文辉的一场盛大的、别开生面的赛马会，正在这里举行。

几十匹威武的战马，踏着躁动不安的碎步，排在起跑点上。

马上一律是身着戎装的军人，他们身体前倾，双手挽住僵绳，马鞭的鞭环扣在右手小指上，带着马刺黑得发亮的马靴紧紧蹬住马鞍，随时准备扣击马腹。正如箭在弦上，引而不发。

刘文辉身穿墨绿色的将军制服，身披一条黄色的缓带，气宇轩昂地站在阅兵台上。此时节，正是他军中事业如日中升、春风得意的时候，他身为成都卫戍司令，手下拥有四个师的兵力，又新被北京北洋军阀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任命为四川军务帮办，所以他的心情格外的好，要办一个赛马会来检阅部队的士气和实力。

突然，一声枪响，众马齐奔。赛马开始了。

一圈。两圈。三圈……

骑手的实力显示出来了。跑在最前面的是一匹全身毛皮黑得发亮的乌堆马和一匹通体雪白、只在耳梢、尾尖和四蹄有些许黑色的白马。

看台上的官兵都认识那两匹马：黑的叫“黑驹”，白的叫“雪龙”。

“黑驹”的主人是刘文辉部中最著名的骑手、团长石绍武；而“雪龙”则是司令刘文辉的坐骑。

那是真正意义上的“并驾齐驱”。两匹马四蹄翻飞，卷起一阵阵尘雾，两马互有先后，但相距从没有超过一米的距离。

“黑驹”领先是意料之中的事，而“雪龙”的驭手却不是刘司令，是一个看上去才不足30岁的俊秀青年，身佩中校军衔。他在刘部中是一个陌生的面孔。

他是谁？看台上有人相互询问，又都相互摇头。

渐渐，“黑驹”的步子有些慢沉了，而“雪龙”却依然健步如飞……

忽地，在最后的几十米，“雪龙”飞身窜起，跃过黑马，冲过终点。青年骑手拔起了那杆插在终点象征着胜利的黄旗。人群中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青年慢慢把马溜到阅兵台，然后翻身下马。早有人跑过来，接过缰绳，溜马去了。青年拾级登上阅兵台，刘文辉把他拉到自己的身边，对着台下数千官兵，用他那浓重的川南口音介绍道：

“弟兄们，今天的赛马会的盛况大家都看到了，我想，很多人恐怕对这位一举夺魁的青年中校还很陌生，我现在要向大家隆重介绍：他就是新近加盟本部的胡子昂先生。他从北京念完大学回到四川，年纪轻轻就担任了巴县视学、重庆市教育局局长，可谓才高八斗。胡先生能看得起我刘某，屈就在我们这一帮大老粗人堆中，是兄弟我的荣幸，他将担任本部的川康边务处长……”

刘文辉的话讲完后，台下响起一阵稀落落的掌声。

胡子昂往前迈了一步，向台下的人拱拱手（他还不习惯行军礼），意思是说：弟兄们关照了。

胡子昂知道，这稀落落的掌声，表明刘文辉的部下中还有不少人对他有怀疑、不满甚至嫉妒。

在许多人看来，边务处长是个肥缺。因为它总揽西康 10 余县、宁属 7 县和四川的雷波、马边、屏山、峨边等共 20 几个县的所有县政，特别是在边区搞屯垦、开矿及管理一些军工企业，确实是让人眼红。刘文辉部下的一个战功赫赫的师长张志和，就明确提出想兼任这个边务处长，被刘拒绝了。

为什么偏偏要把这个肥得流油的职务交给从来没在军界混过的胡子昂？

刘部的很多人感到奇怪。这一点，连胡子昂本人也没有想到。但是，他暗下决心要干出样子来，让刘部上下刮目相看。

弃教从军来到刘文辉部是胡子昂人生旅途中一个比较大的转折。

时年 29 岁。

胡子昂是在 1926 年的夏天，在成都认识刘文辉的。

他去成都是以教育局长的身份参加四川省的教育会议。当时他的老朋友、诚学会的会友舒启元、罗承烈、刘明扬、邹明初等人，也都在成都。他们一致认为，像胡子昂这样的俊才，无疑应该去见见四川军界的新星刘文辉。

他们要他见刘文辉，是因为刘文辉爱才是出了名的，在他最盛时期，曾网罗全国 10 几个省籍的欧美日本各国的留学生和国内各名牌大学毕业的大学生百余人。这样的慧眼、胆识，在当时的军阀中还是少有的。由此也可看出其政治野心。

而对于胡子昂来说，刘文辉的名字确实是如雷贯耳。

在本世纪初直至二三十年代，西南盆地四川，是个枭雄辈出、战火连绵之地。

刘文辉的老家是四川大邑县安仁镇，是当地非常有名的大地主。有兄弟 6 人，他排行老六。在中国家喻户晓、因偷辣椒掐死一贫穷少年的大地主刘文彩就是他的五哥，曾任川南税务总务兼川南清乡司令，人称“叙南五”。而在川军中任过师长、旅长、军长的胞侄有刘元塘、刘元璋、刘元琮等数人。当然，最有名的还要算他的嫡堂侄刘湘。刘湘也是川军中的一个著名军阀，曾任四川的“剿总”司令兼省主席。刘文辉前半生在四川军政界的沉沉浮浮，差不多都和他的这位嫡堂侄有关。

刘文辉生于 1894 年 1 月，14 岁入成都的四川陆军小学，后又入西安陆军中学，1914 年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1916 年毕业后回四川，在川军刘存厚部任上尉参谋。

当时，比他大四岁的堂侄刘湘已是川军中以能征善战而闻名的旅长了，还被袁世凯授予少将军衔和三等嘉奖奖章。

1921 年，刘湘出任图上军总司令兼四川省省长，乘机唆使刘文辉脱离原部队（其时为团长），还委他为第一混成旅旅长，直属刘湘这个总司令，驻防宜宾。

1922 年 6 月，刘湘的第二军与熊克武第一军作战兵败下野，刘文辉把他的这位堂侄由重庆护送到他们的共同老家大邑安仁镇。

次年，刘文辉又在川军的一片混战中谋得第九师师长和成都卫戍总司令之职，并接收了成都兵工厂、造币厂和相当多的苛捐税收。随后刘文辉便命兵工厂昼夜开工，造了大量的枪支弹药运往前线宜宾，一下子装备了 5 个团

的步兵；同时大量铸造银币、铜币归为己有。

1924年，帮助刘湘东山再起，打败了熊克武的第一军，刘湘的回报是让他收编了熊部的部分残部。

1925年，刘湘去职后，刘文辉成为川军第24军军长，同年收编了杨森的残部，率部进驻成都。他的防区以成都为中心，包括川南的嘉定、叙府，川西的邛崃、雅安、大邑，其中五通桥、自流井、资中、内江等盐糖产区，泸州、宜宾等四川富庶地方，均是他的领区，在四川军阀中是势力最大的一个。

刘文辉由一个上尉参谋发展成为拥兵10余万的一方之霸，也不过9年的时间，年纪也刚刚30多一点。

胡子昂就是在这个时候见到刘文辉的。

那晚，胡子昂所参加的教育会议已经闭幕，怀着一份好奇心，他和舒启元、罗承烈等老友一起，参加了刘文辉在他官邸里举办的一个盛大宴会。

没想到两人一见如故。刘文辉在谈吐中所体现出的军人的气魄、胆识以及他对知识、人才的尊崇，使胡子昂深感折服。而胡子昂儒雅的风度、非凡的才学，又令刘文辉激赏不已。何况年龄相仿，刘文辉比胡子昂年长3岁。因此两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正所谓惺惺相惜。

席间，刘文辉对胡子昂说：24军新近成立了一个政务委员会，其中建设股主任一职尚缺，问胡子昂是否愿意担当此任。

胡子昂犹豫了。毕竟，他在重庆的教育界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年纪轻轻就当了教育局局长，弃之可惜。但是转念一想，与刘文辉相比，虽年龄相当，但自己的成就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远不够轰轰烈烈。

一时举棋不定，因而道：“容我考虑几天再作答复。”

自比诸葛，决意佐军

胡子昂回到重庆后不久，即遇英国军舰与万县杨森部队发生武装冲突的事。

杨森是四川军阀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于1926年5月驻防万县。

自从清末《中英烟台条约》及其续约签订以来，帝国主义的势力相继入川，开设洋行，掠夺矿产，设立租界。尤其是英国兵舰，横行长江，蹂躏国权，践踏百姓，民愤极大。

这年七八月间，英国轮船在万县、丰都一带，经常撞沉木船，黎民受灾，杨森部队的官兵也有多人被溺死。

8月29日，英国太古公司的“万流”、“万通”号轮船，在云阳、涪陵一带横冲直撞，撞沉了杨森提运盐款的木船，淹死官兵数十人，沉没军饷10余万银元，民愤极大，杨森震怒。

在朱德、陈毅（朱德时任其20军党代表，陈毅亦在其司令部工作）的建议下，杨森命部队扣留了太古公司的两艘肇事的轮船，同时电告四川省政府向重庆英国领事馆提出抗议，要求赔偿。

英国驻重庆领事一面到万县与杨森谈判，一面从宜昌调派军舰驶至万县，以武力胁迫，并要求赔偿扣留两轮的所谓损失费200万元。

9月5日，由商船改装的“嘉禾”号军舰与另两艘“柯克”、“威警”号军舰配合，企图以武力劫走“万流”、“万通”号轮船，与杨森部队发生

武装冲突。

英国军舰炮轰万县城，发射炮弹几百发，并使用了国际上禁用的硫磺弹，引起全城大火，酿成震惊国人的“万县惨案”。

英军的侵略行径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各地纷纷集会，声援万县。

9月18日，重庆举行了10万人的示威大游行，并电杨森，勿与英军妥协。

胡子昂受重庆机关法团的委托，携带现款2万余元，前去万县慰问，并进行救济。

在万县城，胡子昂看到南津街、四川省行署、李家花园、万县中学等30多处被害，房屋被焚毁400余幢，死伤达千人，损失财物千万元，遍地死伤，惨不忍睹。

胡子昂挨户问受害人家，作成记录，还拍摄了许多照片，留下帝国主义罪行的实录。他满以为当局会找英政府算帐，谁知当局一声不吭，作成的资料无处刊登，寄回重庆的照片也如石沉大海。

胡子昂感到深刻的失望与悲哀，深深地体会到“国不富则兵不强，兵不强则受人欺”的道理。

因此，他对刘文辉有点动心了。

从万县回来后，胡子昂又为此专程拜访了巴县名士梅念石。这位前清举人捻须不语，沉恩良久，缓缓说：

“巴县视学一职是我荐你去做，你在这个位子也做出了一番成绩，现在又做了重庆市的教育局长，又颇多建树，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我也很欣慰。”

胡子昂欠身道：“老师对我有知遇之恩。只是……”

梅念石说：“我知道，中国的文人，从古至今，都有一腔热血，渴望报效祖国，但却总是苦于报国无门，他们远离兵士，但对国家兴衰却格外忧怀，李白一辈子都渴望仗剑去国，杀敌立功。”

胡子昂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值此国难当头之际，凡有良知的读书人，都应该力争为国家做点实事。”

梅念石道：“是啊，蜀地自古乃豪杰辈出之地，隆中请葛扶佐刘备便是一例。子昂，让你当个如我这样的教书先生，是屈了你的才。刘军长现在的事业正是旺势，只是他一介武夫，目光毕竟浅了些。你若能去他军中，定能如诸葛之于刘备，会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来的，协助刘军长完成统一大业，由治蜀而治天下，蜀不治，天下不治……”

说到激动处，梅念石起身挥毫，作诗一首，题为《送胡子昂往佐刘军戎幕》。诗曰：

十日南平倒玉卮，
又瞻西徼动遐思，
侯门珠履新投分，
法宝金重文付推。
莫爱黄龙易清洒，
好吟珠鹭付横吹，
斑生行矣休怡帐，
往问维州弃者谁。

胡子昂双手接过梅念石的诗稿，读罢豪气顿生。

而梅念石将他比作诸葛之于刘备，他虽不便口头承认，但内心倒是觉得这个比喻很有些符合他的实际，此喻甚恰。于是决意投笔从戎，远赴年轻气壮的刘文辉部，仗剑去国，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来。

第二天，胡子昂打点行装，西去成都刘文辉处报到，从而经历了他生命中一段不平凡的军旅生涯。

胡子昂刚到刘文辉处，就碰到他正在打西康的主意。

刘文辉当时的另一个职务是川康边防督办公署帮办，而彼时西康地区是刘禹九控制的防区，他手下有几万兵力镇守着。

这让刘文辉非常恼火，因为刘禹九这么占着，让他的川西、川南和西康不能结成一个整体。由此，刘禹九就成为刘文辉餐桌上的一盘菜了，吃掉它，是早晚的事。

当胡子昂一身戎装，精神抖擞地出现在刘文辉面前的时候，刘文辉眼睛一亮，把他按到对面的藤椅上坐下，询问对于刘禹九之战有什么高见。

子昂说：“一介文人，所能做的只能是些精神鼓动而已。”

刘文辉说：“精神即士气，其实这是士兵作战之根本，有了士气方可取得战争的胜利。”

很快，胡子昂推荐老友舒启元编写了一本精神讲话。

尽管通篇讲了许多军队要为国为民，保卫边疆，士兵要学文习武，讲精诚团结，一致对敌；但是，字里行间，透着要求士兵要对刘文辉竭尽效忠之意。因此，刘文辉看了十分满意。

这份讲话，便成为刘文辉攻打刘禹九的总动员讲话稿。

8月，刘文辉亲率士兵攻打西康。

胡子昂被特邀随参谋部同上前线。胡子昂眼见刘文辉以他30刚多一点的年纪，面对炮火硝烟，指挥若定，驱动千军万马，直扑敌营，心中又自多了一份敬意。

士为知己者用。胡子昂想，一定要在军营中干一番大事，方可报答刘文辉的知遇之恩，也给刘文辉和自己挣一份面子。

尽管刘禹九拼死抵抗，但怎可敌刘文辉的10万大军！仅10余天，刘禹九即全军覆没。刘文辉收编了刘禹九的几万部队，夺取了西康全境以及宁属7县所包括的会理、西昌等地，把川康边区联成一片。

刘文辉旋即成立了一个川康边防总指挥部，刘文辉自兼总指挥。下设川康边务处，总揽川康边区20余县的县政，处长自然就是一个十分眼红的位子，刘文辉的任命又迟迟不下，这更让许多人心痒难挠。

这一日黄昏，刘文辉约胡子昂到城外骑马散心。

两人并辔而行。刘文辉问胡子昂对加强边务建设有什么意见。其实，胡子昂对这个问题，胸中早有韬略，只是因刘忙于打仗，他还没有来得及说，因此当即回答：“川康边区地广人稀，军中供给难以解决，唯屯垦方为一条根本出路。学农专时，我曾对川康地理地貌有过一定的研究，知道川康地区矿产丰富，因此川康矿业开发大有可为。”

刘文辉听了，久久无语。

忽然，刘文辉双腿一夹，座骑“雪龙”纵身一跃，撒腿向郊外广阔的原野疾奔而去。这边胡子昂也一抖缰绳，座下的棕红马也紧随“雪龙”撒蹄飞奔。

跑了约有两支烟的功夫，早到了成都郊外，平原上的风景与胡子昂久居

的重庆又大不相同，原野碧绿，一望无际，村舍炊烟袅袅，三三两两的农人，或牵牛扛犁而归，或荷锄唱着山歌独行，让人感觉不知这是人中画，还是画中人。

两人不禁同时叹一声：好景色。

刘文辉让马慢下来，侧脸对胡子昂说：“想不到你一个文弱书生，骑术倒很是不错。”

胡子昂说：“家中也曾养过两匹马，因此马是从小就会骑的。来这里后，又随司令每日骑马练兵，骑术因此略有长进。”

刘文辉说：“过几日我将在西较场搞一场赛马，不知你是否有兴趣参加。我可以把雪龙让给你骑。”

胡子昂答应了。刘文辉高兴地说：“希望你能蟾宫折桂。届时，我将宣布一项重要决定。”

赛马会上，胡子昂果然异军突起，夺得桂冠。刘文辉出人意料地把边务处长的乌纱帽戴到了胡子昂的头上。

胡子昂到任后，立即大刀阔斧地大搞边务建设。

首先编制了一个开发川康边区的《川康边务计划》，在宁远办了一个铜矿，在西昌办了一个屯垦场，颇受刘文辉的赞赏。

这时，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翁文灏来川考察。翁文灏虽为学者，但在国民政府中却享有很高的声誉，实是社会名流（后来官居国民政府的经济部长），他又有几位学生在刘部谋事，因此刘文辉便在宴宾楼大摆宴席，给翁教授接风洗尘。胡子昂被安排作陪。席间，胡子昂提出在宁边开发一个金矿，设立殖边银行，当即获得翁教授的赞同。

而此时，刘文辉已占了大半个四川，正极力扩大军事力量，储备统一全川的实力，对边务计划全力支持，随后，批准拨款 40 万元，作为筹办殖边银行的基金。

胡子昂拿着刘文辉的批文，去找掌管财政大权的刘文成（刘文辉的四哥），却受到刘文成的一顿奚落，说他一个白面书生，一个毛头小青年，拿这样的一大笔钱去搞什么屯垦、开金矿，怕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啰。

胡子昂愤然去找刘文辉，刘文辉听了也很是生气，跑去找他的四哥要钱。可不大会儿又垂头丧气地回来了，他无可奈何地对胡子昂说：“我也莫办法啰。要是别人，我就把他撤了，可他是我的四哥，钱攥在他手里。”

胡子昂无言以对。至此明白，在刘氏家族的眼里，他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外人。

但是，胡子昂是凭着一颗心去办事的人，对工作是尽心尽责的。在川康边务政务上，他力主整肃吏治，给百姓减轻赋税。

尹静夫经人揭发，贪污有据。

这让胡子昂非常痛心，尹静夫是他的同学，来刘部工作又是他自己约请来的，现在出了这档子丑闻，怎么办？款项虽不大，但这事闹得很大，刘部上下都在看着他，子昂深感法不容情，于是，把尹静夫约至自己的住处，两人把酒畅谈。谈到深处，胡子昂才说明了情况，尹静夫深感汗颜，第二天便把一封辞职信放在办公桌上，自己黯然离去。

另一次，西康某县知事周景南，到任不过一年，但贪污边民巨款，敲诈勒索，引起西康当地兄弟民族的极大民愤。胡子昂得知风声后，几次派边务处督查人员明察暗访，终于查明情节严重，并有真凭实据。胡子昂立即呈报

刘文辉，言明不镇压难以平民愤。经刘文辉允准，贪官周景南被就地枪决。

因贪污而被枪毙的县长，在刘文辉的辖区这还是第一次，在全国当时也不多见。

这两件事在刘部震动极大。刘文辉也因此对胡子昂信任有加。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此时胡的结发妻子杨翠芬重病卧床，宁芷村等朋友见他孤身一人无人照顾，便介绍在成都开糖果铺的李老板的女儿、一位不满 20 岁的、姣美如花的双流镇姑娘李月华与之相识。李姑娘初不愿意，及至见到子昂本人，见他仪表堂堂、年轻有为、人又好，于是欣然同意与之结合。这是胡子昂的第二位妻子，一直伴着胡子昂度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

西昌舞剑，险遭杀身之祸

胡子昂在刘文辉的部队里站稳了脚跟，声望日隆。

刘文辉练兵甚严，他办了各种军事学校，培训积极军官，经常同各级干部接触，亲自选拔中、下级军官。每日早六点，刘文辉都要亲自去西较场训兵。这个时候，总能看见一身戎装的胡子昂，骑在马上，跟随刘文辉一同训兵。

1928 年夏秋之交的一天，胡子昂率一营卫队，由成都出发，浩浩荡荡，奔赴西昌。

此时，胡子昂的身份是川康边区宣抚使。他是代表蒋介石亲命的国民革命军第 24 军司令（军长）、川军四巨头（刘文辉、刘湘、邓锡侯、田颂芜）共推的四川省省长刘文辉，去西昌召开川康边防区和川康边务处大会的。

其实，此行的目的，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其时，刘文辉虽然以武力夺取了西康，但是西康宁属 7 县，却是由一个哥老会的头子羊仁安长期把持着。羊仁安拥兵两个旅，长期以宁属清乡司令的名义，横霸一方，是刘文辉的一块心病。行前，刘文辉秘密约见胡子昂，说明此行的目的，就是进一步明确宁属 7 县和西康的统一行政，相机收编羊仁安的军队。羊仁安的两个旅长一个叫蒋如珍，一个叫邓廷秀，实力大的是蒋如珍。刘文辉进一步分析说，动硬的是不可能的，关键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化瓦解，因此刘文辉暗中嘱他一切相机行事，看能否争取蒋如珍，以他取代羊仁安。

一到西昌，胡子昂便以宣抚使的名义，命令羊仁安率领所属部队到西昌集结。

羊仁安照办了。

胡子昂在西昌受到羊仁安的热情接待，每日好酒好菜招待，寸步不离地陪着他这个宣抚使。

羊仁安有两大嗜好，一是喜欢打麻雀牌，一下酒桌，就上麻雀牌桌。胡子昂入乡随俗，又为了和羊搞好关系，所以只得耐着性子陪羊司令打麻雀牌。在牌桌上，胡子昂看明白了羊仁安的粗鲁莽撞，蒋如珍机智多思，别具用心，邓廷秀对羊仁安则是忠心耿耿，一切看羊仁安的眼色行事，连打麻雀牌也是顺着羊仁安的思路发牌，因此牌桌上总是蒋如珍胜少输多。钱都流进了羊的口袋里。

胡子昂的心里便有数了。

羊仁安的第二个嗜好是抽鸦片。常常放下牌，躺到烟榻上抽一泡。这时

别的人就要等着，直到他过足烟瘾，才能重开牌局。

这倒帮了胡子昂的忙，他利用这个机会，把蒋如珍拉到一边密谈。胡子昂说：“蒋旅长胸有韬略，只是在羊某这种粗人的手下谋事，有些委屈你了。”

蒋如珍是聪明人，自然一点即通，马上说：“刘军长的大树底下好乘凉，我的内心是早就归顺 24 军了。”

胡子昂说：“那就好。刘军长也想宁属 7 县的军队交由蒋旅长管带。你要知道，你现在已不是羊仁安的一个旅长了，而是直属 24 军的一个师级军官了。”

“明白明白，”蒋如珍喜不自禁地说，“一有机会，我就把军队拉出来。”

胡子昂说：“你的一切困难，我愿协助解决。”

说得蒋如珍更加欢天喜地，再上牌桌，已然换了一个人，与胡子昂的配合便默契起来，输赢的局势就与前大不相同。

这一切，邓廷秀自然是看在眼里。

见事情已有眉目，胡子昂便着手召开川康边防军大会。胡子昂代表刘文辉在大会上讲了话，颇有将帅的派头。

会后，接着又开庆祝会，赛马会。

胡子昂有意让羊仁安高兴，赛马会上略扣马缰，让羊仁安连赢两局。

羊仁安被蒙在鼓里，看上去确实很是满意。临离开西昌之际，羊仁安送了胡子昂两斤上好的烟土，并把赛马会上赢得的两匹好马也送给胡子昂，让他转交刘文辉。

见羊仁安送马，蒋如珍赶忙也牵出几匹好马，送给胡子昂。

上行下效，邓廷秀等其他军官也纷纷给他这个钦差大臣送马匹。等胡子昂上路的时候，他收到的马匹差不多可以装备一个马队了。

胡子昂满载而归，带着他的卫队回到成都。

沿途有刘部的军队接待，所有营长以上的军官，见人转送一匹马。剩下的好马和烟土，回成都后悉数交给了刘文辉。

“不，这些礼物都是你的了。”刘文辉听了胡子昂的汇报后兴奋不已，把胡子昂交上来的马匹、烟土全部退回胡子昂，并说：“弟西昌之行，立了大功，解除了我的心头之患，这些区区礼物不足以表彰你的功绩，你就收下吧。”

胡子昂慨然说：“我只是奉命行事，不可妄贪这份功禄。”坚持不收。

刘文辉无奈，只得捡了一匹上等的好马留给胡子昂，烟土送给了他的秘书长杨湘丞。同时把胡子昂在西昌代表他的长篇讲话，印发全军。

他们都在等待蒋如珍的好消息。

谁知等来的却是凶讯：蒋如珍被杀。

原来，胡子昂回成都后不到一年，蒋如珍正在等待时机下手，却被羊仁安发现了破绽。与旅长邓廷秀一合计，邓说，他早就发现，自从胡子昂来西昌之后，蒋如珍的神情行为大异从前，其中必有蹊跷。于是两人一合计，在羊仁安的司令部摆下鸿门宴，请蒋如珍赴约。蒋如珍不明就里，毫无防备，正举杯豪饮之际，羊仁安的随从从屏风后面一刀刺中蒋的后心。蒋如珍当即毙命。

羊仁安随后派兵抄了蒋家，抄到了胡子昂回到成都后给蒋的专函。信中虽无明白策反之词，但其中含糊的语句都被羊仁安抓住大做文章，认为是胡子昂、蒋如珍勾结、分裂他们的把柄，于是当夜急电 24 军参谋长张鹤龄，

电云：

查得边胡与蒋逆勾结，造成宁边大乱，人证物证俱在，应请转报军座，明正典型。

张鹤龄接电后仰天大笑：“天助我也！”

原来，张鹤龄对胡子昂积怨已久，平时就认为边务处规模大，又有钱，胡子昂本人又是刘文辉身边的红人，因此对胡子昂很不服气，一心想找机会整垮他。加上这次西昌之行，又是刘文辉单独交待的，没有经过他参谋部，他一点不知内情，以为这下子整垮胡子昂的机会到了，于是一面急调警卫部队，荷枪实弹，把胡子昂的住处围得水泄不通；同时拿着电报，兴冲冲地找刘文辉，要立即逮捕惩办。

谁知刘文辉看完电报后，只是淡淡地说了句：“这事我知道，不是胡子昂的错。”随后把电报揉成一团，丢在废纸篓里。

张鹤龄只得怏怏地退出军长办公室。

第二天一早，刘文辉便召开紧急干部会。刘文辉的第一句话便是：

“我想宁属蒋如珍案，各位都已知道了。我可以告诉各位，这件事与胡子昂无关，由我刘某负完全责任……”

随后说明了全部的真相。胡子昂坐在台下，不禁心中感动：刘文辉确实是一条汉子！

同时也替刘文辉担心：羊仁安知道了，能善罢甘休吗？

也许是刘文辉的坦荡和那股豪气把那股杂牌军镇住了，自此以后，羊仁安反倒乖多了。

一夜长于百年

1930年9月的一个晚上，刘文辉只带一个贴身卫士，突然来到胡子昂的住处。

胡子昂感到非常奇怪，以往刘文辉出门，总是前三后四，威风八面，到胡子昂家也不例外。又见他神色诡异，知他必有要事秘商，于是把刘文辉迎进书房，两人关起门来，秘密商谈。

刘文辉坐下后便大谈蒋介石。作为军阀，刘文辉对蒋介石是又怕又恨。因为老蒋随时都有把他一口吃掉的可能。

“四·一二”政变使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急转直下。这场腥风血雨使蒋介石一下子从革命的“旗手”变成了赤裸裸的刽子手，从全国各地的军队里，发出了一片喊打之声。军阀混战也由此拉开了序幕。

远在四川的刘文辉当然也不会自甘寂寞，反认为这是控制西南、向外扩张的大好机会。

1929年冬，刘文辉显得格外活跃，与各地军阀往来十分频繁。

其时，唐生智和老蒋斗得正欢，并和阎锡山、何键、夏斗寅、杨虎城商妥，决定一致反蒋。刘文辉岂甘落后，急忙加入反蒋的行列，大家决定由阎锡山领衔通电反蒋。

12月，当石友三在浦口反蒋的炮声一响，爱出风头的唐生智怕被人抢了先，自己便迫不及待在郑州领衔代表阎、刘、何、夏、杨，发出反蒋通电，并将部队在河南集结，准备对蒋军发起进攻，同时要求何键、刘文辉、杨虎城等部跟他合作出兵抗蒋。

刘文辉此时已得密报，获知阎锡山已被蒋介石收买，被任命为陆海空三

军副总司令，杨虎城也被任命为新编 14 师师长，两人都率部截击唐生智军。

刘文辉故此按兵未动。不久，唐生智果然兵败，唐本人流亡海外。此次通电反蒋，遂告彻底失败。

刘文辉一连数日，闷闷不乐。

1930 年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发动中原大战。

1930 年 7 月，汪精卫又在北平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会议（扩大），准备与冯、阎、桂系合作组织政府，同南京蒋介石政府唱对台戏。这次会议，刘文辉秘密派出代表参加。就在这时，倒蒋联军与蒋军在津浦线上激战正酣，因此，刘文辉大胆预测：“老蒋这一回可是真的要玩完啦！”

刘文辉突然话锋一转，问胡子昂：“我知道你对蒋介石不满，但你敢不敢站出来和我一道反对蒋介石？”

胡子昂闪过脑子的第一个念头是：刘文辉这样的事来同我商量，的确是了解我，信任我，把我当作兄弟看待。

因此，胡子昂首先是被感动了。何况平时，他们诚学会的朋友坐在一起谈论时局，对蒋介石是颇有微辞的。他们不赞成蒋介石的军政之道，更对连绵不绝的内战烽火为祸人民深恶痛绝。因此，这个问题，对于胡子昂来说，并不难回答。

胡子昂腾地从椅子上弹站起来，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刘军长若反蒋，我必反蒋！”

刘文辉亦击案而起，慨然道：“好！咱俩兄弟就这么干了，通电反蒋！”

两人又坐下来，更进一步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刘文辉认为此刻出兵配合，进攻中原，机会最好，蒋介石必会倒台。他这样便可坐收渔人之利了。他还准备尽快联合川军的邓锡侯、田颂尧，不日出兵武汉。

胡子昂进言道：“不如抓住机会，今天就发出反蒋通电。”

刘文辉为难道：“找谁来起稿？我曾经拿这件事同参谋部商量，参谋长张鹤龄、秘书长杨湘丞都不敢干了，认为前次已失败过一次，再干会招来更大的麻烦。”

胡子昂想了一下，说：“我可以找一个人来起稿。”

刘文辉担心道：“会不会走漏风声？”

胡子昂说：“这个人绝对是可靠的。”

随即命自己的汽车去把川康边务处科长韩文畦接来，共拟电文。

三人关在胡子昂的书房里，字斟句酌，句句推敲，终于拟出电文，虽寥寥几百字，却是态度鲜明，措辞激烈，中心意思是：要蒋下台，以谢国人。

当电文定稿时，胡子昂拉开窗帘，见长夜过去，曙色已上高楼。他翻了一页日历，对刘文辉说：“今天是 9 月 6 日，此电就叫鱼电吧。”

刘文辉二度反蒋的电文，在胡子昂的策划下，于 1930 年 9 月 6 日，以密电发出，通电全国。

鱼电发出后，刘文辉已与邓锡侯、田颂尧商妥，准备发兵武汉。

正当刘文辉紧锣密鼓准备出兵的当口，东北少帅张学良易帜，从阎锡山一边倒向蒋介石。9 月 18 日，张学良通电拥蒋，带领奉军入关，倒蒋联军兵败回撤。

刘文辉二次倒蒋，不仅没占到半点便宜，反倒又惹了一身臊。

此时，24 军内部，早已乱得如一锅粥，全军大哗。

参谋长张鹤龄、秘书长杨湘丞面面相觑，脸色惨白，直冒冷汗。但他们

谁也不知道电文是怎么发出去的，于是下令追查。

查来查去，查到了边务处，查出电报是胡子昂一手操办的。

张鹤龄拍案大骂：“这是别有用心！是想搞倒刘军长，搞跨 24 军！”

心里却在暗暗冷笑：“胡子昂，看你如何过得今天这一关！你闯下这等弥天大祸，这颗脑袋是定然保不住了，我非亲手枪毙了你不可！”

刘文辉却一直缄口不语。

军部机要秘书吴子仪平日与胡子昂要好，私下里劝胡子昂：赶快夜奔重庆，避祸去吧。

胡子昂却坚持不走。

大丈夫敢作敢当，逃算怎么回事？这一逃，就跳进黄河洗不清了。更何况，重庆是刘湘、杨森的领地，逃到那里，还能有胡子昂的好果子吃？刘湘、杨森此时都已是蒋介石的红人。

9 月 19 日一夜长于百年。大祸临头的胡子昂，静静地呆在自己家里，静观事态的发展。

9 月 20 日，刘文辉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全军营以上的干部全部参加。刘文辉面对众人，缓缓地说：

“鱼电反蒋又失败了！我知道，这件事，大家对我的意见很大，但这是有根源的。这么多年来，蒋介石一直想吃掉我们。我们现在的天下，是弟兄们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杀出来的，容易吗？因此我要反对蒋介石。

1929 年冬电是反对蒋介石，今天的鱼电还是反对蒋介石。大家要追电报是谁搞的，不错，那是胡子昂写的。但他一个人怎么能干这件事呢？他同阎锡山、冯玉祥都没有关系，不认识。是我上他家里，同他商量，把他拉出来干的。你们不要搞胡子昂，要搞就搞我！我是一个汉子，敢作敢为，我有一二十万人马，是不怕他蒋介石的！……”

刘文辉以一个有力的手势结束了他的讲话。

台下爆发出一阵如潮的掌声。

张鹤龄就坐在刘文辉的身边，此时的脸色显得非常难看，觑一眼坐在主席台末席的胡子昂，却见他异常平静。

胡子昂是经过风浪的人，因此总能做到遇澜不惊。

胡子昂又平安地渡过一劫。

会后，刘文辉发表辞呈，辞去四川的一切职务。

私下里却托当时刘湘驻京沪的代表邓汉祥找张群说情，向蒋介石疏通关系，得到了蒋的宽容。

1931 年 2 月，蒋介石又任命刘文辉为四川省主席。

这一期间，刘文辉与刘湘的矛盾和利益冲突日益尖锐。

刘湘与刘文辉虽亲为叔侄，但由于他们的军事实力并驾齐驱，争当雄长，以至于发展到一山不能藏二虎的地步。刘文辉为分化刘湘部队，各以 20 万大洋收买刘湘部的兰文彬和范绍增两个师长。范拿到钱后就向刘湘报告，刘湘立即关起兰文彬，叫范去上海游玩，打破了刘文辉的图谋。

1931 年秋，刘湘在川江入口处又扣留了刘文辉从国外购买来的一大批军火，刘文辉乃亲自赴渝与刘湘开诚商谈，结果不但没有要到军火，反倒受了一肚子气，怏怏而返。由此矛盾日深，决意以兵戎相见。于是各自调集部队，部署兵力。二刘之战，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在二刘磨刀霍霍之际，胡子昂的头脑格外清醒，多次找刘文辉深谈，分

析此战得失。

胡子昂预言说，这场大分裂之战必将破坏刘文辉、邓锡侯和田颂尧三部的保定系（三人都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历史关系，导致邓、田倾向刘湘，同时破坏二刘之间亲密相依的关系，最不利于 24 军，更不利于刘文辉统一全川的夙愿的实现。

刘文辉却表现了从没有过的固执，对胡子昂的话充耳不闻。

胡子昂更加忧心如焚，于是把自己关在屋里，用三天时间写成长达万言的劝谏信，痛陈得失。信中说：

……兄既已拥兵廿万，控制了大半个四川和西康，川南的盐井，西康的矿藏，都大可开发利用，兴办建设事业，如此利国利民利家之事不去做，却去同室操戈，如此必会两败俱伤，均会成覆巢之卵，对于巩固和扩大四川实力同蒋方抗衡，极为不利……

胡子昂亲手把这封长信交到了刘文辉手里。

刘文辉细细的读完全信，久久无语。最后，他对胡子昂说：“我决心已定，势成骑虎，再说，刘湘也绝对不会同我们合作的。无论如何，我只有一战，请不要再说了。”

胡子昂无言地退出刘文辉的官邸。

随后，胡子昂将一纸辞呈递交刘文辉。

刘文辉读后大惊，想想这 6 年患难与共的友情，不禁深为感伤。他找到胡子昂，对他说：

“你我共事多年，肝胆相照，你在边务建设中竭尽职守，开矿屯垦，解决了军中供给的难题。在军事政务上，你我也颇投缘，现在大战在即，你不能就这样撒手走了。”

胡子昂也有些动感情，毕竟相处了六七年，觉得在刘部这几年，刘文辉也确实对自己信任有加，不曾亏待过自己，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最需用人的时候一走了之，也有些于心不忍，于是便说：“等到你与刘湘之战结束吧，那时你不论是胜是败，我都是要走的。”

刘文辉无奈，同意了。

1932 年秋，二刘之战爆发。

刘文辉虽军力大于刘湘，但刘湘占有重庆，经济力量强，特别又有蒋介石作后盾，所以其实占了上风。

蒋介石早就与刘湘结成联盟，把刘湘作为打击刘文辉，渗透四川的一个最大筹码。因此，二刘之战爆发后，蒋介石不仅大量供应军火，甚至出动飞机支持刘湘。双方动员兵力约达 30 万人。经过激烈争战，刘文辉终于全线瓦解了，刘湘大获全胜。

这是 1933 年秋的事。

在刘文辉、刘湘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们刘家宗族的老一辈出面了，纷纷指责刘湘不能这么欺负么爸（指刘文辉），应该留有余地。刘湘也感到把刘文辉赶尽杀绝了，对自己也没什么好处，在川势力就会显得势单力薄。几经周折，同意让刘文辉当个省主席，率残部退往西康。

刘文辉退到西康，任西康省建省委员会委员长，筹划建省事宜。

兵败西康的刘文辉十分想念胡子昂，于是电邀胡子昂任西康省建设厅厅长。

这是 1933 年底，胡子昂已到上海，办了护照，准备远赴美国考察。

这个时期，正是青年胡子昂思想比较苦闷的时候。他在苦苦求索，寻找

一条适合自己的事业之路。

接到刘文辉的电报时，他在黄浦外滩徘徊。回想在刘文辉部所干的7年，披肝沥胆，虽然不能自比诸葛，扶持一方诸侯，但也确实想干一些实事，奔走于偏僻边区，渴望开发西康、宁远边区宝藏，为改变川康少数民族边远地区面貌作一点贡献。可是在这军阀混战之下，所有的理想竟成泡影，并深感寄人篱下，终将一事无成，不如另寻出路罢。

于是复电刘文辉，婉言谢绝了。

第3章 又一个梦

拒绝出任行署专员

1933年底，胡子昂脱下穿了7年的军装，离开四川军阀刘文辉，来到上海。他在上海办好护照及其他出境手续，准备不日订票飞赴美国考察。

正在这时，他在北平农业专科学校的同学董时进来到他下榻的大世界饭店，登门拜访。董时进比胡子昂高两届，胡子昂与他熟悉，是因为他弟弟董时厚的缘故。时厚与子昂同届，又都参加学校的同一个足球队，友谊甚笃，一来二往，就与时进熟了。

老同学久别重逢，自然是格外亲切。“时进兄，你怎么知道我在上海？”一番寒暄之后，胡子昂不解地问道。

董时进道：“听我弟弟说的。时厚跟四川的同学仍有联系，知道你在上海，恰好我来上海办事，便让我一定要来看看你。”

“子昂，”董时进话题一转，问道：“听说你这些年很干了一些轰轰烈烈的大事，说来听听。”

“谈不上什么轰轰烈烈，”胡子昂苦笑笑，“酸甜苦辣倒是体会到不少。”随后便把在巴县教书，到刘文辉军队搞建设，开发边区，又帮着刘文辉出谋划策等事件经历简要说了一遍。

“一段不平凡的经历。”董时进叹道，“怪不得这一见，觉得与10年前意气风发的书生胡子昂相比，做骨仍在，却又多了一份成熟，多了一份刚劲的男性美。”

胡子昂朗声大笑，说：“人不可有傲气，但不能没有做骨。”

又问董时进：“不知时进这几年在哪儿发财？”

与胡子昂相比，董时进要算是一帆风顺多了。从北农毕业后，他即赴美留学，获得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学成回国后，年纪轻轻便出任北京农业学院院长（即北农大）。后因教育经费紧张，每年只有5万元，不够开给教员工资的，屡请增加经费，终未成功，于是愤而辞职。后来上海谋求发展，结识了当时的淞沪卫戍司令熊式辉，为熊式辉所赏识。熊出任江西省主席后，致力于发展江西经济，广罗人才，力邀董时进任江西农业院院长。董有志于农业，感到这是个好机会，于是便到江西受任农业院院长一职。

“子昂，跟我去江西吧。”董时进话锋陡转，对胡子昂说，“农业院现在正是初创时期，百业待兴。何况现在我是既无经验，又无得力助手，你在川康抓建设很有成效，积累了不少经验，正好可以来帮我抓基建和总务。”

胡子昂为难道：“在川康边区这几年，我已是焦头烂额。实在是想出国看看，休整两年。刘文辉让我去当西康建设厅厅长，都被我辞谢了。”

董时进接话说：“是啊，小小农业学院的区区总务长怎么能跟一省之建设厅长相比？但是，子昂，当年我们为什么都选择了农业学校？而上学时又是多么想在中国这个农业大国干一番事业，难道你都忘了？”

顿了一下，董时进又说：“再者，邀你去农业院，也是时厚的意思。他时常提到你，对你的胆识才学，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很想和你共事，也跟你学点东西。”

胡子昂沉默了。

是啊，学生时代的理想，昔日同窗的深情厚谊，都让他无法拒绝。

胡子昂经过深思熟虑，答应帮他。但提了一个附加条件，就是一年后，容许他再作选择。

随后，胡子昂打点行装，随董时进赴江西，出任江西农业院总务主任兼农业技师之职。

其实，江西农业院当时只是一个综合性的实验农场，主要经营畜牧产品，同时从事农业科学研究，培养农业技术人员。

胡子昂到任时，农业院正在大兴土木工程，候选农业院院址，又要筹划农场建设，还要接办学校。此前，所有农业院的设计、丈量土地、开办养牛场、菜场、养蚕室及兴建园艺等，都靠院长董时进的弟弟董时厚，留美畜牧专业毕业生黄异生等几位技师经办。胡子昂到任后，许多畜牧、农业和土木工程的项目，就理所当然地由他这位总务主任兼管。

进入工作后，胡子昂才发现，和董时进共事并不是一件很愉快的事。

董时进处处带着他洋学生的优越感和傲气，一切都是外国的好，比如建筑设计，总是要以他康奈尔大学为典范，连董时厚也反感他哥哥的那一套。时厚对子昂说：“哥哥书生气太重，什么都喜欢搬洋法，为人又固执，所以跟学院里技术人员、职工关系都很差。”

胡子昂感到董时进给他施展的天地大小了。

尽管如此，总务处的工作实绩还是很明显的：部分基建项目按期交工，养蚕业按季展开，蚕茧收获甚丰。特别是奶牛场的牛奶上市，给当地人民的生活带来方便，颇受称道。

为此，省主席熊式辉还特地跑到农业院，嘉勉鼓励了一番。

江西农业院是熊式辉一手创办起来的，自然对它情有独钟，因此对胡子昂这一年来的成绩格外看重。

但是，胡子昂却感到这一年来干得很不顺心，又感到农业院如此下去，前途渺茫，因此，他还要走。本来也就只对董时进许以一年之期。

只是，他经办的几项大的工程还没有完工，所以，董时进留他，他也不便强走，只得再留一年。

转眼到了 1935 年秋。

这一天，胡子昂的 24 军旧同事宁芷村从重庆到上海买机器，专程赶到江西看望他。由此可见他们交谊之厚。

这时宁芷村亦已步胡子昂之后离开了 24 军，任重庆川康银行的经理。宁芷村告诉胡子昂，目前，他正和胡仲实等人合办华西公司，并详细介绍了华西公司的发展计划，以此说明华西公司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事业。

最后，宁芷村说：

“四川目前是军人的天下，他们有权、有钱、有枪、有人，办公司既要倚重他们的力量，筹集资金，又要避免受其干扰，这一点，我和仲实都难以应付。所以，我们急需一位有魄力，又能应付方方面面的实干家来管理华西事务。而你正是最合适的人选。你在川康建设的实绩有目共睹，又与四川军界联系密切，在他们面前说话有分量。我这次专程由上海来江西，一方面是来看看老朋友，叙叙旧；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受华西董事会的委托，专程来邀你回川加盟华西的，不知你的意见如何？”

胡子昂的心弦被拨动了。

是啊，从学校毕业走上社会已经 10 多年了，从教育界到军界，又从军界到教育界，他的那些轰轰烈烈的理想，都被现实残酷地砸得粉碎，像肥皂

泡破灭得无影无踪。现在他的那些老同学、挚友们，又将他推向另一个十字路口。

走，还是不走？

他决定迈出这一步，走！

他握住宁芷村的手，动情地说：

“感谢朋友们这么看重我，信任我。这些年，我干成了一些事，也碰过许多壁。现在看来，国家内忧外患，贫穷落后，发展实业，可能是振兴中华的一条出路。所以，我决定接受华西董事会的邀请。只是农业院我还有许多经办的事没有做完，稍待时日，我即返川上任。”

宁芷村满意地离开江西，由沪回川。

不多日，胡子昂即连续收到了宁芷村和胡仲实联名的电报，催他返川。

胡子昂加快了江西农业院工作的善后处理。

1935年底，他将手头工作全部跟董时进、董时厚交接清楚，准备回川。

这一日，胡子昂正在收拾返川的行装，忽然接到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秘书长的电话，约他晤谈。

说实话，胡子昂对熊式辉的感觉并不好，熊式辉独揽江西军政大权，对于订正江西秩序、推动江西经济发展，做过一些好事；但是从本质上讲，熊本人不过是随风倒的墙头草，一个马屁精。

熊式辉 1893 年生于江西安义县万家埠鸭嘴垅村，家境寒微，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先上江西陆军小学，又入南京陆军中学、保定军官学校，后参加讨袁护法战争有功，被保送到日本陆军大学深造，回国后投奔蒋介石。在蒋倒霉的时候，先后与蒋的对头白崇禧、冯玉祥有染，策划反蒋。但当蒋东山再起时，又马上发出拥蒋通电，并声讨冯玉祥，因而备受老蒋的青睐。

主政江西以后，更是对蒋介石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将南昌的德胜路加以修理，改名为“中正路”；建造赣江大桥，命名“中正桥”；办一所大学命名为“中正大学”；建一座礼堂则名之为“中正堂”；办一家医院则称之为“中正医学院”，还拨巨款为蒋介石建造一栋新官邸。

蒋介石坐镇南昌指挥“围剿”苏区红军时，居住在南昌百花洲上一栋精致的楼房内，凭窗可以饱览东湖四周的景色，有一次他晋见蒋时，在走廊上散步，发现蒋时常用手帕掩鼻。他意识到这是湖中散发的臭气让蒋不舒服。回到省府后，当即命建设厅厅长重修湖岸，清除浊水。不久，东湖的堤岸全部用红石砌成，沿岸植树成荫，调整流水管道，并设专门的东湖管理处。蒋介石见湖面改观，景色宜人，对熊式辉大为称赞，传令嘉奖。

南昌市有一位文人，还就这件事为熊式辉写了一副对联，雅谑兼有，入木三分。

上联：半世姻缘兼两顾；（熊式辉原配夫人顾毓筠死后，继娶妻妹顾竹筠为室。顾竹筠系留日学生，曾拜宋美龄为干娘。“两顾”意指顾氏两姐妹。）

下联：一生事业在三湖。（意说熊式辉因修筑百花洲的东湖、南湖、北湖的湖堤，而得到蒋介石的宠信。）

熊式辉拍马屁奇谋百出，令人惊叹。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来南昌视察，他闻讯后，派了一批高级人员去九江码头迎接，并特别指示一名亲信，注意林森穿什么衣服，迅速向其报告。林森的专轮一泊九江码头，那位亲信便打电话报告：“林主席是身穿蓝色长袍、黑色的马褂。”熊式辉立即下令，南昌市所有县、团以上军政人员，一律身穿蓝长袍、黑马褂到牛行车站迎接林森。

林森发现欢迎的文武百官与其穿的衣服、颜色都一样，心中大悦，对熊式辉大加赞赏。

熊式辉口头上说要厉行“清廉政治”，要求下属“简单朴素”，他自己却很讲究排场，乘坐的是美国“道奇”防弹小轿车，每天上下班，进出省政府都要“府乐队”奏乐迎送。

省府秘书长就是坐着熊主席的“道奇”防弹车来找胡子昂的，他开门见山，对胡子昂说：“听说胡先生即将离开江西？”

胡子昂说：“是的，回四川办实业。”

熊的秘书长说：“你在农业院工作将近两年，成绩很显著，为人称道。我们熊主席是很爱才的，对你的学识才干也是很看重的，今天我是奉熊主席的指示，特来劝你留下，希望你能继续为江西的建设出力。”

胡子昂说：“我以为，当今中国，内外交困，危机四伏，唯实业救国为根本出路。”

秘书长说：“胡先生的话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熊主席挽留之情甚切，如你能继续留在江西，熊主席将任命你做专署专员。条件如此诱人，我想胡先生不会一点不为之所动吧？”

“不，胡某志不在仕途。”胡子昂慨然说，“我的去意已定，请秘书长不要再说了。”

就这样，胡子昂断然拒绝了江西省主席熊式辉许以高官的挽留，坚决不在政客手下讨饭吃，于1935年底返回四川重庆。

由此，走上了一条经营工商业的道路。

实业救国，这是他历尽人生曲折之后的又一个梦。

押上房子办实业

胡子昂一回重庆，就全身心投入到华西公司的业务中。先是担任华西的襄理，越年，即任经理。

作为华西公司的业务负责人，照例是应该入股的。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在外闯荡多年，曾担任过各种有实权、被人认为是“有油水”职务的胡子昂，竟然无钱投资入股。

华西公司董事之一胡淑潜说：“真没想到，子昂在外混了这么多年，连一点积蓄都没有。不说别的，就是在刘文辉部队当建设处长那会儿，稍微从中揩点油，今天不但不会没钱投资，就是再办一个华西公司，钱也都够的。”

胡子昂笑道：“如果我手脚不干净，在哪儿都想揩点油，今天你们怕是不会要我来做这个经理了。”

胡淑潜的哥哥胡仲实说：“子昂的为人，我是知道的，做骨铮铮，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宁芷村笑道：“还是由我来替子昂筹措这笔钱吧。”

胡子昂手里此时仅有8000元。那是刘文辉电邀胡子昂不至，念着前情，于是汇了一笔钱给他，算是给他的安家费。重庆他还有一幢住宅，名为“鹤庐”，把住宅的红契交给了宁芷村，这样从川康银行押借了5000元，一并投入华西，作为股本，成为华西董事会的成员之一。

华西公司是胡仲实、胡淑潜弟兄于1932年9月在重庆创办的一个经营技术工程的企业。

胡仲实兄弟，原是四川广安人，父亲叫胡葆森，是清末翰林，供职北京，与胡子昂的二伯父关系很好，是结拜兄弟。胡子昂在北京上学时，胡仲实兄弟也正在北京，三人交往密切，感情深厚。后来两兄弟一起考入南开大学工科，毕业后，胡仲实进入北洋政府，20 多岁便当了北洋政府工业司的司长，因而结识了不少北洋军阀中的实权人物，同西南军阀也有一定联系；其弟胡淑潜从南开毕业后，即赴美国留学，归来后在天津开办了中国无线电公司。

胡仲实在政界混了几年，深感仕途险恶，于是决定退出政界，兴办实业，为此东奔西走，曾经与重庆的北四行储蓄会主席、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商谈，想借北四行之力，返川兴办实业，没有谈拢。后来又去云南，想请龙云给予资助，也无结果。

1929 年冬，胡仲实在弟弟胡淑潜的陪同下，赴汉口，与曾任杨森驻京沪代表田习之进行磋商。胡淑潜全力对哥哥的动议表示支持，并表态愿以他所经营的中国无线电公司内迁至四川，作为新企业的基础。

田习之认为，胡氏兄弟关于兴办实业的构想，顺乎潮流，符合时势，只是此时重庆是刘湘 21 军的防区，建议应找到刘湘驻汉口的代表商洽。

胡氏兄弟马不停蹄，随即找到刘湘在汉口的代表傅常、邱甲商谈。没想到胡氏兄弟的构想与傅常、邱甲三一拍即合，他们认为刘湘此时的事业蒸蒸日上，正图谋独霸四川，因此如能发展地方实业，必可大大增强 21 军的经济实力，壮大声势，随即表示愿意共同发起。

几经洽商，胡仲实、胡淑潜草拟出了《开发华西计划书》，以重庆为中心，设计了华西公司无限美好的蓝图，列举的开发项目主要有：发展电力工业，兴建电力厂；设立机器制造厂、炼油厂、钢铁厂、水泥厂；新设自来水厂、电灯厂、电话局等，气魄很大。

这份计划由傅、邱两代表转报刘湘，刘湘阅审之后颇为满意，立即与重庆的政界、金融界联系，获得一致首肯。在官僚们看来，兴办实业是发展地方经济、巩固其统治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在金融界，这正是资金的一条出路。

这样，在四川军阀和四川金融界的赞助、支持下，胡氏兄弟顺利地组成了华西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华西的业务主要有两大部分，一是承建、改建工程，二是自办工厂。

华西承建、改建的较大工程，是从重庆电力工厂开头的。

1932 年以前，重庆只有一家电灯公司，那是重庆一位叫周孝怀的实业家做劝业道的时候办起来的，规模很小，又是直流发电，电灯内只能现出几根红丝，看书写字都不行。重庆的市民殷切盼望电力状况有所改善。

正是民心所向。因此当华西公司提出要兴建新型电厂时，正合刘湘的心意。刘湘此时已是四川省省长，省府即设在四川山城重庆。刘湘责令重庆市政府成立“重庆电力厂筹备处”，负责筹集资金，建造电厂。华西公司随即拟订出新建重庆电力厂的工程计划，经过与军部、市政府暨有关局主管人员共同商议后，成立了华西兴业公司承建重庆电力厂工程处。

这项工程是华西开业后的第一桩业务，公司上下全力以赴，争取打响第一炮。经过为时数月的准备，于 1933 年初开工建筑厂房，安装机器，铺设线路，翌年 7 月完工，正式投入生产，发电量 609.37 万度，成为当时西南地区第一座比较新型的电力企业。

当照明电路全线开通的那天，华西和市政府联合举办了一个盛大的开通典礼。晚宴之后，约请刘湘等省府、军界要员登上峨岭。从峨岭极目远望，

只见山城重庆一片灯火通明，万家灯火依山而布，次第展开，嘉陵江、长江映照着闪烁的灯光，犹如水下亦有一座城市。

刘湘不觉看得如痴如醉，对随行的人员道：“我在重庆住了这么多年，今天才知道这座山城原来是这么漂亮。”

华西公司因此在重庆名声大振。

荣辱毁誉有谁知

胡子昂初到华西的时候，华西公司正处于一个新的爬坡阶段。

经过一番调研，胡子昂提出，为进一步推动华西的工作，公司应分阶段、分缓急，首先要择其花钱不多、公司的财力、人力容易落实的项目，如自来水厂、水泥厂等下手。这一提议，立即得到胡仲实、胡淑潜、宁芷村、陆淑言等董事的一致赞同。

胡子昂立即着手活动，准备承建自来水厂的改造工程。

重庆自来水厂建于 1933 年，地址在大溪沟，即现在的中区水厂。其生产设备，都是从德国西门子洋行买来。投产一年，机器故障时有发生，经常停水。

1934 年的重庆，经常能看见市民捧着脸盆、提着洋铁桶，去大街上的公用水龙头接水，市民怨声载道。因此，自来水厂改建已是势在必行。

经重庆市政府和工务局商定，自来水厂交由华西整顿改建。

正当华西公司为此而欢欣鼓舞的时候，却传来消息：自来水公司的经理、厂长、监事会主席等都不同意将改建工程轻易交给华西，要公开招商投标，以昭公允。

无奈，华西只得和百理、德华等洋行一同参加投标。

经过连续几夜的研究、论证，胡子昂拿出了一份标额为 37 万元的标书。在公司的董事会上，胡子昂解释说：“我们的标额是根据改建工程的实际需要而定的，因为必须添配较多的器材，以求保证工程的质量。”

“当然，”胡子昂最后苦笑道：“这其中还包括市政府明确索要的回扣。我们没办法回避这个问题。”

董事会批准了这一方案。

这时，胡子昂从私下里了解到，德华洋行的标书标额才 21.5 万元，比华西少了 15.5 万元。这场投标竞争事实也只是华西和德华洋行的竞争，因为只有这两家实力相近，具有竞争力，其他公司只不过是陪衬。

更为不利的是，自来水厂技术人员对华西工程技术方面历来存有门户之见，自来水公司经理石荣廷、自来水公司监事会主席、重庆总商会会长赵资生，正发动重庆的 10 多个行业的头面人物来反对华西，阻挠华西公司在本次改建工程投标中获胜。

华西一时险情迭起，困难重重。

“这其中必有文章！”胡子昂愤怒了。但他却束手无策，因为没有真凭实据。怎么办？难道就这样放弃了吗？

不能！胡子昂对自己说。如果说，电力厂工程是华西打响的第一炮；那么，自来水厂改建工程，则是胡子昂担任华西经理后烧的第一把火，踢的第一脚。一定要把这一把火烧着、烧旺，把这一脚踢开、踢响！

忽然，胡子昂的脑子一亮：到目前为止，自来水厂的厂长敬克明始终还

保持着中立。

一定要把他拉过来。胡子昂马上与胡仲实等人紧急磋商，决定将敬克明拉入华西集团。胡子昂立即派人联络敬克明，送上大红的聘书，延聘自来水厂厂长敬克明为华西的工程顾问。

随后，胡子昂又请重庆市政府出面，召集重庆各行业代表来市府举行恳谈会。重庆市府已有回扣允诺，自然愿意促成此事。德华洋行乃是重庆一个名头很响的企业，又直接参与这次自来水管的投标，市府无法不请。

德华洋行是德国人在重庆办的，经理是一个中国人，是德国老板指定的代表。由于有外国老板撑腰，又有雄厚的资金保证，因此，德华的经理一开始态度就蛮横强硬，指责华西是新成立的公司，没有经验，不能保证质量。

胡子昂当即站起来，说：“不然。本公司虽说是成立时间不长，但从一开始就信守合约，保证质量，如在承建重庆电力厂工程中，从签订合同起，到成立工程处，调派电力、建筑等工程技术人员十余人投入设计、勘察等，一年多时间就建成了一个发电量 609 万多度的电力厂，其质量、效益如何，在座的各位都有目共睹。”

这是事实，因此，在座的各界头面人物纷纷点头。

德华经理又说：“华西标额巨大，工程费用昂贵，实想趁机大捞油水，而德华标额已压到工程开支的最低限度……”

胡子昂驳道：“如果不结合工程实际需要而过分强调标额，那就等于简单草率，不负责任。华西承建电力厂就是专门成立工农业部采购建筑材料，并在上海和国外订购发电机及应用机械。这一次，华西同样将订购最好的机器设备应用于自来水管的改建。”

德华经理仍不认输，又说：“德华拥有外国专家和一流的设计，我们的设计是参照柏林自来水公司制订的……”

胡子昂冷笑道：“不结合城市的实际情况盲目照抄照搬外国的设计图，那就是生搬硬套，后患无穷。请问经理先生，你知道重庆长江、嘉陵江的水位涨落情况吗？你知道各个季节河水的含沙量吗？你知道自来水管的抽水机以往发生故障的原因吗？你不清楚吧，这些，我知道。”

德华经理被问住了，涨得满脸通红，在大家的哄笑之下，狼狈地退席而去。

散会之后，在回去的路上，胡仲实问胡子昂：“你是什么时候把水位涨落和含沙量的情况资料弄到手的？”

胡子昂笑着回答：“其实我也不知道，只是吓唬他一下而大笑之后，胡仲实又问：“如果他反问你一句，那你怎么回答？不是露了馅？”

胡子昂说：“如果他真的蠢到这种程度，那我就告诉他，这是商业秘密，恕不奉告。”

两人又是一阵大笑。

胡子昂这一急中生智，把德华洋行弄得很被动，公众的天平开始倾向华西。

但是德华并没有善罢甘休，仍在加紧活动。

恰在这时重庆抵制日货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群众反帝情绪高昂，青年学生走上街头，举行抵制日货、反帝爱国的示威游行。胡子昂感到这正是一个好机会，于是对重庆市府的有关人员说：如果在这种时候把自来水管的改建工程交给德国人的洋行去做，必将引起市民的强烈不满，成为众矢之的。

市府感到这话确实很有分量。胡子昂一语中的，击中市府官僚的要害。随后市府即指派工务局长傅友周会同自来水公司的总工程师联合审查两家投标计划，确认华西的计划比较切合实际，决定由华西以原标价承包。

胡子昂终于如愿以偿，第一把火烧着了，并且越烧越旺。

自来水厂的改建工程立即上马。改建后的自来水厂，机器运转一直正常，每日所产水量足供 30 万人的需用，大大改善了原来的面貌。

自此，华西公司打下了与重庆自来水公司的合作基础，自来水公司生产技术上的大问题和扩建工程等，都与华西公司共商解决。

胡子昂在这次改建工程中表现出的卓越的商战和管理才能，为社会所瞩目。

人怕出名。

胡子昂做华西的经理做出了名。

在自来水公司改建即将完成时，自来水公司董事长、重庆银行总经理潘昌猷便找胡子昂商量，要胡子昂兼任自来水公司的经理。

潘昌猷说：“自来水公司这几年由于经营无方、管理不善，才导致今天这样的大规模改建。现在，自来水公司已经上了一个台阶，我对那些人不放心，还是由你来兼做这个经理吧。”

胡子昂便去同胡仲实商量。胡仲实说：“华西的业务现在正是忙的时候，我想你怕是很难兼顾过来吧？”

胡子昂沉思道：“自来水公司是华西承包改建的，工程费几十万，搞不好，损失太大；还有一个全市人民吃水用水问题，如果办不好，影响很大。”

胡子昂再三考虑，觉得当前恐怕不兼不行。如此，在 1937 年自来水公司改组时，胡子昂兼任该公司经理，并由潘昌猷的恳助，交去 5 万元现金，换取旧股 30 万元的股额，成为自来水公司的董事之一。

自来水公司的机器设备和器材大部分依靠进口，“七·七事变”后，抗战范围扩大，为预防港口被日本封锁，不能进口设备器材，公司董事会、经理室共同决定，由胡子昂出面向国家贷款。

其时，华西公司、电力公司、四川水泥厂也要向国家贷款，于是四家共推胡子昂为代表，去武汉国民政府要求贷款。

此后，胡子昂先后四次乘坐水上飞机到汉口，向国民党政府接洽贷款，共借到 200 多万元。

这一天，胡子昂去工矿调整处看一个朋友，遇该处负责人孙越崎。孙听说胡子昂是自来水公司的经理，便告诉他工矿调整处有一批钢管、水泵和其他器材，因为抗战形势所逼，他们急于要出手，因此价钱很便宜，劝胡子昂用贷款买下。

胡子昂考虑，这些器材也正是自来水公司所需用，况且眼下局势这么乱，没准什么时候就买不到了，于是一面电告潘昌猷，一面以自来水公司的 70 万元贷款买下这批东西。

当时，生意场上回扣风盛行。

70 万元的一笔生意，按例是会有一笔不小的回扣。胡子昂对孙越崎等人讲，我是代表自来水公司谈生意的，目的是为发展这个事业，我个人决不拿佣金。

孙等人受其影响，也表示不要回扣。

谁知胡子昂回到重庆后，潘昌猷却大为不满，埋怨说：“借了这么大一

笔款子，却没有收到钱。”

胡子昂说：“不是打电报给你，都买器材了吗？”

潘昌猷说：“你用一半的钱来买不行吗？”

胡子昂说：“已经签字了，货都已经发出来了，怎么能退？”

潘昌猷认为胡子昂这件事办得太快，没留下现金让重庆银行周转，两人遂发生龃龉。胡子昂备感委屈，愤而辞去经理职务。因为没有人接替，还是隔了一年才离开自来水公司。

1939年，日本飞机狂轰滥炸重庆，市中区许多街道变为弹坑与火场，被炸各街水管均遭破坏，自来水厂中弹多枚，输入过滤池大管也被炸破。

胡子昂冒着日本鬼子的炮火，亲自带领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进行抢修。正是靠了这批器材，才在频繁的轰炸中保证了自来水的供应，受到市民称赞，许多机关团体致送奖旗贺幛。

潘昌猷此时方明白过来，当初自己埋怨错了，极力挽留，胡子昂哪还愿意。

1937年7月的一天，一声轰然巨响，震撼山城重庆。

次日，东京《朝日新闻》在头版位置，以《支那备战——华西最大火药厂发生大爆炸》为题，加以报道，大肆渲染。

一时朝野震惊。此时，正是中日双方箭在弦上之际，国民政府为此惶恐不安，急电重庆，责成重庆市府追查此事。

重庆市府很快回复：华西公司协和火药制造厂，由于管理不慎，炸死50人，炸伤300余人，房屋倒塌150余户，受震毁200余家。

与此同时，华西公司的主脑们聚集一起，召开紧急会议，通宵达旦，商量对策，决定由胡子昂担任此艰巨重任，出面来妥善处理此事。

受害市民纷纷提出诉讼，要求华西赔偿损失。

胡子昂又一次被推上前台，亲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辕，到案候审。

真是冤家路窄。此时坐在大厅里公开审案的重庆行辕主任，居然是当年被胡子昂赶走的四川省教育厅长贺执中。但是，胡子昂自觉心底无私、襟怀坦荡，于是坦然应对，详细叙述事情的经过。

原来，华西的火药厂并不是用于备战，而是为了工程建设的爆破用。

承建成渝铁路，是华西一项较大的工程。

早在1934年刘湘提议修筑成渝铁路后，中央铁道部随即秉承国民党当局之意与四川省政府会同办理，决定由各方投资修筑。

华西原来的胃口很大，计划承包全线的设计、修筑路基、修建车站码头和铺设钢轨等全部工程。但鉴于事权涉及中央与地方，工程又浩大，华西力所难逮，胡仲实即同吴鼎昌商议，拟由华西与北四行合作，共谋进行。

后来这项工程为宋子文、宋子良的中国建设银公司所投资成立的川黔铁路公司抢去，在该公司下设立成渝铁路工程局，将筑路桥梁涵洞及车站、码头等土石方建筑工程，招标投标分段承包。

华西退而求其次，于1936年底参加分段投标，经过激烈竞争，第一总段重庆到江津的39标工程，华西承包了34标，全部包价达400万元。

华西以川湘路员工为主，又在沿线农村招募了3万多农民，从事筑路，于1937年初开工。1939年，重庆到江津68.15公里的第一总段工程基本完成。

华西为了这项工程，在重庆刘家台办了协和火药制造厂，由于管理问题，不慎于 1937 年 7 月发生震动全市的大爆炸。因事起仓皇，致使市民受灾多人，不想还被日本人用来作为企图发动战争的一个口实。

经过当场答辩，事实清楚，无须争议，胡子昂表示华西愿赔偿损失。但这件事源起于华西协和火药厂业务工作失误，应免除刑事责任。

重庆市长和市府秘书长又亲自出面代为解释，贺执中准免于追究刑事责任。

后来，华西拨款 3 万元，抚恤死难者家属，医护伤残职工，赔偿受害者的损失，这桩惊人灾案终告了结。

夹缝中的生存之道

商场如战场。这一点，胡子昂在半个多世纪前的 30 年代就已经有了很深的体会。

胡子昂初回华西时，就发现公司里的人事关系很复杂。其时，公司的董事长是刘航琛。华西成立时，刘航琛投资所占的比例并不大，但是却对董事长一职窥视已久，他不想让这个拥有实权的职位拱手让给胡仲实兄弟当，自己又没这个实力，于是抬出刘湘 21 军中地位较高的资深师长甘绩镛来当董事长，弄得胡仲实兄弟哑巴吃黄莲，有苦难言，有苦不敢言。

甘绩镛本是军人，又是那种军阀混战烽火连天的年头，哪有心思兼管华西的业务？因此，董事长的实权实际由刘航琛行使，刘航琛成为华西说话算数的人。

刘航琛曾做过 24 军刘文辉的幕僚，和胡子昂一起共过事，胡子昂对他的老底比较清楚，而胡子昂和军界的联系与他相比也毫不逊色。因此，胡仲实兄弟力邀胡子昂去华西主持业务，除对他的才干确实十分信任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胡氏兄弟想打胡子昂这张牌，由胡子昂来镇住刘航琛。

果然，胡子昂加盟华西之后，股东股份比例发生变化，董事会改选，胡仲实被选为华西常务董事，权力重回胡氏兄弟手里。

胡子昂的人生阅历决定了他的性格。他既有善于谋略、工于计谋的一面，又有豪爽、豁达的一面，为人和善，深获人心，这使他在经营管理的道路上挥洒自如，游刃有余。

其实，他始终生活和工作在夹缝之中。

作为华西的经理，他是“四面受敌”：军阀与华西、投资人与华西、其他企业与华西、社会与华西等等，所有的矛头都是向他这个经理指来。他是这重重夹缝中的一根活动杆杠，活动得好，华西的业务就能蒸蒸日上，活动得不好，华西就会走上绝路。

在公司内部，也是矛盾重重。

股东们的意见是众口难调，就连胡仲实、胡淑潜兄弟也有矛盾。两人虽为同胞，却是性格各异。仲实为长，性格较稳重，掌握着华西发展的全盘；胡淑潜的个性比较急躁，又是留美的洋学生，在华西的工程技术方面是权威。公司初成立时，曾有动议推他为经理，因此他在处理问题时常常越级越权。为此兄弟二人常常闹得面红耳赤，相互见面也不说话。这时，就只有胡子昂站出来替他们解围。转寰其间，成了子昂的家常便饭。

华西红火起来之后，重庆其他的实业家们便盯上了这个势头正旺的企

业。

经营民生公司的卢作孚便是其中之一。

民生公司是卢作孚创办的川江最大的航运事业，而华西公司主要经营工矿建设事业，它的设备、器材、原材料等等，几乎都要依靠民生公司的运输力量。而卢作孚和胡仲实各有抱负，心高气傲，都想以四川为基地，运用各界力量，将实力向西南以至全国拓展。

华西的发展要倚靠民生的运输，卢作孚便借此要插手华西。他几次派他的得力助手、弟弟卢子英前往华西洽谈，意欲投资入股，被胡仲实拒绝了。

胡仲实的态度很明确：“不能让民生吃了华西。”

但是，麻烦接踵而至。

华联钢铁厂有一批产品要出川运往上海，去民生公司租船，被民生以冬天天长江行船不便为借口，拒绝了。

卢作孚轻而易举地就扼住了胡仲实的脖子。

胡子昂深感如此对峙下去，将对华西的发展大为不利，于是决定亲自出面，协调双方关系，缓和冲突。

胡子昂几次派人约请卢作孚面谈，都被他以工作忙为由辞掉了。对方说，如果有空，卢作孚将去面见胡先生。当然，这只是托词。

卢作孚确实忙，管理着偌大的民生公司，又身兼长江峡防局局长、四川省建设厅厅长等数职，每天的事务性工作确实很多。但是，也不至于忙得连和胡子昂见面的机会也没有。何况胡子昂在重庆也是知名度很高的人，两人私交也不错，不过是故意摆脸子给胡仲实看。

胡子昂决定来个不期而至。

卢作孚有个爱好：冬泳。每日下午，都要和弟弟卢子英一道，带着峡防局训练队的学生下嘉陵江洗冷水浴。

胡子昂决定和卢作孚来个水中相会。

这日下午，胡子昂要了车，直奔北碚。赶到江边，卢作孚已在水中挥臂畅游了。胡子昂也是个运动健将，学生时代，曾是学校的足球队、篮球队队员；在川康时，又是马上好手。但是，数九寒冬在江里洗冷水浴，他却从来没见过，这样贸然下水，的确很有些危险。

但是今天，他已决定：豁出去了。

做了几个准备动作，又往身上泼了些冷水，一纵身，跃入江中。

他顺水而下，直追卢作孚。

卢作孚已经看到他了，也不打招呼，待胡子昂靠近，突然一个鹞子翻身，挥臂破浪，逆水而上。

胡子昂赶紧掉头，紧追不舍。

两人在水中斗了几个回合，然后慢慢向岸边游去。

上了岸，两人同时哈哈大笑。胡子昂看着卢作孚细长结实的身体，赞了句：“卢先生好身手！”

卢作孚笑答：“胡先生的游泳技术也不错嘛，想甩还甩不掉。”

换好衣服，卢作孚邀胡子昂上了他泊在江边的私人游艇，让人倒了两杯白酒，递一杯给胡子昂：“喝一杯暖暖身子，别感冒了。你这次单刀赴会，该不是专门来陪我冬游的吧？没听说胡先生有冬游的爱好嘛。”

胡子昂道：“来请你去临江楼吃火锅。”

卢作孚笑问：“谁作东？”

胡子昂：“胡仲实作东。”

卢作孚：“噢？那我去。”

临江楼涮了一顿又麻又辣的火锅，胡仲实、卢作孚杯酒释前嫌。

随后，卢作孚又回邀胡子昂、胡仲实兄弟及华西的头面人物同游缙云山。在缙云寺，卢作孚请胡子昂等人吃了一顿斋席，一连八八六十四道素斋小菜让华西的领导人们惊叹不已。

一项重要的协议就这样在餐桌上达成了：华西公司接受卢作孚的投资，卢作孚不干预华西的经营管理，民生公司在运输上给华西以大力支持。

这项协议的达成，对华西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民生和华西两公司的利害冲突得以缓和。

当然，以后双方难免还有一些磕磕绊绊，也都是胡子昂出面，方得以化解。

华西备忘录

1936年初。华西公司。

“现在，我向各位董事汇报一下关于水泥厂的筹备情况。”胡子昂坐在经理席上，以宏亮的声音向华西的同仁们介绍水泥厂的筹备运作情况。

改建自来水厂投标的成功，使胡子昂在公司的声名大振，同时也使华西在重庆的工商界声名大增。几乎与此同时，他们又马不停蹄地开始四川水泥厂的筹建工作。

办水泥厂，这个主意首先是由宁芷村想到的，他在上海受到水泥大王刘鸿生的启发，决定也办一个水泥厂。回来后和大家一合计，董事们一致认为，要发展实业，水泥是一种基本材料，四川当时交通不便，产业结构单一，大量外国“洋灰”倾入内地。要抵制大国的经济入侵，发展地方经济，大搞工程建设，这水泥是首先的必需品；同时，华西的业务要发展，要大量承建项目，也特别需要设厂制造水泥。因此，建一座水泥厂在重庆已是势在必行。

于是，华西的同仁们立即着手筹建四川水泥厂。

“……关于厂名，我们认为，”胡子昂继续说道，“在中国，水泥被叫做‘洋灰’，制造水泥的工厂被叫做‘洋灰厂’，但是，我们华西建水泥厂，是为了发展四川的经济，为了四川的几千万同胞，为了富国强民，因此，我们坚决不能叫洋灰厂，而叫四川水泥厂！”

胡子昂的话博得董事们一阵热烈的掌声。

四川水泥厂厂名的确立及相应的有关构想，得到刘湘及重庆金融界、工商界的热烈响应。

消息不知怎么还传到了远在南京的蒋介石的耳朵里，他对华西公司的一片爱国热忱十分赞赏，特别指示由他派遣入川的参谋团秘书长，约见公司经理胡子昂、水泥厂筹备主任宁芷村，表态说：“如果办厂有什么困难，政府将尽量协助。”

蒋介石的口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胡子昂、宁芷村等人分头联系，仅几天功夫，就认足股本120万元。

水泥厂厂址选在玛瑙溪，那是重庆南坪场的地界，是胡子昂的家乡，因为位于长江边上，便于水运。厂址联系自然是由胡子昂去办成的。

厂房的建造和机器的安装，全由华西公司负责，专门成立了水泥厂工程

处，由胡子昂担任主任，康振钰、陆数言担任副主任。机器是华西在上海以投标的方式，向丹麦史密司厂和德国米亚格厂购进的，由丹麦工程师负责厂房设计和机器安装。

一切进展得非常顺利，却最后在运送机器上遇到了麻烦。

玛瑙溪当时并无码头，全套机器都是从上海运来的，但是轮船只能停靠在江心，需把机器吊装上木船，再运到江边岸上。

最麻烦的是水泥厂的锅炉，重达 10 余吨。胡子昂亲自会同工程人员，站在轮船上，指挥起卸。

先是选了一条最大的木船，比试了一下，连装都装不下，载重量恐怕承受不起，弄不好就会沉入江底，数十万银子真的就会打了水漂。

再改用两只木船并排起运，不想锅炉尚未全身下船，那船已多半溺水，眼看着就要水漫船舱，只得把锅炉吊回到轮船上。

华西的头头脑脑们站在岸上，眼见着锅炉搁在船上，泊在江心，一筹莫展。

轮船在江中泊了两天。

轮船被困、停工待料，每分每秒都是公司的银子白花花的在向外流。

作为水泥厂工程处主任、华西公司经理，胡子昂比谁都更加焦急，恨不得让锅炉长出翅膀，飞向岸边。

这天夜里，胡子昂躺靠在床上，久不能成眠。他闭着眼睛，恍惚间仿佛看见自己成了三国蜀帝刘备手下的武将，全身盔甲，手握长剑，冲上曹操的连环船。他的前面，将士们喊杀声冲天而起，他却在曹操的木船上流连不前。他感到很奇怪，怎么走在船上会如履平地。他正惊诧着，蓦地，一支长矛劈面向他刺来……

他一惊，出了一身冷汗。脑子却突然一亮，禁不住喊出声来：“太好了！有办法啦！”

胡子昂赶忙披衣下床，摇动电话，把宁芷村从梦中叫醒。胡子昂兴奋地说：“芷村，我有办法啦！”

宁芷村马上来了精神，急问道：“快说子昂，你有什么好办法？”宁芷村不用问，就知道胡子昂指的是哪一件事。相互间的配合，已是心有灵犀。

胡子昂说：“用四只大木船，以钢绳纵横捆扎联成一个巨大船筏载运。”

宁芷村在那边一对白大腿，喊道：“太好了！并不复杂嘛，怎么早没想到？子昂，明天我在岸上准备一挂九千响鞭炮，祝你成功！”

次日一早，胡子昂就命人找来四只大木船，把木船扎成联筏，结果锅炉载运一次成功。

宁芷村果然在岸边放起了鞭炮。

1937 年 4 月，四川水泥厂正式投入生产。从筹备到投产，仅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就建成了中国首屈一指的用湿法生产水泥的工厂，年产量达 4.5 万吨（27 万桶）。

华西的事业蒸蒸日上。

一时，前往重庆约清华西建厂或改建的各地企业，纷纷而由华西前往各地建厂或改建的有内江、江津、成都、泸县、遂宁以及湖北武昌等地的电力厂。

在重庆、成都两地承造的较大建筑，如学校、机关办公用房、仓库、住宅等，不胜枚举。

行政院长孔祥熙所属的一个企业要在四川建一个仓库区，就是胡子昂去南京签订承包合同的。

从南京回来，随即又代表华西去成都商谈承包四川大学土建工程的合同。

这是一项很大的工程，包括办公大楼、教学大楼和大量的宿舍楼。当时川大的校长是任叔永，本来胡仲实在和他意向性的商谈中，已和他说好了，承包工程不要抽取回扣，而由华西送给他 2000 元手续费。

2000 元在当时不能说是一个小数目，胡子昂在重庆的一幢房子“鹤庐”押给银行，价值是 5000 元。

胡子昂到成都后和川大校长任叔永进行了进一步的商洽，任叔永忽然改变了主意，说 2000 元的手续费他不要了。胡子昂问为什么，任叔永说：“子昂，你的事我以前也听说过一些，今日见你，方知传言不虚。以前，我总以为搞工程承包的人都黑得很，通过这次谈判我才明白，工商界也有像你这样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人。”

胡子昂说：“其实，你可以把这笔钱用作接待工程人员来去的应酬费用。读书人讲的是心安。”

任叔永这才将 2000 元收了下來。

胡子昂和任叔永订好合同后，即将该工程全部交由陆淑言经管，不到两年就全部完工，在成都传为美谈。

华西公司在承建基础工程中声誉大振，资金滚雪球式的不断积累，公司实力大增，同时，自办工厂也越来越红火。

这时，胡子昂便和胡仲实、胡淑潜兄弟以及宁芷村、陆淑言、田习之等同仁商量，大家一致认为，在当前的西南，把华西发展成一个托拉斯企业，是完全有可能的。

华西为实现这个目标，便计划建立若干工厂。从 1933 年起到 1937 年“七·七事变”时止，除早已设立的汽车修理厂外，先后建立了华兴机器厂、华联炼钢厂、华西猪鬃厂、华泰木厂、华一砖瓦厂，还有矿场，每厂均冠“华”字为名，形成一批“华西系统工厂”。

在“华西系统工厂”中，华兴机器厂和华联炼钢厂是两个主要厂。

华兴机器厂从 1933 年夏开始筹建，主要是收购上海穆藕初的中国铁工厂生产设备，这个厂子当时已具相当规模，凡一座较大型机器厂应有的设备，基本上都有，能从事制造多种机器、零件及枪支武器等。

华西同仁们为筹措这笔多达 30 万元的收购款，多方奔走。消息传到刘湘的耳朵里，他通过邱甲三透露了想造枪支的企图，表示可以支持。

胡仲实恐企业受其操纵，与胡子昂商量决定，由 21 军预付军械制造费，先后开出二三十万元期票，向银行抵借款项，分期向中国铁工厂付清了价款。厂址在大溪沟，有工程师七八人，工人 700 多，规模之大，设备之全，在当时的西南首屈一指。

华兴开工后，在生产上有一般生产与特种生产之分。前者是制造华西承建各项工程所需的一部分机器和配件，后者是承造刘湘所需的捷克花筒式手提机关枪。约 1936 年初，为刘湘造枪造到第三批前后共达 6000 支的时候，这件事为国民党行辕所侦知，一封密报送到南京蒋介石的桌上，说华西助刘湘造反。

刘湘本是四川军阀中发迹较早的一个，早年一直站在袁世凯一边，历经

大小战役，威名赫赫。后又追随吴佩孚，大打四川内战，地盘不断扩大，成为川军一方霸主。只是在北伐军节节胜利，大势所趋之下，才下决心投靠蒋介石，但反骨仍有，常常和其么爸刘文辉联手对付川军其他帮派，气势咄咄逼人，大有“统一四川、问鼎中原”之势。因此，蒋介石对他是很不放心的。造枪一事告到蒋介石那里，蒋的疑虑和惊怒是可想而知的。

华西常务董事胡仲实获知这一情况后，十分担忧，连忙找胡子昂密商，请求对策。

胡子昂找到了当时的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

早在胡子昂任刘文辉的川康边务处长时，他和翁文灏便相识了，翁文灏对胡子昂的才干颇为赏识。胡子昂几次致函翁文灏，解释华兴机器厂只做生意，不问政事，请翁秘书长转致蒋委员长，请获谅解。

幸好，翁秘书长面子大，蒋介石没再追究，只叫重庆行辕以 40 万元价格购走华兴机器厂的机器设备，断了刘湘的后路。

此后，华兴改变了生产方向，继续经营。

华联炼钢厂原是为了解决华兴制造各种机器，特别是造枪所需的各种钢材而设立的。

是当时刘湘 21 军财务处长刘航琛牵的线。

刘航琛经请示刘湘同意，作为 21 军与华西合办，资本额 50 万元，各出半数，有关建厂及以后的一切经营管理，全由华西负责。厂子原来就设在华兴机器厂隔壁，到 1936 年 3 月，已将电炉、化铁炉各两座，汽锤、淬火机、烘模炉各一座，以及其他应用设备，安装完毕。

这时，胡子昂又提出兴办钢铁工业，不应局限于专事电炉炼钢，应充实炼钢、炼铁、轧钢设备，扩大生产局面。

经华西董事会批准决定再行增资，于 1937 年初在江北香国寺另行选定厂址，购地 3 万平方公尺，着手建造厂房、办公室、宿舍，在国外订购设备、器材 100 多吨，并在彭水、涪陵、巴县一带，购置铁矿、粘土矿数处，在巴县、永川购置煤矿数处，解决煤、铁及耐火砖材料的来源。

购地建厂还有一番风波。

华西购买的是江北周家湾窦泽民、窦次亨的租地共 90 亩。购地是高价，主人得了便宜自是欢喜，但却苦了租地的佃农，没有了地租便意味着他们会被饿死。因此，当地的村民不干了。

此时，华联已经砌墙围地，准备开工建厂了。佃农任学甫等组织群众，以该厂修筑围墙阻碍了观音桥至香国寺和运中村至香国寺的道路为由，挖毁围墙，迫使该厂不能开工。砌墙、推墙，几经反复，双方相持不下。

这时有人对胡子昂说：可以借助政府的势力，将闹事的群众镇压下去。

如果当时胡子昂愿意，这自然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是胡子昂说：“土地是农民的根本。我们不能把人家的地买走了，就不管别人死活，得找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法子。”

整整三个月，胡子昂在寻找对策。

最后，还是胡子昂妥协了。

华联钢铁厂做出让步：由华联厂开辟两条道路，一条是由狗屎堡至香国寺，另一条是由接龙山辟出一条通往运中村、香国寺的地道；另外，该厂招工尽量收录本地农民入厂工作。

华联厂很快建成投产。

资金和人才是企业发展的两大保证。

胡子昂和胡仲实、胡淑潜兄弟，为了公司的发展，颇费了一番苦心。

他们的为难之处是，既要利用地方势力，积聚资本，发展业务，又要独立自主地经营企业，自己说了算。

而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创办一个像样的企业，要同地方军政势力发生联系，就不易筹措资金，不易展开业务。而同他们发生联系，要不受其控制，也是很难的。华西创办时就注意到这个问题，既要依靠地方军政界和金融界的支持，又要抵制其对企业的控制。

为此，华西公司采取了两条办法：一是在投资上加以控制。华西开业时的资本为 25 万元，胡仲实弟为了能掌握企业的权力，共占资本总额 50% 以上，其余才由军政界、金融界投资。

1935 年底，当胡子昂去华西时，公司大幅度增资。除以公司的盈利转入资本外，邀请各方面人士投资，并以师生关系把南开大学校长张伯龄拉来入股。

尔后国民党政学系的杨永泰为拉拢四川地方势力，投资 20 万元，也不能干预华西的一切事务。这是事先便和他说好了的。

华西在兴办过程中，有一条很重要的成功经验，那就是重视技术和技术人员，各方罗致人才，极力扩充技术力量。

华西是经营技术工程的企业，办好办不好，关键在于技术力量。当时内地甚少技术人员，而省外人士感到四川军阀割据，政局不稳，生怕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又嫌内地生活待遇低下，视若畏途，裹足不前。

华西公司针对这种情况，采取“重金礼聘，从优照顾，妥善安置，发挥专长”的办法，由胡淑潜以中国工程师学会会员的身份，运用留美同学的关系，邀约各地技术人员来川，并向被邀请者提出四条保证：

- （一）薪资在不低于省外一般标准的基础上，提高 50%，以中钞发给（因地方钞为中钞的八折）；
- （二）来川后生命财产的安全由华西公司负保证责任；
- （三）来川旅费（包括家属，家俱运费）及安家费用一律由华西负担，并供给舒适住宅；
- （四）安排适当工作，发挥专长。

这样，从东北、天津、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先后延聘了不少技术人员参加华西工作。

胡子昂等华西主要负责人重视和善待这些技术人员，除指派专人经常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帮助解决外，还亲去访问接触，一道吃饭玩乐，关心他们的困难，疏解他们的纷争，发挥他们的所长，使之感到乐得其所，特别是在其他地方未得重用的技术人员，更感到华西对他们的尊重，把华西看成是自己的事业。

到抗战爆发时，华西已拥有从事电力、机械、矿冶、建筑、化工、交通的高级工程技术人员达 50 余人之多，其中留美的 18 人，留英的 6 人，留德和留日的 4 人，还有国内大学毕业的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 30 余人，按工程技术来分，电力 16 人，机械 6 人，矿冶 8 人，建筑 6 人，化工 7 人，炼钢 4 人，交通 4 人。

华西还创办工商专科学校一所，设工商管理、土木工程、会计三科，培养中级技术、管理人员，不断扩充技术力量，形成了“华西集团”一支实力

雄厚的技术力量。这批技术人员，阵容之整齐，力量之雄厚，即创办在先并以延揽人才著称的卢作孚民生公司亦瞠乎其后，国内其他地区像这样拥有各种技术力量的企业亦在当时所罕见，对于华西公司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华西在经营上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抗战爆发之前，华西已有营业部和汽车部。营业部由上海分公司进货内销，专门经营工业所需的机器、零件和电讯材料；汽车部在西南独家经销美国福特汽车及印第安轮胎，经营一直很好。由于时局发生重大变化，华西承建的工程业务暂时受到影响，而公司所属机构很多，有大批职工，必须设法维持，以待时机，继续发展实业。

1937年7月，胡子昂召集公司各部、处、室、股长以上人员应付非常时期临时会议讨论并拟定了一些因应时势的维持公司局面的办法，并将会议纪要电告在上海的胡仲实。

胡仲实接获重庆电告的意见后，即重新安排华西业务，撤上海分公司大部分人员至香港成立办事处，以相当大的力量从事进出口贸易活动。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华西公司召开董事会，议决暂营进出口贸易，以维持公司局面。于是成立贸易部，其下分设业务、出口、汽车三组。业务组经售进口物资器材，出口组承办猪鬃、药材为主的出口物资，汽车组主管进出口物资的运输，兼营汽车修理。为此，华西公司在香港购置卡车100辆，先后从广州湾、仰光、海防等地运进钢板、钢筋、机器、小五金等物资器材。直到1941年，国民党贸易委员会颁布进出口贸易管制法令，由该会统辖一切进出口物资，华西才结束了进出口贸易业务。

从1937年到1941年的4年间，华西的进出口贸易活动，尽管遭受了这样那样的挫折，仍然获利不少，起着维持公司的作用。

华西公司从1932年成立，到1939年被孔祥熙吞并、改组成中国兴业公司，短短几年间，发展成为当时西南的一个著名的联合企业。

而胡子昂，也就是在这短短的几年间，由于成功地经营华西公司，使他从一个四处漂泊的青年，迅速成长为一位享誉西南的实业家，与胡仲实、胡淑潜兄弟一起，被并称为“华西三

第4章 兴业风云

孔祥熙想一口吃掉华西

1938年7月。武汉。大都会饭店。

已是深夜了，胡子昂伫立在7楼的一间卧房的窗前，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不仅因为热，无望的等待比这座火炉般城市的燥热更难受。

要求追贷加款的报告交上去三天了，孔祥熙还迟迟没有答复。

胡子昂为华西的前途担忧，更为中国的前途担忧。

1938年的中国，正处于腥风血雨的苦难深渊。

日本法西斯挥动着屠刀，从东北而华北，直下京津；由上海而南京，直逼武汉，扑向中国腹地。

蒋介石集团在连续丢城失地之后，准备继续沿江西逃，而最好的避难所，即是凭借着长江天堑，山高路险山重水复的山城重庆了。

大中国在哭泣。

胡子昂的心，亦在哭泣。

尽管在安庆等地保卫大武汉的枪声已经打响了，但在此时城市里却静得出奇。街道一片黑暗，夏日武汉车来人往市声鼎沸的热闹与繁华已成往日风景。胡子昂知道，那是灯火管制，以防日军的空袭。

此刻，作为华西公司的总经理，在胡子昂的心里，感到华西的前途，就如这城市，一片黯淡。

一个多月前，他第一次来武汉贷款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那次，他是带着一份雄心勃勃、年产30万吨钢的建厂计划，来向国民政府要求贷款的。

早在京沪等地失陷之前，国民政府就曾发动工矿企业内迁，大力倡导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用深情的言辞动员实业界人士群策群力建设大西南，并许诺说，“国民政府奖掖民营实业”。

这时，胡子昂等华西首脑们的精神振奋起来了，他们感到，在这种建设大西南的强烈呼声中，华西可以大展宏图了。一方面，华西拥有设备和技术力量，可以制造轻型武器（他们曾经就为刘湘制造过轻机枪）支援前线，可以为抗日出一点力；另一方面，既然政府扶持和奖掖民营实业，那么贷款方面，一定就可以方便多了。和过去与当地军阀打交道的办法一样，他们准备“借其力量谋求发展，经营管理力主自保”。

鉴于如上考虑，华西董事会决定：筹集资金，把华西所属的华联钢铁厂扩大力大型钢铁企业，以供给将来制造军火用。

为此，华西推胡子昂为全权代表，于1938年5月，带着一份年产30万吨钢的扩建钢铁厂计划，飞赴汉口，向国民党当局申请金额为600万元的贷款。

此时，日军的飞机常到武汉上空进行大规模的空袭。为了避免与敌机相遇，从重庆到汉口的飞机是后半夜快到凌晨才起飞的。飞机抵达汉口后，胡子昂只在候机大厅里稍作休息，等武汉政府机关上班后，立即直奔中国实业银行，找其董事长傅沐波。

过去为了款子的事，胡子昂没少找过傅沐波，因此也是老相识了。傅大致翻了一下胡子昂那份雄心勃勃的建厂计划，抬头冲着胡子昂意味深长地笑

笑，说：“如此巨额款项，得由财政部长大笔亲批才行啊。这样吧，胡先生，你旅途劳顿，先住下，休息休息，我把你的这份计划转呈孔院长。”

胡子昂急道：“傅先生，我哪还有心思休息享受？公司方面等着这笔款子购买设备哪！”

“心急吃不得热豆腐嘛，”傅沐波拍拍胡子昂的肩膀，说：“先住下再说。”

傅沐波用自己的车把胡子昂送进了这家大都会饭店，让他等着回话。

次日一早，傅沐波便打来电话，用兴奋的口吻对胡子昂说：“孔院长要亲自召见你，洽谈贷款事宜。你准备一下，过 15 分钟，我的车来大都会接你。”

胡子昂赶到行政院的时候，行政院长孔祥熙已在他的豪华接待室等着了。此时的孔祥熙除担任行政院长外，还兼着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四联总处董事长，掌管着国民政府的财政大权，是蒋介石的钱袋子，权倾朝野，同时在座的除傅沐波，还有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翁文灏、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等人。

胡子昂暗暗吃了一惊：以这样的阵势来接待自己，非同小可！

孔祥熙一身白色西服，头梳得油光锃亮，他打着官腔说：“华西要贷款 600 万？”

胡子昂欠了一下身子，试探性地问道：“是不是太多了？”

“不，”孔祥熙挺了挺身子，决然说：“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你们想过没有，重庆作为抗战大后方，钢铁工业当然不可缺少，但是所拟规模大小，远远不能满足抗战需要。”

接着便大谈国民政府着力建设大西南的构想和重庆重工业远景，最后说：“华西扩建计划应重新拟议。”

胡子昂的心一下子凉了。

在送胡子昂回大都会的路上，傅沐波阴阳怪气地说：“胡先生，恭喜你啊！”

“贷款没有着落，喜从何来？”胡子昂不解地问道。

傅沐波点上一支雪前，从前座上回过头来，假笑着对胡子昂道：“孔院长对华西情有独钟啊。其实，孔院长对你们华西的底细知道得很清楚，他曾派人调查过华西的情况，了解到华西有机器厂和矿场，钢铁厂的建厂工程也正在进行，还有一支比较整齐的工程技术队伍，很有发展前景，准备重点扶持。总裁大当家的看中你们华西公司，你说，难道这不是你们华西公司的福气吗？”

胡子昂听了，却惊出一身冷汗。

他现在算明白了：孔祥熙想吃掉华西！

果然，傅沐波又说：“孔院长的意思是，由我们官办银行给华西投资撑腰，并以华西为基点，逐步扩展，建立一个由他直接掌管的大后方重工业之霸。胡先生，华西的前景是非常可观的哟。”

胡子昂委婉地说：“是这样的，前景令人鼓舞，但事关重大，容我跟华西董事会协商后再作答复吧。”

到了大都会后，等傅沐波一走，胡子昂立即给华西胡仲实兄弟挂了电话，汇报了孔祥熙的意图，胡氏兄弟一听就火了，胡淑潜说：“我们经营这么多年才有华西的今天，他孔祥熙就想一口把我们吃掉了，他也忒狠了。这样的

款子再多，我们也不能要，如果同意改组的话，无异于引狼入室。子昂，你回来，这笔款子我们自谋解决。”

胡仲实也说：“是啊，改组是不能同意的。但是，如果直接回了，孔祥熙肯定会很恼火的。孔大当家可不是好得罪的。”

又问胡子昂：“子昂，你有什么两全其美的办法没有？”

胡子昂拿着话筒沉吟了片刻，说：“既要保住华西，又想不得罪孔祥熙，这个办法不好找啊。他既然动了这份心思，你想让他收回去，是很难的。只有一个办法，就好比下棋，马要过河，要堵注它，只好拿一枚子别住它。”

胡仲实忙问：“用哪一枚子来别这个膘肥体壮的马腿？”

“宋子文，或陈立夫、陈果夫。”胡子昂说，“我们可以对傅沐波说，如果他那里贷款有困难，我们可以找中国银行或中国农民银行。他怕华西落入他人之手，一定会转变策略。”

胡氏立即赞同：“好，前者是宋系的，后者是 CC 系的，跟孔系水火不容，看他孔祥熙怎么办！”

果然，当胡子昂对傅沐波婉转地表达了这层意思后，孔祥熙见改组的时机尚未成熟，便立即批复由中央信托局给华西贷款 60 万，想以此拴住华西。

这第一关是过了，但是第二关呢？

60 万与 600 万，孔祥熙给的钱太少了，与华西庞大的发展计划相差甚远，不得已，只得再度向他要钱。

这一次，胡子昂就是来向孔祥熙要求追加贷款的。

此时，胡子昂不禁为华西的前途担忧：这一次，孔祥熙会给吗？

三天后，中国实业银行董事长傅沐波和中央银行副总裁分别给胡子昂传达了孔祥熙的批复：“前帐未清，碍难照准。”

一个多月就要求了结前帐，这不是有意刁难吗？这一次连面都没见。胡子昂无奈，只得快快而回。

孔祥熙显然也是在跟胡子昂下棋：凭借着手中的权力，将了华西一军。

这一军将得华西进退维谷。

此时，华西已跟国外订购了大量的机器设备，正等待付款。同时建厂也亟需资金。

古往今来，钱这一个字，难倒了多少英雄好汉。

华西已成骑虎之势，上也难，下也难，进退维谷。

那些日子，华西主脑们愁眉不展，愁肠百结。每日聚在一起，讨论华西公司的出路，感到已处如此困境，也别无他法了。

事实上是，此时，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谁不在趁此机会，挟其政治、经济的强大势力插手后方的工矿、交通、贸易各种事业以开拓其在西南的垄断局面呢？而又有哪个如华西这样的民营企业能躲得过他们的血盆大口呢？

胳膊拧不过大腿，就官商合办吧。

唯一能让他们找到安慰自己的托词是：无论是贷款还是投资，只要能达到建成一个大型钢铁企业，有利于华西的发展壮大，有利于繁荣大后方的钢铁事业，愿望算是实现了。

恰在这时，傅沐波又衔孔祥熙之命，来到华西，再度提出官商合办的问题，加以婉劝。胡子昂、胡仲实代表华西董事会正式回复傅沐波：同意官商合办华西钢铁企业。

从此，这家曾经一度名震西南的民营企业落入虎口。

“华西三胡”中计

华西松口之后，孔祥熙得意非凡。

1938年10月，国民政府在大武汉保卫战的枪声中迁至重庆。

刚把各办事机构安顿下来，孔祥熙便亲自率领财政部次长徐堪、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中央银行总务处长、中国实业银行董事长博沐波、中央银行业务局长盛莘臣、中央信托局理事长孔令侃等孔系要角一行数人，直奔华西，急于商谈官商合办企业事宜。

孔祥熙虽贵力行行政院长，但是为了他那一己私利，也不得不对华西三胡频送秋波。

一见面，孔祥熙就盛赞华西在四川所办的各项实业，所铺排之辞，有时让人听来觉得与他的行政院长身份不符，如谈到华西各项事业卓有成效时，就使用了“不朽功绩”这个词。胡淑潜素性顽皮，听着觉得不对劲，便对坐在身边的胡子昂附耳道：“真让人肉麻。”

这样的场面太严肃了，胡子昂只得表情十分严肃地点点头。

后来，“三胡”陪这些中央大员视察各厂，孔祥熙又说：“过去，你三位有相当的成绩，下一步公司初办，非得请如你们这样有经验的人来主持不可。”

故示倚界，意在拉拢，是给“三胡”一点想头。

接下来便进入实质性会谈了。

新公司的名字是孔祥熙提出来的，取名“中国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名字倒是有些气派，没有异议。

华西同仁想利用官僚资本的政治经济力量来发展壮大企业，但又怕官僚资本趁此机会控制了企业的经营管理大权，胡子昂、胡仲实经反复权衡、会商，给新公司筹组定了三项合作的前提条件：

第一、将来的公司董事、监察，必须尽量容纳华西主脑人员；

第二、行政管理和技术管理人员必须以华西人员为主干；

第三、由华西分别邀请四川军政界、金融界人士参加投资。

此时，孔系官僚资本势力唯恐华西不入掌中，便玩了一招“欲擒故纵”，先是一切都行、行、行，心里却暗想：等把你们装进袋里再收拾你们。

双方争论的焦点在新企业的组织上。

华西方面的想法是，不能把我们辛苦上10年的所有企业部纳入新企业，从而被这些官僚一下子全部卡住了脖子。因此只愿将华联钢铁厂一家交给孔祥熙组合新公司，而华西所掌握的铁、煤、耐火材料等矿与新公司则是业务关系，建立长期的业务往来，从中取利，华西其他承包新公司的建厂工程，则由所属企业承造。

而孔祥熙的胃口有多大？大得要把华西所有的东西一口吞下。孔祥熙坚持要把华西公司、华联钢铁公司、中国无线电公司，即所有华西企业，一古脑儿全装进新公司里，说是免得日后发生“肘腋之患”。

双方各执己见，相持不下，新公司组建工作因之搁浅。

财政部次长徐堪站出来劝华西首脑，但“三胡”表示决不让步。

孔祥熙对这三个软硬不吃的主很是恼火，便拿出蒋介石来吓唬人。

1939年初，孔祥熙在由财政部、经济部联名的投资公文中，以硬梆梆

的口气批复道：

钢铁、电业、矿业均属重工业，与抗战建国息息相关。因是，必须由华西、华联、

中电三公司合组中国兴业股份有限公司……此举深荷总裁赞许！

华西首脑拿到这份批文不禁都愣住了。

胡淑潜抖着批文，气得嘴唇发紫，连声说：“瞧瞧，瞧瞧！说得多好听，‘深荷总裁赞许’，狗屁！”

说是狗屁，却不能把他的批文当狗屁办。华西同仁不敢硬抗，只得又找财政部次长徐堪，让他出来转圆。

总算孔祥熙给了“三胡”一点面子，将华西的名字保留下来，而华联钢铁厂、中国无线电公司、华兴机器厂及煤、铁、耐火材料矿等，被一并纳入了新组合的中国兴业公司。

中兴公司扩建工程的基建部分及所需的少数材料，由保留下来的华西承包和代购。算是孔祥熙给“三胡”留了汤。

一场吞并风波才算平息下来。

孔系官僚财大气粗，新公司资本额商定为法币 1200 万元，政府机关、国家金融机关和孔系银行、公司投资总额为 977 万，占 81% 还强；而华西三个企业和四川军政界、金融界总投资 223 万，占 19% 弱，对比悬殊，官、商资金比例一下子就拉大了。

胡子昂等人有苦难言。

人事部署上，孔系又耍了一个手腕，把控制企业管理的大权抢到了手。

股权优势丧失殆尽之后，华西主脑把最后一注押在了人事安排上。

华西自恃有强有力的企业管理和工程技术班底，又在最初的协商中提出企业管理以华西为主干的先决条件，而孔祥熙又表过态，说：“董事会应尽可能多有一些四川朋友”，由此以为控制企业不成问题。

但是到成立董事会的时候，华西主脑这才发现，这一愿望只不过是一个五彩的肥皂泡：

商股的比例不到五分之一，因此在董事会上谋到了不到三分之一的席位，算是不错的了。

董事长的人选，就更是可笑了。

第一次股东大会上，徐堪煞有介事地说：“关于董事长人选，我以为，兴办此种大工业，与普通的贸易大不相同，非有魄力雄厚之领袖，不能担当此重任，不易收效。”

马上就有人站出来：“孔院长实是新企业董事长最佳人选。”

这原就是预先排练好了的，徐堪当然就顺杆子往上爬了。他扫了一眼各位董事，说：“如孔院长能兼做兴业公司董事长，那是我们各位同仁的莫大的荣幸和福气，只是恐怕……”

徐堪故作欲言又止状，最后把目光落在“三胡”的身上，慢吞吞地说道：“只是孔院长要务在身，国务繁忙，如各位董事诚意甚笃的话，那么恐怕还得请公司资深董监胡先生仲实、胡先生子昂等联名上书劝驾，方有望请得孔院长出而就任。不知各位有何异议？”

讨论结果必然是以优势票数通过了。就连“三胡”也无法投反对票，因为孔祥熙实力太雄厚了，既然现在已经让人家一口吃掉了，就让他领导吧，也算是大树底下好乘凉了。

但是还要让他们联名上书劝驾，这就实在让人难以接受了。华西旧人们

对孔系的做作和拙劣表演感到无比的鄙视和恶心，同时也为自己感到由衷的悲哀，事已至此，自己又有什么能力改变这一切呢？

胡仲实、胡子昂于是联名上书孔祥熙，恳请他在“日理万机之余，略抽闲暇，关怀兴业公司的生存和发展”，这实乃“我等兴业同仁之大幸也”。

孔祥熙稍微忸怩了一下，答应就任新成立的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这一当就是10年，直到国民政府在大陆倒台。

正所谓一步错，步步错。

在孔祥熙的一手操纵下，华西一步步走进了他早已布设好的圈套。

根据公司组织章程，兴业公司设总经理、襄理、总工程师、总会计师各一名。同时章程又规定，公司一切任命，均由董事长提名，董事会通过聘任。

也就是说，既然昔日的华西主脑们现在选了孔祥熙作董事长，那么从此以后，就得由孔祥熙来主宰他们了。

一日晚，胡仲实驱车来到胡子昂的住处，向他透露公司人事任命情况，同时也是向他征询意见。仲实说：“今天上午，孔祥熙把我找到他的官邸，跟我商量了半天公司人事安排事宜。”

子昂问：“孔祥熙是什么意思？”

胡仲实说：“孔的意思，是让傅沐波担任总经理，让我担任襄理，让淑潜任总工程师，李达任总会计师。”

胡子昂沉吟了片刻，分析道：“从表面上看，公司的四个负责人，官商各一半，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大权实际上在谁手里。襄理是副职，总工只是分管工程技术，公司的决策、人事任免、财权等，都是掌握在人家手里。”

胡仲实长出一口气，叹道：“我就是为这事来跟你商量的。你想想，江山是我们兄弟打出来的，现在却让我屈于从属地位，我不干。”

胡子昂劝道：“是啊，中国人讲宁做鸡头，不做凤尾，但是你想过没有，如果我们把襄理的位子也让出来了，那不是更被动吗？我担心，淑潜一个单枪匹马，敌不过他们人多势众。我看你还是屈就一下吧。”

胡仲实答应考虑考虑再说。

随后孔祥熙主持召开第一次董监联席会议，通过公司的人事任免方案。

总经理是傅沐波，这都是事先把工作做好了，因此没有什么异议。

第二个是通过襄理的任免，孔祥熙忽然说：“我提议，襄理增为两人，由胡仲实和胡子昂共同担任。”

这个提议太突然了，与公司组织章程亦不相符。胡子昂和胡仲实面面相觑。

他们的第一个念头是，孔祥熙在搞阴谋，意在分散仲实的权力，并试图以此使胡子昂与胡仲实产生龃龉。

胡子昂刚想作出反应，辞谢这一安排，却见胡仲实腾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断然道：

“襄理只设一人，这是章程早就规定好了的，现在随便更改，与我们公司的宗旨不符。襄理一职，由子昂一人担任就行了，过去在华西，我始终是以常驻董事办理公司事务，此次兴业成立，我仍愿意做常务董事为公司尽力服务。”

胡子昂还想说什么，但胡仲实暗暗在桌下踢了他一脚，意思是就这么办了。

胡子昂仔细想来，觉得胡仲实这一着也算高明，既拒绝了孔祥熙不怀好

意的刻意安排，又没有削弱自己华西盟友的权力。常务董事是可大可小的角色，如此，他便进退自如了。

孔祥熙的脸上有点挂不住，但又不得不同意胡仲实的意见。“好吧，”孔祥熙干笑笑，对傅沐波说，“你以后遇事要多跟胡襄理、胡常董协商办理。”这句话后来并没有兑现。

胡淑潜和李达的任命无异议。至此，公司的人事任命问题告一段落。公司成立的条件皆已具备。

1939年7月，中国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在重庆正式成立。

胡子昂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做了当时西南首屈一指的钢铁企业的副总经理。

剪彩的那天，盛况空前，轰动重庆，除本公司的官商要员外，社会各界名流何应钦、宋庆龄、宋美龄、宋霭龄、何香凝、贺国光、王正廷、乔义生及各国驻渝领事、外国工程师共200多人参加了这个空前盛典。

孔祥熙特邀军界领袖何应钦和国母宋庆龄主持剪彩，礼成之后，参观展览。展览大厅里，近300种化石原料分布在各个展柜，琳琅满目，令人眼花缭乱。胡子昂向客人一一介绍哪些可以炼钢，哪些可做化学原料，哪些产自东北，哪些取自西康、凉山等地，而哪些又是本省所产，说得名流们频频点头。

最后一项活动是来宾们合影留念。

总经理胡作非为，胡子昂辞职

中国兴业公司一经成立，立即显示出了官僚资本的强大优势。

公司成立后，傅沐波、胡子昂等人立即着手扩建钢铁厂，以谋求适应抗战的需要。

当时在重庆，大溪沟中国兴业公司钢铁厂和位于大渡口兵工署所属的钢铁厂，被称为国统区最大的两大钢铁企业。

1939年7月中兴公司刚挂牌不久，孔祥熙和经济部长翁文灏就联名上书蒋介石，称：

……以上两厂规模大约相当，在此抗战时期，钢铁所需甚殷。中国兴业公司所请添建钢铁厂等用意尚足，似可由政府予以协助监督，以收分工合作济要用之效。两厂所出钢品，拟商定品种，俾各有所专。政府办自应专重兵工之需要，中国兴业公司办厂，应就工业及交通建设所需之钢品妥为供应。但遇有兵工需要，应尽力协助。

蒋介石对这份冠冕堂皇的呈文倒是很欣赏。因此，当局对中兴公司扩建钢铁厂给予了充分的重视。

遵照有关要求，中国兴业公司最初设置钢铁部、矿业部、电业部等生产部门，以钢铁部为全公司的枢纽，钢铁部辖炼钢、炼铁、轧钢、机器、动力、火砖等6个厂，其中又以炼钢、炼铁、轧钢为生产的主体。对于主体部分的建设，计划设置120吨炼铁炉一座，30吨炼钢炉一座，28寸轧钢机一套，炼焦及蒸馏付产品设备全套。

为了实现这一扩建计划，一方面由国民党的国家银行、信托局给予贷款扶持，从公司成立以后的三四年间，先后8次共获当局108575万元的巨额贷款，用于扩建钢铁厂；另一方面，经孔祥熙报请蒋介石同意，通过国民政府向英国政府提出12万英镑的借款，订购器材设备。

中国兴业钢铁公司兴于战争，也败于战争。

初，因为打仗造枪造炮需要钢铁，因此华西才如此让人眼红。但是随着战争进一步推进，交通梗阻，运输困难，建厂面临的困难也就越来越多了。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前，公司派员去香港和海防等地抢购了一批器材回来。随后，香港、海防、仰光相继沦陷，国际交通线被封锁，中兴的器材来源遂告断绝。

气势汹汹的中国兴业公司受到了第一次打击：大大缩小建厂计划。

建厂改分两步进行。第一步先设 30 吨及 15 吨炼铁炉各一套，10 吨炼钢炉一座。第二步，再添建 18 寸轧钢机和钢丝厂、钢皮厂、钢管厂。

但是，正当他们的扩建工程正在紧张进行时，也正是日军飞机轰炸重庆最剧烈的时候。每日，警报声连续不断，工程人员不得不躲进防空洞，同时管理工作也不尽如意，因此修改后的计划实施一拖再拖，直到 1942 年才基本完成，到 1943 年开始实施第二步计划，到 1945 年 8 月抗战胜利才告结束，但是，此时，中兴公司早就过了它的巅峰时期，开始进入它的末路了。

中兴公司的第二个打击是，钢铁厂刚刚建成投产，市场需求的风向就变了。

中兴钢铁厂扩建以后，拥有 30 吨炼铁炉一座，5 吨炼铁炉一座，10 吨炼钢炉一座，1 吨炼钢转炉一座，1 吨炼钢电炉一座，10 寸轧钢机一套，制造机械、电器的各种工作机 100 余台，和一整套生产耐火材料的各项设备，并有两个铁矿、一个粘土矿，成为抗战后民营钢铁厂中最大的企业。

中兴钢铁厂 1941 年始出铁出钢，到 1942 年，生铁的年产量即达 5600 吨，等于全川民营钢铁厂年产量总和的 56%；1943 年的钢锭产量为 2250 吨，1944 年更接近 3000 吨，高出全川民营各厂总和的两倍；轧制钢品的数量，1942 年是 1179 吨，到 1943 年增至 2352 吨，1944 年又增至 2857 吨，远远超过民营各厂轧制的品种，可以说是重庆钢铁业中的“大哥大”。

但是产品的销路却让他们非常头疼。

原来，在抗战初期，由于各大工厂内迁，急需补充机件，新添设备，加之兵工厂生产、交通建设等的需求，重庆钢铁的生产和销售曾一度十分活跃。但是随着内迁和新厂矿的完成，特别是几家官营钢铁企业，如兵种署的大渡口钢铁厂、资源委员会的资渝、资和、电冶钢铁厂和威远钢铁厂的相继建成，中兴曾十分瞩目的兵工所需的钢铁产品，已不再向外订货，导致重庆乃至全川的民营钢铁业年产只不过万吨生铁、千吨钢锭，竟无法消纳，出现了滞销。

迫于形势，中兴钢铁厂只得倚仗官僚资本，运用行政权力，来支持和开拓自己的业务。

比如交通建设器材的供应，就是靠着孔祥熙给一手揽了过来。抗战中，国民政府依靠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运进物资，为此，蒋介石又决定修筑叙昆铁路与内地相衔接。当交通部把计划报到行政院孔祥熙处时，孔院长大笔一挥：“所需铁轨，全数向中兴公司订购”。

仅这一个订单，就够中兴钢铁厂吃一阵子了。尽管后来因日军南进，封锁了滇越、滇缅公路，这个计划被搁置，但交通部投放生产任务却一直沒有间断过；蒋介石为了控制大西北，曾由行政院迭令交通部转饬所属的宝天铁路局、西北铁路局加强这一地区建设，筑路所需的钢筋、钢钎等器材，也都一古脑儿落进了孔大当家所办的中兴公司，每次订单均在 200 吨以上。交通部所属的其他路局，向中兴订货的亦为数不少。

中国兴业公司挟其雄厚的资力，发挥其技术设备的优势，凭藉官商合办的得天独厚的地位，特别是靠着孔祥熙这棵大树，大力开拓业务，占领市场，为抗战时期的军需民用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

但，与此同时，中兴公司大量抢购原材料，政府的工贷又得多数，投放的订货占大头，一般民营钢铁厂便受到了排挤，或者减产，或者停工。綦江 70 余家土炉炼铁户，挤垮了 70%，云阳一带的 100 余户、川黔交界处 200 余户，竟全部停工。

市场竞争是非常残酷的。加之又有权力的斡旋，这便使商业律条显得残酷而且龌龊。

如果说，客观上的不利因素中兴还强以勉力克服的话，那么，人的主观因素使中兴公司逐步走向衰微之路。

在胡子昂等昔日华西首脑的眼里，当家人傅沐波实在是个让人难以共事、不可忍受的角色。

在公司开办之初，这位傅老总遇事还能找胡襄理、胡常董商量商量，共商解决办法。但时间久了，就完全不把这些人放在眼里了，自行其是。

胡子昂、胡仲实等人在一起，说起这位当家人便直摇头，对他所有关于建厂工程、生产部署、经营管理等的决策依据，归纳为“三靠”，即：一靠召开会议，二靠签发公文，三靠检索报表。因之全公司便盛行“三多”：会议多，公文多，报表多。

中兴公司各级管理机构中例行会议多得不可胜数，有公司会议，各处、室、委会议，部务会议，厂务会议，组务会议，各部和各厂之下又有科、组、股会议。各级负责人，大部分时间是在会议室中度过的。不少会议便流于形式，不起任何实际作用。

公司会议是企业行政的最高会议，照例是由老总傅沐波主持的。理应解决建厂工程和有关生产的重大问题，但是每次开会，各部门负责人大都只是吵着要钱，常为从孔祥熙四联总处、银行和信贷局所筹得的贷款的分配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傅总经理对于建厂工程和有关生产问题，既不懂行，又不了解实际情况，所以讲话总是不着边际的泛泛而谈，作出的决定，又大都是“限期完成该项工程”，或是“应加紧生产，如期交货”等空洞决定。

会议之后，傅沐波又大批公文，照例又是飭令有关部门照办的官样文章。上面是官样文章，下面也就行而效之。于是一系列的“等因奉此”从公司到部，由部到厂，由厂到组，由组到班，层层照转，转到生产者手里时，早已是猴年马月。由此浪费人力和财力，贻误生产的情况屡见不鲜。

有一次，中兴公司承造中央银行的发报机，一再延期，以至惹恼了本公司的大老板、中行总裁孔祥熙，给傅沐波好一顿臭骂，责令在一周内务必交货。没想到傅总经理仍然执迷不悟，旧病不改，又提笔在大老板的指令上签上：“应加紧生产，如期交货”，结果是，公文在各部门旅行了 10 天，这才转到了生产单位，不得不又再一次延期交货。

这一件事弄得孔祥熙哭笑不得，从此对傅失去了信心，暗下决心，在适当的时候让他滚蛋。

中兴公司的各种报表简直繁杂到了可笑的程度。具有时效性的，有日报、周报、月报、季报、年报到例行报表，还有专门性的建厂进度、产品生产、财务支付、人事动态、物料支领、考勤考绩、事务工作等等报表，各级管理机构一律都要按时造报，为此弄得手忙脚乱，不得不敷衍塞责，错报谎报的

情况颇为严重。因此检索报表，事实上是常常帮了傅总经理的倒忙。

公司内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工作效率极差。中国兴业公司从 1939 年 7 月正式成立以后，到 1945 年 11 月停止生产，它的管理机构每年都在调整。每次调整都以“精简机构”、“增进工作效率”相标榜，但是越调整，机构却越来越臃肿。

1939 年公司初成立时，设立二处（秘书处、总务处）、一室（会计室）、三部（钢铁部、电业部、矿业部），还是一个比较精干的管理机构。但到 1944 年时已被调整得面目全非，共有五处、三室、四厂、三会，在这些处、室、厂、会之下，还有课、科、组、股、库、队、总站、分站等 50 多个。其机构之庞杂，人员之众多，令人咋舌，公司总共有 500 多名职员，工程技术人员不过几十人，行政事务人员却占了 400 多，完全是一个官僚衙门式的管理机构。

更兼公司大大小小的负责人各有来头，各投资集团纷纷安置私人亲信，因人设事。

1941 年 3 月，孔祥熙派其亲信奚伦代替了总会计师李达。奚伦上任时，带来了大批人员分别安插在会计处的审核课、成本课、财务课和统计室，并分派出一批人到各个厂、矿、库、站。

随后国家总动员局秘书长端木梢来公司担任总稽核，把稽核改隶于董事会，与总经理平行，他又以专员、秘书、视察等名义任用了大批私人；傅沐波安置的私人更是遍布于总务、秘书、运输、业务等各个部门；孔祥熙还直接派来不少“专家”、“学者”，把技术室改为技术处，并特设钢铁供应委员会来容纳他们。由此，各个部门便互不买帐，各行其是，仅在财务开支上，各厂、处及各单位都可以“从权处理”，紊乱不堪。

最糟糕的是，公司上下贪污舞弊，弥漫成风，有如白蚁蚀堤，大大侵蚀了这家实力雄厚的企业。

中兴公司的财务管理，条条框框很多，但是却没有多少人真正按这些条规办事。首先总经理傅沐波就带头下条子动支款项，各部门负责人纷纷群起效尤。

傅沐波全家的费用开支都是从企业里出。他动用公司的款子在上清寺营造了一幢豪华洋房，并购买了许多进口家俱，把自己的家布置得跟个宫殿似的。他家总共只有老少几口人，但侍候的佣人却有一大帮，雇来的厨师就有川味厨师和北方厨师两个，而且所有佣人一律列入企业编制，由企业支付工资。小孩上学，还要总务部门用专车接送。他的生活奢糜，一人使用两部汽车，还有一个专用轿班，又有许多随从人员，前呼后拥，人来客往，酬酢馈赠，外出召唤女郎，一律以“总经理招待费”支出。

至于各部门的浮支滥用，更是司空见惯。翻开各部门的帐单，尽是“同仁借款”、“暂付款”、“预付款”，办正事的款子倒是很少见到。

上梁不正下梁歪，上面明偷，下面暗盗。公司盗卖物料的事时有发生。有一次，公司库房堆放的钢材不翼而飞，派人查处，查来查去，发现牵连甚多，也就只好不了了之。后来却在市场上出现了，公司无奈，又花钱把它买了回来。

胡子昂当襄理两年多，眼见着公司一天天腐败下去，深感忧虑，多次劝谏傅沐波革弊除患，但此时傅沐波的总经理正当在兴头上，大权在握，独断专行，哪里听得进去，反倒上下齐心，力排商股的主要负责人。胡淑潜虽为

总工程师，但却受孔、傅所派的技术人员的排挤，名存实亡；胡仲实对公司亦早心灰意冷，很少到公司里来问事：胡子昂深感环境难处，独木难支，觉得这个襄理当得实在无趣。

恰在这时，新任四川省主席张群慕名派员来找胡子昂，约他去省府任职。胡子昂感到正是解脱的好时机，于是跟孔祥熙反复会商，于 1941 年底提出辞职，远赴成都，另谋发展。

宋美龄大打出手

那个时代的实业家，大多都有很多项事业，很少有在“一棵树上吊死”的。

胡子昂在起意离开中兴公司的时候，就已着手发展自己的金融事业了。

因为他担任着华西公司的经理，负责经营管理，随着公司业务的不拓展，所需周转资金也越来越大。虽然他跟重庆各家银行的关系很好，那些银行老板也很讲“哥们义气”，在贷款方面从没有驳过他的面子，但仍感到有诸多不便，于是决定自己先办个银号。

他的这一想法得到朋友们的大力支持。华西公司的胡仲实、和成银行的吴晋航、川康银行的宁芒村、重庆银行的潘昌猷、聚兴诚银行的杨晓波等纷纷解囊相助。军阀刘文辉、财政部次长徐堪听说他要开办银号，也都找上门来，凑了一份子。

这样，1941 年初，胡子昂筹得资金 150 万，在重庆开办了华康银号，自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请好友鄢公复任襄理，刘芝祥任经理。

办起华康银号，胡子昂才深感自己当家作主的那份舒畅和愉悦。他制定了一条扶助工矿事业的主要经营方针，稳健开展经营业务。加上他在许多企业任职或有股份，因此办起来也得心应手，中国兴业公司、华西公司等与他有关的企业的款项大都存入他的银号，同时他还利用四川省银行存入的低息存款作为信贷资金，业务发展很快。华康还投资安华煤矿、嘉华水泥厂、重庆油漆厂、四川丝业公司以及《新民报》等企事业，获利不少。

华康银号到 1944 年改为华康银行，这时的资本已增加为 1000 万元了。有了这样的资本，差不多已经可以再办一个中国兴业公司了。兴业公司初办时，资金定额为 1200 万元。

后来华康又在成都、武汉、上海设立分行，声名雀起，成为重庆一家很有影响的私营银行。当然，这是后话。

除了银行外，胡子昂还有一个农场，办得也很不错，可惜它的命不好，开罪了宋美龄，它便没有理由再生存下去了。

胡子昂年轻时上了两次农专，一次是在成都，一次是在北京，两次学的都是农艺专业，因此从学生时代起，他就梦想有个自己的农场，把农场当作自己的画布，在上面作最新最美的图画。

但那时只能是梦。

后来经营工商业，兜里有钱了，社会关系更广泛了，于是决定实现这个梦。

1937 年底，胡子昂集资 15 万元，在重庆南岸的铜元局、天台岗、马鞍山等地购买了田土、山场，三处合起来大约有 300 来亩，把农场办了起来。取名华裕农场。

华裕，是取自“使中华富裕”之意，代表了胡子昂一份不改的痴心。

胡子昂把华裕农场交给他的一个本家侄子胡夏畦负责料理，总共雇了百来个工人，饲养了上百头荷兰奶牛及国产乳牛，派专人到北京安徽等地选购大鸭白鹅千余只；培植的是当时中国农艺中的尖端产品，如玫瑰香葡萄，海棠，黄香蕉苹果等果树；培制各种形态不一情趣各异的古松剑兰铁树千手观音等花木盆景；最为吸引人的要算农场花圃里的那些奇花异草了，有当地最为知名的红芙蓉白芙蓉红玫瑰白玫瑰，有蔷薇月季紫萼芍药昙花以及十数个品种的秋菊等，由春过夏到秋，一年四季中大多数日子，这里皆是异香扑鼻，姹紫嫣红。

当时，胡子昂兼职很多，很忙。无论是在做华西经理、自来水厂经理、中兴公司襄理，还是后来去成都当了省建设厅厅长，他还是常常挤出星期日时间，去农场看看，常常和工人一道，参加一些农艺培植或是嫁接果树。

毕竟，这里有着他的梦。

其时，正是全国人民抗战情绪十分高涨的时候。农场职工受各界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情绪也是十分热烈。胡夏畦先后两次约请重庆文化界救国会来农场演出，主要是表演抗敌救亡歌咏，演出话剧。

1938年春，重庆文化界抗敌后援会来农场进行救亡宣传时，被领队的漆鲁鱼（新蜀报总编）看见有不少空屋，周围花木环绕，便提出要介绍一批作家来住。

胡夏畦是文协成员，考虑到此事的深远意义，便欣然越权答应了，事后才向胡子昂汇报谎称是周钦岳先生介绍来的（周是新蜀报总经理，胡子昂老友）。

胡子昂未责备胡夏畦，算是默认了，而且还把每个星期天来场办公的制度也取消了，每逢星期六他由城里回南坪老家，路过时，由胡夏畦在田地边角汇报一下场务就行了。

来往的作家和家属，只收微少的房租，有的单身汉便去场内搭伙，供应他们的蔬菜也马虎作价，为他们提供了生活上的一些方便。

章民和葛一虹合编了剧协机关刊《新演剧》二、三期。章民导演了由曹禹改编已金的话剧《家》，首演于银社。一虹还担任《中苏文化》文艺版的编辑，1939年，参加战地访问团归来还写了话剧《红缨会》。

胡子昂与沙汀一见如故，便让人把他的办公室和卧房都让给沙汀使用。沙汀在此期间整理了《记贺龙》，并写出《在其香居茶馆里》等名著。

宋之的、王莘夫妇携带女儿“时儿”来往，老宋写了《雾重庆》等话剧，演出后轰动大后方。他还与老舍先生合写了以回汉团结抗战为内容的《国家至上》，总是老宋写稿，王莘抄写，往往通宵达旦。王莘还参加过几次重要演出，平时她用背带背着时儿操持家务。

罗烽、白朗夫妇连同老母、幼子同住。他俩将已发表的《满洲里的囚犯》进行整理准备出单行本。参加战地访问团回来后，罗烽写了《战地小诗》，白朗写了一本散文集，并生了第二个女儿。后来他俩去解放区时，胡夏畦勉力凑了点路费。

此外还有在文联工作的关吉罡及夫人、母亲、三个儿女，还有郑君里的岳父母，带着君里的儿子牛牛同住。还有叶以群的夫人也在此小住过。

一天王莘告诉胡夏畦，她家要来客人，品尝她做的牛肉食品（她是回族），结果来了欧阳山、叶以群、胡风，后来才知道是为“两个难题”争论后，来

协调胡风与文艺界的关系的重要会议。

（1995年夏秋之交时我去万县专程采访胡夏畦，不遇。我们以通信方式进行了联系。他在百忙之际，给我提供了这些宝贵素材。最后他满怀深情地写道：“那个时期，天天空袭，大家都是互相关注，扶老携幼，亲如家人，走笔至此，忆及作家们都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贡献了他们的才华（一虹还健在吧），小字辈也继承父辈事业健康成长起来了吧！”）

当时的重庆文艺界名流集居，因此舞台剧十分受欢迎，是中国舞台剧的黄金时代，其盛况是90年代的观众难以想象的。有一出话剧叫《半个月亮》，是由话剧名角、进步人士漆鲁鱼、肖崇素、赵铭彝等主演的，主要是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他们是露天演出，条件非常简陋，但他们演出时，观众达数千人，多是附近的农民和兵工厂的工人。

这一日大清早，胡子昂神情疲惫地从范庄回到农场，他看到有几个工人正在清扫场地。场地上到处扔着稻草团、旧报纸，甚至东一只西一只丢了一些破鞋子，一些花草被践踏坏了，果树上也好像有人爬过，变得东倒西歪。显然，昨晚这里曾来过许多人。

难道这里遭劫了吗？

此时正是1942年的阳春三月，艳阳高照，温暖宜人，但胡子昂的心情却是糟糕到了极点。他这次从成都回重庆，是回来参加在范庄召开、由孔祥熙亲自主持的中国兴业公司第二次全体股东大会的。会议的议题是讨论关于中兴公司增资的问题。此时，随着通货膨胀，中兴公司的资本已由初时的1200万增值两倍，上升到3600万。而孔祥熙召开此次会议的目的，还要再一次增资，要增加到6000万。会上，胡子昂直陈己见，认为，目下中兴建厂即将完成，毫无增资的必要。胡仲实等其他商股也都同意胡子昂的意见，表示不同意增资。但是孔祥熙另怀心思，他所代表的官股占有绝对多数的股权，他们轻而易举地通过了中兴增资决议案，规定：

计增新股2400万，由旧股东按比例摊认。商股股东有不愿加认者，由政府或其他

股东代为认足。增认的股本须于本月11日前交清。

商股的股东们哪来这么多钱？照此决议，商股股东无法办到，于是大家只得放弃。官僚资本独享增资的权利。这样一来，在中兴公司资本总额的6000万中，官股一跃增为5331万，所占比例上升到89%，商股669万未动，所占比例减少到11%。

孔祥熙的心太黑了。

这不是明火执仗的抢劫吗？

胡子昂开完会后没有回家，而是直奔农场。他本来是想在这里休息休息，放松放松，调整调整情绪的，却没想到回来第一眼却发现自己农场一片狼藉，他能不发怒吗？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造反吗？”他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但声音里仍是透着一种威严。

胡夏畦闻讯跑过来，对胡子昂说：“大伯父，这不怪他们。”

“噢，那是你一手干的了？”胡子昂转身严厉地问侄子。

在胡夏畦的眼里，大伯父是很少发怒的，因此，这时多少就有点心虚，他小声解释道：“昨晚，我们请重庆的抗敌剧团来演了场话剧，是《半个月亮》。”

原来是这样。胡子昂释然了，于是问：“来的人一定很多吧？”

胡夏畦以为他在追究踩坏花草的事，便连忙说：“来的人的确太多了，所以难免踩了一点圃苗。我马上安排人修复。”

没想到胡子昂却说了声：“好！”

胡子昂想到了另一层。就在昨天晚上官商股东们为了钱在那里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这里却有人在宣传抗日，有人为此而激动，而悲泣，而喜，而忧。

“真是一方天，两个世界啊。”胡子昂不禁自语道，倒是把胡夏畦说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怯怯地叫了声“大伯父……”

“中国抗日的希望不在政府，而在民众。”胡子昂作了个有力的手势，断语道。他看看迷惑不解的侄子，笑了，拍了拍他的背，说：“我并没有怪你，相反，我还得感谢你呐。你做得很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现在国难当头，抗日救亡是大家的事，就得由大家来搞。”

胡夏畦一蹦老高，兴奋地道：“大伯父，我以前以为你只会做生意，没想到你对国家大事还这么关心，而且对时局的分析还是这么透彻，精辟。”

胡子昂淡然一笑，道：“那是因为你大伯父还不够了解。”

他又把胡夏畦拉到一边，嘱咐道：“夏畦，我知道重庆的文化界有些人很困难，如果农场有可能的话，可以帮他们一下。和这次一样，你可以作决定，全权处理，不必先请示我。”

胡夏畦不好意思地挠了一下头，但有了大伯父的这句话，他就放心了。

以后，华裕农场还真的给重庆文化界提供过不少帮助。周钦岳、肖崇素先后介绍宋之的、沙汀、葛一虹、罗烽等文艺界名流到农场借过钱，郑君里率领演剧团到战区演出慰问，他的家属没地方住，也来农场借住，胡子昂还把自己在农场休息用的几间房子让给他们住，并安排胡夏畦照料他们的生活。胡子昂来农场散心、劳动时，就在工人的工棚里休息。

华裕农场办得不错，获利也不少。

但是，厄运却在等着它。

这一天，也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一位衣着华美，仪态雍容高贵的贵妇在几个随从的陪同下，一路遛达，恰似闲庭漫步，来到华裕农场马鞍山分场。

华裕马鞍山分场是专门培植花木和盆景的，此时满园百花盛开，争奇斗妍，芳香四溢，真是赏心悦目，令人流连忘返。

贵妇不觉看得如痴如醉，对身边的随员说：“我在别墅住了这么多日子，怎么竟不知道还有这么好的一个去处？”

随员马上媚笑地说：“是的，夫人，真是美不胜收。”

原来，这位贵妇就是当时的第一夫人宋美龄，蒋介石在重庆马鞍山有个别墅，是戴笠为他建的，就离胡子昂的农场不远。今天，宋美龄没有应酬，便带着几个人遛弯，一直追到了这里。

宋美龄东走走，西看看，忽然，她的视线被一株铁树盆景紧紧吸住了。盆本身就是一景，是用细瓷彩釉做成的，呈莲花状；因了这盆，盆中的景就看得分明了，树干拙粗异常，上部却有略细的颈，刚劲的枝叶在颈下随意散开，这不就是坐在莲花宝座上的千手观音么？形态逼真，情趣可掬。更奇的是，那铁树正开着花。人说千年的铁树开了花，这盆铁树不说千年，至少也该有百年树龄了。

因此，宋夫人美龄无法不为之心动神摇。

随员都是靠看主子眼色吃饭的人，于是立即找来园艺工人，说：“这盆铁树我们要带走。”

园艺工人连忙摇头，叫道：“使不得，使不得、这盆千手观音是我们胡先生的爱物，他就是怕放在家里被人顺手牵羊拿走才放在我们这里的，你们怎能平白无故就把它拿走？”

随员说：“你知道这位夫人是谁吗？她就是当今的第一夫人。”

工人说：“我们不知道什么第一夫人，第二夫人，我们只知道爱惜花木，瞧你们手里拿的花，我们还没向你们要钱呢，竟还敢要这盆千手观音！”

宋美龄听了工人的话，觉得倒也好玩，于是便问：“你不知道第一夫人不要紧，那你肯定是知道领袖，蒋总统，蒋委员长了？”

工人说：“知道，知道，不就是打败了仗跑到重庆来的那个秃瓢吗？我们揩屁股的报纸上就有那家伙的照片。”

宋美龄气得脸都白了，一句话没说，怒冲冲扭头就走。

随员恶狠狠地扔下话：“你们等着瞧吧，有你们好果子吃的！”也跑了。

果然，第二天，就有 100 多名打手，兵分两路，一路直扑华裕农场马鞍山分场，一路杀向铜元局农场，大打出手，见人就打，见花就拔，见树就砍，昔日美丽的花园，变得花失色，树夭折，惨不忍睹。

农场职工不敢怠慢，赶忙致电成都胡子昂，详细报告了此事。胡子昂感到事情已经闹大了，立即返渝，回农场召开农场股东会议紧急磋商，寻找对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股东们无计可施。在中国得罪谁不好，偏偏得罪了爱小题大作无理取闹的第一夫人，唯一的办法，就是关门大吉。

就这样，胡子昂办得不错的华裕农场半路夭折了。

关闭了农场，也就关闭了胡子昂的一个梦。

胡子昂为中兴公司治丧

中国兴业公司因孔祥熙而兴，也因孔祥熙而败亡。

1942 年 12 月 16 日，孔祥熙主持四联总处理事会开会讨论贷款方案。

这次贷款款项甚巨，因此国民政府的实力派人物、四大家族的宋子文和陈立夫、陈果夫也都在座。

自从抗战以来，孔祥熙在蒋介石面前颇为得宠，当了行政院长不说，还兼着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四联总处董事长，完全一手控制了国民政府的财政大权。对此，蒋介石的大舅子宋子文和陈家“二夫”当然早已心怀不满。何况孔祥熙还利用手中职权，支用巨额国币，经营中国兴业公司，壮大自己的实力，对宋、陈二系的实力形成威胁，这让他们感到忍无可忍。所以遇到了这样的机会，他们自然是要给孔祥熙一点“颜色”看了。

果然，会议一开始，陈立夫就带头发难，矛头直指傅休波，说道：“自傅总经理主持中兴公司以来，政务无方，建厂计划一推再推，各项生产盲目计划，我看往中兴公司贷款，无异等于拿国币打水漂。”

宋子文推推鼻梁上的眼镜，慢条斯理地接着说：“中兴成立以来，政府屡次追加信贷达数千万元，而其业务发展却十分滞缓，我意也不必急于追加贷款，再看看公司业务起色和拓展情况再作决定。”

孔祥熙感到非常难堪。这次关于中兴贷款的会议便这样不了了之。

时隔一年，在公司的董事会上，四大家族又打得一塌糊涂。

宋系的中国银行代表、二陈的 CC 系中国农民银行代表联手，对傅沐波大加挞伐，历数傅对冶炼钢铁所需的铁砂、煤焦的生产、运输问题，一直未作彻底解决，特别是炼铁炉，从 1943 年 6 月起，已经停炉半年，而傅沐波对此却束手无策。由此得出结论，傅沐波不宜再担任公司的总经理了。

商股代表对官股代表本没有什么好感，但这时在反对傅沐波的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因此也帮着宋、陈系银行代表，对傅沐波大提意见，群起攻评。

傅沐波坐在总经理席上，满脸通红，汗流不止，非常狼狈。

孔祥熙异常震怒，没等会议结束，便离席而去。

在孔祥熙的眼里，傅沐波只不过是手下的一条狗，叱来喝去，使唤自如，倒也非常顺手。只是傅沐波太无能了，把一个偌大的中兴公司弄得千疮百孔，事到如今，他也无法保他了。

孔祥熙把傅沐波叫来，斥道：“收拾好你的东西，从这里滚蛋，从哪里来，再滚回到哪里去！”

1944 年 1 月，中兴公司总经理傅沐波被迫辞职。

想来想去，孔祥熙觉得胡子昂用起来虽不大顺手，但公司交给他却将会有很大起色。衡量再三，又反复征求公司股东的意见，也都认为胡子昂是中兴公司总经理最合适的人选。

于是，孔祥熙一边致电成都的胡子昂，让他回来就职，一边致电川省主席张群，让他把中兴公司的人还给他。

胡子昂在成都担任的是省建设厅长，是个有权有钱的位子，但他毕竟跟中兴很有感情，是从他们一手创办的华西公司的母体中分娩出来的，不忍心它就这样堕落下去，垮下去。于是胡子昂辞谢了张群的盛情挽留，卸却建设厅长之职，由成都返渝，就任中国兴业公司的总经理。

胡子昂当了总经理后，风风火火地干了三件大事。

当然，跟孔祥熙对胡子昂给予的支持也有一定的关系。

第一件是做油桶。

1944 年，国统区各行业出现了油桶荒，各界呼声很大。孔祥熙把这一信息透露给了刚刚走马上任的胡子昂。真是信息就是金钱，胡子昂得知后连夜召集有关部门主管人员开会，制定了一套轧制钢板制造油桶的生产计划，呈报经济部，经济部又将计划转呈行政院。孔祥熙接到报告后，立即召集经济部、财政部、交通部和有关钢铁企业，举行“轧制钢板制造油桶计划审查联席会”，会后行政院决定，由资渝钢铁厂和中国兴业公司各负责供应 4000 个油桶，并承诺协助两厂增添制造油桶设备。

旋即，中兴公司从四联总处贷款 9654 万元，着手购买制造油桶的各项设备。后来这个油桶计划并没有实现，但是这笔巨额贷款，相当于近 3000 吨钢材的价值，等于收购了中兴公司全年生产的钢锭。由此，各部门的生产都被带动起来了。自傅沐波之后，中兴公司的生产第一次出现了繁荣的景象。

第二件是承接军工订货。

二次大战后期，战火燃遍世界各个角落，国际交通线路被断绝，美国的援华军火，只有一条空运线路能达到中国，一时远水解不了近渴。为此国民党政府成立了战时生产局，以适应战时急需。生产局划由翁文灏的经济部管辖，翁文灏自兼生产局局长。

战时生产局一成立，胡子昂便跟孔祥熙提议召开公司董事会，研究对策。

那时孔祥熙正好要赴美开会，便把召集会议的任务委托给了胡子昂。这次董事会，中兴公司那些政府要角的股东除孔大老板外全都列席了，有翁文灏、钱新之、陈行以及下了台的原总经理傅沐波。胡子昂说：“战时生产局的成立，对于中兴公司的振兴，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我们要抓住这个契机，加紧生产，适应战时需求。同时，我想，凭着咱们中兴公司的实力和在大后方钢铁企业中的地位，生产局也会从优分配给我们生产任务的。”

胡子昂的话得到了公司官商股东的一致赞同。

正在这个时候，中国兴业公司又一次跌入了深渊。

此时，在国民党政府的政坛上，四大家族打乱仗达到了高潮。宋子文、陈立夫、陈果夫的倒孔活动愈演愈烈。1944年夏，趁孔祥熙赴美参加世界经济会议之机，首先揭发出财政部直接税署署长高秉坊贪污案，并交司法机关审处，法院初审即判高死刑；接着，CC系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议上，又提出要彻查中央银行“同盟胜利美金公债舞弊案”，结果是中央银行业务局长郭景昆被拘捕，国库局局长吕咸被撤职。

一时，举国舆论大哗，要求严惩主管领导孔祥熙。

蒋介石大怒，撤了孔祥熙在政府的各项要职，任命宋子文力行政院长，命心腹俞鸿钧接任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

孔祥熙倒台以后，中兴公司的形势急转直下，资金、生产及其他业务都发生了极大困难。

胡子昂深感自己的命运多舛，刚刚接手中兴公司，即遇中兴后台老板倒台。

但是，他已经被推到了这个位子上，已经没有退路了，只能义无反顾的向前冲了。胡子昂一方面着手立即组织生产，另一方面四处奔走游说，争取社会各界对中兴公司的理解和支持。

幸好，翁文灏还是中兴公司的副董事长，他主持着战时生产局。

抗战结束前，战时生产局分别投放了两批订货：第一批是军斧、刺刀，共1150吨，中兴公司独获800吨，渝鑫钢铁厂100吨，中国钢铁公司50吨，余200吨分配给了其他小厂。渝鑫和中国钢铁公司因为所产钢品含砂太重，造出的兵器屡不能过关，还是从中兴公司求助了几百吨钢材，才最后完成了任务；生产局的第二批货，是制造大批地雷、炸弹壳、迫击炮的钢铁铸件和铸钢炮弹、轻机枪的钢胚以及16磅钢轨，共达200多吨。因为当时各厂生产的第一批订货都还没有最后完工，所以这第二批订货，全部由中兴公司承接下来。

第三件是承造水利灌溉工程的机械。

1944年下半年，胡子昂听原省府建设厅的旧部属说，南充地区的水力灌溉工程已获蒋介石批准，不日即将投资上马。胡子昂闻讯后，立即飞赴成都，找到张群。张群笑着说：“中兴的大老板已经倒台了，你还这么卖命呀？你不如彻底退出来，经营川康兴业公司。”

在胡子昂离开成都之前，张群硬是把他的一个烂摊子——川康兴业公司交给了胡子昂，让胡子昂担任总经理，所以张群有此语。

胡子昂道：“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川康公司我要搞好，但中兴公司我也不能不管，尤其是在这样危难之际，我更是不能撒手不管了。”

张群叹道：“我只不过是开个玩笑，我知道你是不会在这种时候临阵脱逃的。子昂，和你共事了两年多，我算了解了你的人品和为人，你刚直不阿，

把信义看得和生命一样重要。这正是我最敬重你的地方。”

胡子昂连忙说：“张主席，你言重了。”

由于胡子昂和张群的特殊关系，这次会谈很顺利，胡子昂与四川省府签订了南充地区水力灌溉工程初期合同，包揽了该项工程的全部钢筋和部分水轮机的承制，首批订数就达 300 余吨，全部价款达 8400 余万元。胡子昂又通过财政部和中央银行朋友帮忙，办理了贴现，把 70% 的工程费提前支取到手，很轻松地为公司挣到了一笔可观的收入。

拿下了这项合同，胡子昂又趁热打铁，找到四川建设厅所属的四川机械公司，委托他们代为推荐和销售中兴公司的钢铁产品，代接生产业务。在成都销售数量较大的就有建设厅所属各工程单位生铁 200 吨，川康兴业公司生铁 200 吨和成都自来水厂制造水管所需的全部生铁。

与此同时，胡子昂还主持为重庆两江大桥制定过修建计划。当四川省经济建设委员会提出修筑成渝铁路时，胡子昂又代表公司，多次去成都商洽，回来后又责成公司的设计委员会全力研究，拟了一个内部计划，雄心勃勃地要拿下这项工程。可惜后来抗战胜利了，蒋介石急于“还都”南京，这些费九牛二虎之力弄出的计划，都成了梦幻泡影。

连孔祥熙也说：“胡子昂主持公司业务这个时期，是中国兴业公司的黄金时代。”

可惜，好景不长。

1945 年 10 月。重庆大溪沟，中国兴业钢铁公司总部。

此时的重庆，还沉浸在一片狂欢的气氛中，人们对于 8 年抗战的最后胜利感到欢欣鼓舞，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但是，坐在中兴公司总经理室的胡子昂，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就在一个多月前，他还和全国人民一样，为着抗战的胜利兴奋不已，以为这下子好了，从此可以放开手脚，大展宏图，去发展中国的民族工商业，拓展中兴公司的业务了。不想一个多月之后，就发现事实原来大谬不然。蒋介石根本不想和平建国，而是蝉精竭虑，积蓄力量，来发动铲除异己的内战，为此不惜去吃美国佬的残羹剩饭。

对于民族工商业者来说，正是这种大胜利导致了大灾难。蒋介石对于国内所需的钢铁、机器设备等一切工矿器材，先是接受美军的剩余物资，继而接受美国的善后救济物资，最后干脆向美国订购一切商品器材，使国内工商业奄奄一息，走投无路。

此时，战时生产局结束了，地方建设停顿了，中国兴业公司困难越来越多，面临灭顶之灾……

胡子昂感到再也不能这样等下去了，必须积极争取，寻找出路。他抓起桌上的电话，接通了重庆另一位钢铁机器业巨头胡厥文的办公室。此时，胡子昂是重庆钢铁机器业同业公会的主任委员，胡厥文是副主任委员，两人在电话里交换了意见，对于目前工商业现状，也都是忧心忡忡。

最后两人商定：率同业公会代表，找行政院长宋子文请愿是日，胡子昂、胡厥文及重庆几家钢铁机器业的同行一人数人，来到国民政府行政院，拜见宋子文，向他陈述大后方工商业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和当前的困难，要求政府当局给予贷款、订货，加以扶持，解决燃眉之急。

没想到宋子文对于他们的话不屑一顾，说道：“你们总是要扶持、扶持，大后方工矿企业有什么好，设备陈旧，技术又不行，产品质低价高，有什么

前途？美国货又有什么不好？价廉物美，我看就是比国货好。嗯，你们不要只站在你们行业的立场上，要多为国家考虑考虑，懂吗？”

出了行政院的大门，胡子昂就气愤地说：“蒋介石让这种人当行政院长，简直是让这种人卖国。”

胡厥文也直摇头，道：“还说我们只站在行业立场上，他才是一叶障目。”请愿毫无结果。

胡子昂只得去找孔祥熙。孔祥熙毕竟还是公司的董事长，对于中兴面临的关门危机，他感到不能甩手不管，于是想凭着跟老蒋还是连襟这层关系，得到蒋介石的特别惠顾。

1945年11月初，孔祥熙以中国兴业公司董事长的身份，直接上书蒋介石，称：

“政府建国大计自有缓急，但不能无工业，不能无生产，故统筹兼顾不能有偏废，新兴者固应举办，旧有者似宜酌量保留……对有功抗战之中兴致予爱护之指示，或国家接收，或扶植续办，以免土崩瓦解，前功尽弃，国家受损……”

处在内外交困中的胡子昂焦急地等待着蒋介石的批复。

结果，他等来的却是一纸关门停工的通知。

1945年11月28日，经济部通知中国兴业公司全部停工，办理员工遣散，并成立清理保管委员会，清理保管资产，听候处理。

胡子昂简直傻眼了。

这时，中兴公司的那些有身份的官股董监们都忙于奔赴南京、上海等地，和共产党争夺胜利果实，进行疯狂劫收；而商股董事们早已就对中兴心灰意冷，还有谁愿意来管这个烂摊子？胡子昂想开一个董事会，连人都召集不起来。

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胡子昂只得自己来担任这个清理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保管全部资产事宜，遣散员工。

停工遣散的消息在公司传出之后，公司员工群情激荡。公司一片混乱，有的呼天抢地，痛感多年的辛苦一夜间付之东流，一家老小从此生活无着落，将来如何是好；另一些血气方刚的汉子们则愤怒地握起钢筋铁条，声称谁要来叫他们走，他们就打断谁的腿。

胡子昂只能冷静地接受这一事实。那些日子，白天，胡子昂协同银行有关稽查人员清理资产，晚上则深入厂区，亲自找职工恳切谈心，执行公司提出的《员工遣散办法》。

家里人怕他一个人去找那些急红了眼的工人有危险，叫他不要晚上去，特别是不要一个人去。胡子昂淡淡的苦笑道：“如果傅沐波现在还是总经理的话，他一个人去恐怕是有危险。但我去不会，我胡子昂自认为平时供职严肃，一身清白，工人是了解我的。”

此时节，重庆常常在夜间停电，胡子昂便只身一人持烛过江。两岸高山无语，对面黝黑的钢厂厂区无语，胡子昂孤独地坐在渡船上，听着不绝的涛声，望着茫茫的江水，回想经办实业这10几年来几多心血汗水几多酸甜苦辣，不觉悲从中来。

1946年元旦，《新华日报》记者为此采访胡子昂。胡子昂感慨万千，道：“我个人从事工矿事业10余年，今天抗战胜利了，却在为中国兴业公

司办理丧事，个中隐曲，令人心痛，我无话可说。”

中国兴业公司随后渡过了它历史上最黯淡无光的日子。

由于胡子昂在工人中威望很高，遣散工作没有太多的难度，几度商谈，与工人达成协议，每人发给三个月的工资，就地遣散了工人 1800 多名。

清理中兴资产工作直到 1946 年底才告一段落。有关方面得出结论，中国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尚存资产总值 29.8 亿元，负债本息 9.7 亿元，资大于债。

这时，胡仲实想抓住这个时机，把企业从官僚资本的手中夺过来，重新整顿，继续经营。经同商股股东会商，决定由华西、华联、中电三公司以商股的名义致函中兴董事会，表示三公司退出中兴，或交由三公司接办。

随后胡子昂又几度去上海，与官股代表进行磋商，征得孔祥熙的同意，于 1947 年初在上海召开中兴董事会。会上，胡子昂向股东们报告了保管期中困难状况种种，追述了商股所拟的解决办法，最后要求中兴公司交由胡仲实常务董负责接管。

这最后一点获董事会同意。

胡子昂这才松了一口气。

胡仲实接管中兴后，一方面着手恢复生产，另一方面，致力于从官僚资本手中争夺所有权，结果这两方面都没有成功。

直到重庆解放，这个在本世纪风云际会的政治风云中大起大落的企业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解放后的中兴公司叫重庆第三钢铁厂，大家习惯叫它重钢三厂。

写到这里，我想起这个夏末去重庆采访的一些有意思的经历。

那是个依然很热的大晴天，总参兵种部重庆房管处的司机小王驾着他的草绿色 213 送我去重钢三厂采访和查找资料。这位在渝多年眉清目秀的山东老兵还兼做我四川话的翻译，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重钢三厂，这才知道它已变成了重钢（集团）公司兴业钢铁公司。

除了厂区门卫给我们指了一条绕厂走的远道（不知是否故意）去找厂部外，第一次去还是很愉快的，由于没有明显标志，我们一直把车开到了厂区腹部，找人打听，一位容貌娟秀的热心小姐上了车。路上我问她：“厂子效益怎么样？”她叹了口气，道：“不行啰，能发个基本工资我们就满意啦。”她一直把我们领到了厂部的楼下。

在档案室我看到了订成九大本的当年中兴公司的原始资料，载有中兴公司重要的董事会记录、各股东股份额、各部门情况及有关生产数据、胡子昂所作的年度报告，甚至留有胡子昂襄理 1941 年的那封辞职信，非常珍贵。我想复印一份带走，档案室的同志要我去找负责该方面工作的副厂长或厂长、总经理签字才能复印。我问他们在不在，她当即给秘书处打了电话，回答说在。但当我们去找时，却找遍了全楼，一个也没找到。我把解放军出版社的介绍信给了厂办的一位女秘书，希望她能帮我办妥签字，我第二天来取。她愉快地答应了。

当我和小王次日再去时，发现所有同志的脸色都变了。她们说：“没法办啰，厂里有规定，厂领导不让复印，除非你们去找集团批准。”

此时我已订好了回返的船票，而且又约好了下一个采访对象。我想找公司领导再说说，开一个绿灯，但依然一个也没有找到。

我非常失望，出了厂部，不禁又一次细细的审视着这个我将着力描写的

钢铁企业。厂子依山而建，显得错落有致，树木葱郁。它看上去如此平常甚至简陋，没有现代化公司企业的高楼广厦，大都只是低矮的楼房，那些灰黑色的石基、砖瓦，显示了它年代的久远。我不禁怀疑，难道它的前身真的就是当年那个资产逾 29 亿、员工数千人、牵动着整个大后方的钢铁工业、并为四大家族争得不可开交的中国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吗？它又如何承受得起压在它头顶上的那际会风云？

回去的路上，我问小王：“你说，公司的领导为什么不想见我？”

小王想了一下，说：“大约是他们的心情不好吧。你没听那位小姐说吗，厂子的效益不好，也许他们还因此愧对胡子昂老。”

我说有道理。

但我想，这不能责怪现在的公司领导经营无方。在今天的这个改革大潮面前，整个中国的钢铁企业都在经受着考验。

是历史把他们又一次推入钢铁事业的低潮。

而高潮不久肯定将会到来。

第5章 陪都政界的“黑马”

参政员当得没意思

1941年，重庆。

这一年，担任中兴公司襄理的胡子昂，日子过得颇不平静。

先是，他成了国民党参政会的参政员，介入了为国民党参政议政的行列，结果发现当参政员并没有多大意思。

正想甩手不干了，四川省主席张群又找上门来，屡次派人、捎信来，让他去成都，当他的省建设厅厅长。

他本来对当参政员也没什么大兴趣，是别人找上门来的。

那还是去年冬的事。当时胡子昂正在成都开会，巧遇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黄季陆。

胡子昂跟黄季陆熟，但也只是泛泛之交。黄季陆有意发展跟工商企业界的联系，所以每次见到胡子昂都很热情，称兄道弟。而胡子昂为求生存，为了自己事业的发展，在政界、军界像这样的朋友有一大堆，所以对黄季陆应酬得也还可以。

这一次两人见面后，黄季陆对胡子昂显得格外热情，并且一定要拉胡子昂到他家去好好叙叙。胡子昂难却他的盛情，便只好跟他一起去了他的住处。

当晚胡子昂就住在黄季陆家。两人彻夜长谈。原来，黄季陆想要胡子昂参加省参政会参政员的竞选。

在这一年秋天的时候，国民党就宣布，要遴选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当时分给四川的名额，总共是4名。

胡子昂面有难色。这时他在工商界的各项事业如中国兴业公司、华西公司、四川水泥厂、华裕农场、华康银号的筹备等差不多已全部展开，因此他非常忙。于是说：“我现在手头的事一大堆，恐怕难以分身参加。”

黄季陆说：“你老兄难道还不明白参政员是怎么回事？前年咱们省主席王瓚绪不就把你拉进了省临时参议会当了临参员吗？”

这倒是事实。

1938年刘湘在武汉病故后，军阀王瓚绪在国民党各种派系的斗争中巧夺了四川省主席之职，不久筹组川省临时参议会，四川地方各派都竭力推举自己的人进入临参会。当时的省教育厅厅长杨金宇，是诚学会会员，与王瓚绪关系甚密，是杨金宇为了扩大自己的力量，一手把胡子昂拉进临参会的。胡子昂因此说：“我在临参会其实也只是挂个名，开会了才到成都来一下，平时不大管事的。”

黄季陆正色道：“这一回可是大不一样了。前次是临时的，今次是正式的，上面很重视。参政会现在的影响越来越大，全川各界很多人都想往里挤呢。你老兄要想进一步发展自己的事业，还需要增加政治敏感性才行啊。”

胡子昂知道黄季陆拉他进入参政会也有自己的目的，无非也是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将来参政会有人替自己说话，那他在官场的前途自然大不一样了。但同时觉得黄季陆的话也不无道理，如果能在参政会上占有一席之地，取得一定的政治地位，便于联系各方面的关系，有利于扩展自己的事业。

因此拐了个弯，以问代答道：“分给川省的名额才4个，我能行吗？”

黄季陆便笑道：“政治上的事情历来如此，说是遴选，还不是由省党部

具体操办，只要你愿意参加，其他事由我负责好了。”

想了一下，黄季陆又说：“好像省临参会参议长白育仁跟你很熟吧，他也曾在我面前提起过你。”

胡子昂说：“是的，我和他曾一起在刘文辉 24 军里共过事。”

黄季陆一拍大腿，说：“太好了，有临参会参议长提名推荐，这件事就更没有问题啦。”但事实上在选举时还是遇到了不少麻烦，因为很多人都盯着这 4 个位子，竞争非常激烈。临时参议长白育仁提名胡子昂时，国民党方面的参政员群起反对，认为胡子昂不是国民党的忠实信奉者，不能代表国民党担任参政员。白育仁是个行武出身的粗人，这时便手足无措了。

倒是黄季陆站出来替胡子昂说了话，他说：

“胡子昂我很了解，他对我们国民党是支持的。参政会嘛，就是要有各方面的人来参加，我们党现在正倡导国共合作，参政会还应有共产党参加，更不能把无党派人士排斥在外。这和参政会的宗旨是不相符的。”

接下来又是几天几夜的争吵。由于黄季陆和白育仁两方面力量的支持，胡子昂最终当选为参政会参政员。

进了参政会，胡子昂才知道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1938 年国民党初办参政会时，提出的宗旨是团结社会各界力量，集思广益，抗战建国，曾受到各界爱国人士的广泛欢迎。自从蒋介石“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出台，掀起反共高潮之后，参政会成了欺骗人民的工具，而中国共产党和爱国民主人士也常利用这个场所揭露国民党的阴谋。那时的胡子昂，不喜欢国民党，但对共产党也了解甚少，所以他在国民党的参政会里，跟随的是“川北圣人”张澜和邵从恩，采取的是中间立场。

胡子昂和他二人都是在北京上学时认识的。

邵从恩是胡子昂二伯父的至交，因为这一缘故，胡子昂与邵关系甚密；张澜是中国近代吏上一个十分著名的人物，一生干过许多轰轰烈烈的大事，是民主革命家、教育家、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民盟的创始人和杰出的领导人，思想进步，后来成为毛泽东民主人士中的一个非常知名的挚友。

早在胡子昂上北农的时候，张澜就是四川省省长，在北京设立四川省行署，又是《晨报》的董事长（李大钊是该报副刊的总编辑），胡子昂对他的事业人品十分钦佩。而胡子昂在北农组织的几次运动，《晨报》从头至尾都作了详尽的报道。当时担任《晨报》董事长的张澜曾说过，胡鹤如给四川人长脸了。同时，邵从恩和张澜是多年的至交好友，在北京时邵就曾带着胡子昂拜访过张澜。抗战以后，大家都聚集重庆，又都进入了参政会，胡子昂得以常常与张澜接触交谈，十分投契，成为忘年交（张澜比胡子昂年长 25 岁）。

胡子昂的思想深受张澜的影响。张澜身材高大，长髯齐胸。

为人刚直不阿。胡子昂亲眼见过，有一次参加集会，当国民党官员提到蒋介石的名字时，大家都起立立正致敬，唯张澜端坐不动，别人示意他起立，他却质问：“为什么提到他蒋介石的名字或职务时，都要起立立正？只有德国的希特勒是这样的，难道蒋介石和希特勒是一类人？”弄得国民党官员十分无趣。

当时，国民参政会议长是张伯龄，他是忠实支持蒋介石的。由于政见不同，张澜、邵从恩常常和他发生争执，双方闹得很不愉快。而张伯龄又是胡子昂华西公司的董事之一，因此胡子昂常常从中做一些调解工作。

1941 年 11 月，国民参政会召开二届二次全会，张澜在会上提出《实现

民主，以加强抗敌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成立正式民意机关，保障人民各种自由，取消特务组织，严禁官吏垄断、投机等 10 项主张。这一提案获得董必武、邓颖超等 23 名参政员的联署。

蒋介石见到此案，勃然大怒，拍案大骂张澜，说：“把我当宣统了！”不许提出讨论。张澜在会上与蒋讨论了两小时仍未获允许，蒋介石还发动国民党的参政员对张澜进行批判，一时参政会的火药味很浓。

又是胡子昂和史良从中周旋，呼吁团结，这件事总算平静地过去了。

这件事以后，张澜即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以示他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抗议。而胡子昂深感在参政会上处境艰难，决定离开这个是非窝子（果然，次年四川省推选第三届参政员时，说什么他也不参加了）。

他想，政治风云变幻莫测，还是离政治远一点吧。

没想到政治总是来找他。

张群慧眼识英雄

张群是 1940 年冬当上四川省主席的。

这中间还颇有些周折。

张群早年当过蒋介石的侍从室副官，跟随老蒋多年，人长得浓眉大眼，面阔耳方，又极聪明，主意很多，很会办事，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当时人们形容蒋介石身边的红人，就有“文有张群，武有陈诚”之说。

四川历年来为军阀们所割据，这让蒋介石很是头疼，曾几次想收买他们，先后对军阀刘文辉、刘湘、杨森下过功夫，给他们官做，但都没有成功，始终没能让他放心。

兼任川省主席的军阀刘湘 1938 年在武汉突然病故后，蒋介石认为是控制四川的大好时机，于是急忙任命张群任四川省主席。

但是川康地方军政界头目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等看破了蒋介石的這一着，认为如果张群插进四川，那他们的军政大权迟早会被老蒋夺走，于是极力反对。这时蒋介石因为刚刚迁都重庆，立足未稳，不敢把川军惹急了，只得作些让步，改任张群为重庆行辕主任，命川军 29 集团军司令王瓚绪为四川省主席。

王瓚绪担任四川省主席后彻底投靠了蒋介石，还出卖了川军朋友，刘文辉、邓锡侯等大怒，发动川康 7 师长联名发出通电，列举王 10 大罪状，要求蒋介石撤王的职。

蒋介石看到势头不对，只得撤了王瓚绪，自兼四川省主席，以贺国光为省府秘书长代行其职。

这样又经过一番曲折，直到 1940 年冬，张群才接任四川省主席。

张群到任后，感到要想干出一番成绩，稳定大后方，就必须首先把川康各方面的人都笼络住，以控制川康。

一日，张群和他的秘书长李伯申谈起此事时，说：“我在四川没有基础，特别是军界，这你是知道的，他们对我有些成见，一开始就抱着防范的心理。因此，我现在需要有人来给我做个纽带，把四川各界方方面面的人都串起来，这样，我的工作就好展开了。”

李伯申微笑着进言道：“我给你推荐一个人，保你满意。”

张群问：“谁？”

李伯申：“胡子昂。”

张群眼睛一亮，立马道：“对呀，就是他。他简直太合适了。他曾当过重庆的教育局局长，后来成为重庆工商界卓有成就的人物，现在又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还当过刘文辉的川康边务处处长，跟军界联系很广。我多次听刘文辉在人面前谈起过他，说曾想让他当西康省建设厅长，他没有去。对了，他可以来做我们的建设厅厅长嘛。”

他又问李伯申：“军、政、学、工商路路通的人物，我怎么没想到？”

李伯申笑道：“因为他不是你表弟。”

张群恍然大悟：“噢，我想起来了，你好像跟我说过，胡子昂是你的表弟。”

李伯申道：“我在北洋政府当国会议员时，他正好来北京上学，那时他就很活跃，刚入学的新生，就组织救亡募捐义演，我还帮过他的忙呢。”

张群说：“既然有这层关系，是再好不过了。你就帮我出面请他来成都吧，我们把建设厅厅长的位子给留着。”

李伯申说：“我出面请他是可以的，但他不一定会来啊。他对官场历来是不大看重的，现在兼职又很多，不知能不能分身。特别是在孔祥熙的兴业公司里当副总经理，行政院长这一关你要做通才行。”

张群道：“其他工作我们一并来做，只是一定要把他请来。”

此后不久，张群即运用轮番轰炸的方式，礼请胡子昂出山。

先是，派得力部属何北衡专程赴重庆看望胡子昂，向他致意；随后又通过胡子昂的好友吴晋航，转达他希望胡子昂来成都工作的想法；与此同时，省府秘书长李伯申又接连不断给表弟写信、去电，说张主席对他很敬佩，要他出任四川建设厅厅长，相信他能够把四川的建设搞上去。

胡子昂始终没给明确答复。

这时张群又亲自出面，找孔祥熙要人。孔祥熙说：“兴业公司初办，亟需用人之际，他又是创办人之一，公司离不开他。”

张群说：“那我就借吧，借用他一两年，公司的事，他可以兼顾嘛。”

孔祥熙未置可否，要胡子昂自己拿主意。

这时胡子昂确实很犹豫，一方面，他在重庆的事务确实很忙，抽不开身；另一方面，张群一番至诚至信，情义甚笃，容不得他再推却。

两难之下，便去找好友胡仲实、宁芷村商量。宁芷村说：“我看你去有好处，张群是国民党政学系的头目，又是老蒋身边的红人，在成都跺一跺脚，重庆都要打晃，你要实在不给他面子，把他得罪了，我们将来的日子不会好过的。反过来，关系处好了，对我们的事业大有裨益。”

胡仲实说：“这是问题的一方面，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以为你这个什么襄理当得也没趣，傅沐波一手遮天，一意孤行，把个公司搞得越来越乱；而官股力量又这么大，完全没有我们商股说话的地方。按这样的态势发展，日后你和傅沐波必生龃龉，那时再走，就无趣了。”

胡子昂点头道：“都有道理。树欲静而风不止，我想老老实实经营实业，可是这个世界由不得我啊。”

胡子昂决定去了。1941年底，胡子昂辞去了公司襄理之职，于次年初携夫人赴成都，就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之职。

胡子昂到成都的当晚，张群在成都最豪华的酒店摆下宴席，亲自为他夫妇接风洗尘。

席间，张群对胡子昂说：“你能放下中兴公司的业务到成都来屈就，我很感谢。四川乃天府之国，现在又是抗战大后方，建设四川，我是很有想法的，以后我们兄弟联手，把四川搞上去，也算为党国，为地方尽一点绵薄之力吧。”

胡子昂说：“过去我曾做过一些地方建设方面的工作，但作建设厅长，我确实经验不多，但承蒙张主席错爱，我会尽力的。关于工作方面，容我回头作一些调查研究，再向你汇报。”

张群举一下杯，赞同道：“很好，希望你能尽快就发展四川经济建设事业，提一个具体计划，然后向老头子汇报。还有，四川军政界根深蒂固，中央很难插手。而你在这方面还是有些社会基础的，特别是刘文辉，对你颇为激赏，以后需要你从中多做工作哦。”

胡子昂道：“地方军政势力，一方面是想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发展自己的势力；另一方面，他们要想真正立于不败之地，还必须依赖中央集权的关照。据我所知，张主席还一度代任过刘文辉的代表，和他私交甚好，如果不是张主席在蒋委员长面前多有美言，恐怕他也不能在川康呆到今天。”

张群大笑，道：“想不到胡先生不仅是从事工商实业、搞建设的好手，而且还是一位非常好的谋士，难怪刘文辉总在别人面前对你赞不绝口。来，为大后方建设、为我们今后的精诚合作，干杯！”

胡子昂走马上任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成都办了个自来水厂。

其时，成都完全是一个消费城市，只有一些手工作坊，机器行业却寥寥无几，自来水更是没有。为此，胡子昂决定首先从办自来水厂入手，解决成都市民的吃水问题。

这一立竿见影、很快就会见到效益的计划立即得到张群的批准。

办自来水厂，胡子昂可谓轻车熟路、得心应手。建厂资金定额为500万元，由胡子昂自己经营的华康银号拨一部分，再从四川其他银行筹集一部分，工程技术方面依靠华西公司。从设计施工、安装机器到铺设水管，一年就完工，开始向成都市民供应消毒自来水。

随后，胡子昂又筹办了一个机器制造厂，生产一些小型通用机器和零配件，规模虽小，但在成都，从此算是有了机械制造工业了。

与此同时，胡子昂提出的开发四川资源、兴办实业、改变四川落后面貌的一整套计划，得到了张群和中央有关部门的首肯。

为了给逐步实现这个计划壮行色，胡子昂在1944年的春节花会到来时，策划举办了一次全川规模较大的风物展览会。为了筹备这次展览，胡子昂率建设厅的部属花了相当大的力量进行筹备，收集和展出了全川各地的土特产品、矿产品、工业和手工业产品，引起大后方各界广泛的注意。

1944年春节是成都这些年来过得最热闹的一次。重庆和全川各地的群众纷纷涌向成都，参观展览。陪都各大报的记者闻讯而至，张群大出风头，站在展览大厅里，摆出各种姿势让记者照像。

因此，这次展览会，张群是最风光的一个，似乎他主持川政以来，四川经济已然腾飞。

正当胡子昂把全川风物展览会搞得风风火火的时候，孔祥熙忽然从成都打来电话，焦急地说：“胡先生，快回来救驾！”

“发生什么事了？”胡子昂问。

“傅沐波辞职了，公司现在群龙无首，你快回来接任总经理。”

“胡常董不是在家吗？我这边工作已经上了轨道了，张群未必肯放。”

“张群那边不会有问题，当初我们就订了攻守同盟，你是我借给他当建设厅长的，他不能不放。至于胡常董嘛，”孔祥熙叹了一口气，道：“我知道，傅沐波这几年把公司搞得一团糟，大家早就心灰意冷了，谁还有心思来接手这个摊子。”

胡子昂默然无语，心想，你倒是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你不是官当得上了瘾，不想回来了吧？”孔祥熙这一次是彻底放下了架子，带着讨好的口气说，“子昂，如果你要是不走的话，我恐怕早就让傅沐波辞职了，我知道很多人都对他有意见，连我对他也感到很失望。好了，别的就不说了，现在公司有难，我们董事会全体同仁希望你回来接手公司工作。”

胡子昂沉默良久，道：“好吧，我这就去写辞职报告。”

但是心想：我回来不是冲着你行政院长的面子，而是为了自己多年的梦想：实业救国。

一个省建设厅长到大街上一手可以抓一把，但是，一位能驱动资产逾几十亿的集团公司向前运转的总经理帅才却不是那么好找。

胡子昂正是这样的帅才。

次日上班，胡子昂把辞呈交给省主席张群。

张群因为和孔祥熙有约在先，不便强留，于是提笔在胡子昂的辞函上批了一大段很长、情深意切的批语，表彰他在建设厅两年工作的成绩和贡献，同意放人。

归期在即，胡子昂前去张群的官邸辞行。张群执着胡子昂的手，道：

“你在重庆办了许多事业，而能分身来成都为全川办事，而且在很短的时间里做了许多事情，很有成绩。在此我谨代表我个人、省府机关及全川人民，向你表示感谢。”

胡子昂说：“张主席言重了。凭我个人的力量，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是不可能搞出具有规模的建设事业的。”

张群说：“你不必过于谦逊。就我个人的感情来说，我是不愿意你离开的，但是我现在也无力把你留下，只能寄希望于将来了，希望我们还能有机会携手合作。”

胡子昂说：“现在我们已是朋友，而不是上下级关系了，因此我想请教张主席一个问题。”

张群说：“请讲。”

胡子昂：“张澜先生是我的好友，也是我们国民政府的净友，只是因为他说了别人想说而没敢说的话，现在受到监视，行动都不自由了。”

张群：“真有此事？”

胡子昂：“张澜先生住重庆特园5号，而军统局长戴笠却强租了他的隔壁，特园4号，派特务日夜监视他的行动，这还不能说明问题？”

张群沉吟了片刻，道：“子昂，实话对你说吧，我对介公（蒋介石）用这种手段进行统治历来是持不赞成的态度的，而且在党的内部，CC和复兴两个派系矛盾也很大，极不相融。这对党国是没有好处的，前途堪虑。”

胡子昂：“凭张主席跟蒋委员长的亲近关系，就不能直言相谏吗？完全可以走一条更好的路子。”

张群连连摇头，道：“现在很多人、很多事，都已定型了，要想转变，

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好了，子昂，我们不谈这些吧，我知道你为人很正直，既是想帮朋友的忙，也是为国家前途虑，在适当的场合，我会替张表老呼吁的。在你离开成都之前，能不能最后帮我一个忙？”

胡子昂问：“帮什么忙？”

张群说：“替我兼管一下川康兴业公司的事情。”

张群给他出了一个难题。关于川康兴业公司的情况，胡子昂早有耳闻，是个由地方财政拨款成立的官办公司，意在扶持四川各地兴办工矿事业。成立初时拥有一大笔资金，公司董事长是张群，总经理是邓汉祥。而邓却仅仅是一个政治幕僚，对于经营管理企业一窍不通，当总经理时间不长，便把个公司搞得一团糟，耗费了大量资金，却什么事也没办成。这个烂摊子，胡子昂可是一点兴趣也没有。

张群见胡子昂不语，便说：“我知道你在重庆的业务很忙，但是我只是想让你代兼总经理，有你兼管着，我便可以放心地去料理川省的政务了。怎么样，就算你帮我一个忙吧？”

胡子昂感到实在再没有理由推辞了。与张群共事两年，胡子昂发现他并不等同于蒋介石身边那些党棍，有一些正义感，为人也较正派，这在国民党高级官员中，已经是很难能可贵了。胡子昂与他已经有了较深厚的情谊，因此很难说出那个“不”字。

胡子昂答应张群暂照料一段时间，兼了总经理，随后又任顾鹤皋为襄理，罗家选为经理，徐伯阎、丁荣灿、赵一明等人襄助，一方面清理过去对其他企业的借款、投资；一方面就现有资金和向川省各行贷款，经营出口物资，以维持公司局面，使公司逐渐有了起色。

不久，张群辞去董事长，胡子昂继任董事长，顾鹤皋为总经理，直到重庆解放。在此大动荡中，公司同仁努力保护公司财产帐册，把公司完好无损地交给了人民政府。

1944年初，胡子昂携夫人李月华离开成都回到重庆，又捡起了中国兴业公司这个烂摊子。

黑白两道龙虎斗

1945年底，正当全国人民都在喜气洋洋地庆祝抗战胜利的时候，胡子昂却在为中兴公司“治丧”，内心备感凄凉。

1945年底新年即将到来的一天，胡子昂风尘仆仆、满身疲惫从上海回到重庆。他是去上海料理公司关闭后的善后工作的。刚坐下来，还没来得及端起夫人递过来的茶杯，就见和成银行董事长吴晋航和重庆市前任临时参议会会长康心如，火急火燎的登门来访。

都是工商界的老朋友，说话便用不着拐弯抹角了。吴晋航屁股还没落椅子，就迫不及待地：“子昂，你站出来参加议长竞选吧！”

胡子昂笑道：“晋航兄开什么玩笑，你不是自告奋勇站出来竞选了吗？为什么还要推我出来，你是不是没有竞争对手，要找我练嘴皮子？”

康心如说：“哪儿呀，吴先生已经没戏唱了。”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把前一段参议会参议长选举情况说给胡子昂听。

重庆市参政议政组织以前是抗战时期成立的临时参议会，议长就是康心如，议员是遂选的，也就是由政府内部选出来的，跟老百姓没啥关系。这一

次，要搞民选参议会。此前，重庆市职业团体和各区已经选出了参议员，全市共 83 名，胡子昂和吴晋航都是本区的参议员。

参议会组成后，接下来就要选议长、副议长。

热心政治的人都明白，议长这一席位非同小可，哪个集团的人当选议长，就能在参政议政的场合为哪个集团说话，因此为各方所瞩目，成为当时重庆党（国民党）、政（市政府）、团（三青团）、民（中间派）各个方面争夺的目标。为了抢到议长一席，各方面都成立了类似竞选班子的“联谊会”，干一些通关节、送人情、拉选票等幕后交易。

康心如说：“比较成气候的联谊会会有三个，一个是候选人大华公司老板唐华组成的‘正义联谊会’，一个是你的学生、市教育会理事长吴人初组成的‘三民联谊会’，第三个就是推选晋航的‘民治联谊会’。”

吴晋航说：“经过前一段时间的活动，态势已经很明显了。唐华看没希望，已经宣布退出了。我有三青团干事长陈介生支持，市长张笃伦跟你我都是 24 军的旧识，本来是有希望的，但是吴人初来势更猛，他任过市党部书记长，又是国民党 CC 派的骨干，背后有国民党大员、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撑腰。陈介生因为跟我是老朋友，抹不开面子，明里支持我，但是暗里还是支持吴人初，谁还敢跟陈立夫硬抗，找不自在。因此吴人初们很张狂，扬言要把议长、副议长连同秘书长一口吃干。”

康心如接着说：“子昂，还是你接替晋航出来竞选吧。晋航毛遂自荐，还不是为了我们工商界大家的利益？但是说实话，他在地方上没有你的影响大，大家都知道你跟张笃伦市长是旧友，跟省主席张群更是私交深厚，又是吴人初的老师，完全可以把吴人初扳倒。”

吴晋航也鼓动说：“我们工商企业界都对你充满信心，完全相信你会成为陪都政界的一匹黑马。”

胡子昂思考了一会，说：“能当上参议长固然好，但是我觉得现在让我出来竞选，有难度，一是我已经摆了好几个企业的摊子，没精力；二是参议会太复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不当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第三，现在离正式选期只有十几天了，也没时间活动了，竞选也是白搭，所以不如就干脆不动这个念头。”

康、吴又苦口婆心地劝说了一阵，胡子昂始终没有松口，两人失望而去。

康心如、吴晋航前脚走，新任陪都市长张笃伦就后脚来访。

胡子昂与张笃伦熟，还是在刘文辉 24 军的时候。张笃伦是刘文辉的保定军校同学，当时胡子昂是川康边务处长，他是刘驻京、汉代表。两人情投意合，交谊深厚。张笃伦后来被国民党政学系看中，官升军委会办公厅副主任，授陆军中将衔。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西昌成为后防中心，蒋介石设西昌行辕，委派张笃伦出任此要职，一干就是 6 年。

抗战刚刚结束，蒋介石要解决龙云，就是在西昌下的手。当时张笃伦不离蒋的左右，向蒋提供龙云军事配备和分布情况，各种图表资料一应俱全，有条不紊，给蒋留下了深刻印象。蒋介石由西昌返回重庆路过成都时，对省主席张群说：“伯常（张笃伦的号）这个人，是有才干的。”

此后不久，原重庆市长、陆军上将贺耀祖在国共双十谈判时，与毛泽东及一些中共人士有接触，引起蒋介石的不满，又得知贺夫人倪斐君与中共方面有关系，蒋一怒之下，将贺调离陪都重庆。

贺走后，重庆市长争夺者颇多，国民党各派系都推荐自己的人，张群推

荐张笃伦，结果蒋立即同意。

于是，张笃伦脱下陆军中将军服，于1945年12月1日，来陪都重庆走马上任。

由于近一个时期胡子昂一直奔波于重庆、上海两地，处理中兴公司的善后工作，所以至今两人尚未见面。事实上，自胡子昂离开24军以后，两人就很少见面，一个戎马倥偬，一个商务繁忙，即便偶尔见面，也是匆匆分手。这次久别重逢，便觉格外亲切。

寒暄之后，张笃伦说：“今日专程来访，是有要事与你相商。”

胡子昂说：“不是来让我竞选议长的吧？”

张笃伦惊道：“你怎么知道的？正是这个意思。”

“有两个说客刚刚才走。”胡子昂便把吴晋航、康心如来访的情况说了一遍。

张笃伦便说：“我来渝赴任的第二天，即去晋见了蒋委员长，蒋委员长特别指示，重庆是陪都，不是一般城市，又适逢国共合作的非常时期；陪都参议会乃为全国所瞩目，陪都参议会议长更是影响全国，因此一定要选出合适的人来，方可示范全国。”

“可是……”胡子昂刚想说什么，被张笃伦制止了。张说：

“我们已经反复研究协商过，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人了。推你出来，在中央，在地方，在工商金融界，各方面都易于通过。这次我来渝赴任路过成都时，省主席张群还特别提到你，说子昂这个人，可以引为挚友。张群同你我关系非同一般，定会全力支持你。就这样吧，我当市长，你当议长，咱们两人捆在一起，我不垮，你也一定不会垮。”

胡子昂别无选择了。

不想竞选风波迭起。

胡子昂参加竞选的消息一经传出，吴人初即来到胡公馆，对胡子昂说道：“重庆市参议长，别人出来是万万不行的，但老师您出来当，是最好不过了。这件事老师就不要操劳了，一切由我负责好了。”

胡子昂倒也没有当真，匆忙上马，在陕西街他的华康银行设立竞选总部，在苍萍街另设竞选招待所，接待各方来访选民的食宿。

正当胡子昂紧锣密鼓为竞选作准备的时候，不料却听到重庆黑社会义字号袍哥的老大冯什竹放出风声，说参议员中有20多位是他义字号的袍哥兄弟，谁想当议长，就先得通过他这一关。

这显然是在向胡子昂发出警报。事出突然，胡子昂不敢掉以轻心，于是请自来水公司董事长、议员潘昌猷从中斡旋。这一日晚，胡子昂接到潘昌猷的电话，说义字号袍哥下了帖子，要胡子昂到他家与冯什竹会面。

胡子昂二话没说，穿上大衣，戴上呢帽，顶着酷烈的寒风，单刀赴会。

冯什竹已然等在潘家，摆出黑社会老大的派头，开门见山，对胡子昂说：“听说你要竞选议长，我们义字号兄弟都很高兴，一致拥护。”但是，冯什竹斜眼觑着胡子昂，有意要从气势上镇住胡子昂，“我们义字号袍哥也有我们袍哥的规矩，那就是，不是我们自己的兄弟我们决不给他投票。”

胡子昂冷眼相对，静静地等着这位黑社会老大的下文。

倒是冯什竹有些沉不住气了，站起来绕着胡子昂转了一圈，道：“其实呢，也不是什么难事，只要你向关圣爷磕三个头，让我们兄弟叫你一声大哥，那20张选票，就板上钉钉归你胡老板啦！”

不想胡子昂拂袖而起，一字一顿道：“议长我可以干，也可以不干。要我为当议长参加你们袍哥，当老大，我不予考虑。至于选票的事，你们就不必操心了。今天我还有事，恕不奉陪。”

说完拿起帽子，头也不回，出了潘公馆。

走在路上，望着满天的寒星，胡子昂想凭着自己的声望和地位，当个议长应无太多的非议，现如今却连这个大烟鬼、黑社会老大居然也要趁机来摆布我，真是让人心寒。这个破议长，不当也罢。

当夜，义字社出动三辆汽车，满重庆活动，放出风来，说胡子昂已经不参加竞选了，你们不要选他。

翌日，胡子昂便去找市长张笃伦，把昨晚的事如此这般跟张笃伦学说了一遍。张笃伦冷笑道：“就凭他一个地头蛇也想操纵选举？这件事你就不用担心了，我自然会让人去摆平他。”

果然，义字号袍哥很快就没动静了，据说是张笃伦派重庆警察局长唐毅去摆平这件事。唐毅有心要露一手给新任市长看，于是派人在大街上抓了冯什竹的一个手下，又封了他的两个赌场，冯什竹立马乖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离选举没两天时，CC控制的市党部借了市商会礼堂，邀请参议员和正副议长候选人举行座谈。座谈会由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方治主持，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亲自出马，到会讲话。

方治宣布开会后，就请陈立夫讲话。

陈立夫讲话是很有章法的。他由尊重民意讲到参议会，由参议会讲到参议会议长。然后他说，作为中央组织部长，我要站在党的立场，要尊重党的意见。委员长曾明示，重庆参议会议长一定要选一个党内很有经验，工作很有成绩的人来担任。

前面一大段铺垫，是为了把吴人初给引出来。

方治请候选人发言。

吴人初首先上台，他拿着一叠事先准备好的讲稿照本宣科，自然免不了是顺着陈立夫的话自吹自擂一番。掌声寥寥。

到这时胡子昂才知道自己今天是被找来作陪衬的。于是气不打一处来，空着两手，咚咚登上讲台。胡子昂说：“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事先又没准备，就跟大家说一下我参加竞选的经过吧。”于是从上海初回吴晋航登门游说说起，一直说到袍哥舵把子要求入会送票，绘声绘色，引人入胜。还特别点明：

“当初我的学生、市教育会理事长吴人初先生也亲自到我家，表示全力支持，要我出来当议长。今天在这里，又有幸聆听了吴先生的竞选演说，我觉得他这样做得很好，我理解这就叫竞选。但是我既然答应参加竞选，即使失败了，也要竞选到底，这才对得起全市的父老兄弟。”

最后是提纲挈领民主建设陪都的一些主张。

没等他讲完，台下已是掌声如雷。吴人初坐在那里脸如猪肝，陈立夫、方治等脸上也是灰灰的。

散会之后，胡子昂仍觉胸气难平，于是要了车，直奔成都，找夹张群，让他拿主意。张群劝他不要灰心，CC系在国民党内部和人民中部没有什么市场，你一定可以获胜。

胡子昂回陪都后信心更足，决心为了争这口气，也要当上这个议长。于是大张旗鼓展开宣传攻势。

正式选举前一天，胡子昂在已经停业的中兴公司发表竞选演说，最后大宴宾客，招待选民达 80 余桌。

1946 年 1 月，重庆市参议会议长竞选揭晓，胡子昂以 70% 的绝对优势票数击败对手，当选为议长，被他的工商界朋友誉为“陪都政界的黑马”。

为蒋介石歌功颂德

1946 年 3 月，新任重庆市参议会议长的胡子昂，脸上不仅毫无喜色，相反，倒是一连好几天，愁眉不展，愁肠百结。

是因为刚刚走马上任，市长张笃伦就给他出了一个难题。

也算胡子昂运气不好，刚当上陪都议长，就碰上国民政府还都南京。

抗战胜利了，蒋介石颇为得意，以为那是自己的丰功伟绩。因此，还都就想还得风光。为此要办两件事：一是要庆功，二是要祝寿。

想来想去，蒋介石觉得，祝寿好说，到时自然会有人来办的，多年来已经形成惯例了。唯独这次庆功非同寻常，这件事还是以陪都参议会和议长的名义来办比较好，这样更能体现民意。

蒋介石稍一提示，市长张笃伦便心领神会，马上找到胡子昂，让他来完成这个“无尚荣光”的任务。

胡子昂说：“要庆功是可以，抗战 8 年，四川人民流血流汗，有功国家。但是，要庆个人的功……”

张笃伦没让他把话说完，便数落道：“子昂，这么多年了，你这个直肠子性格还没有改。这可是委员长的意思，不办是不行的。”

胡子昂无话可说了。

几天后，参议会举行临时大会，擅长拍马屁的市党部、三青团的参议员闻风而动，提出“纪念国府胜利还都案”，以多数票通过决议，授权议长会同市政府商定具体的纪念方式。

这样一来，胡子昂更是无法推却了，只好硬着头皮来办。

张笃伦提出的纪念方式有两个内容：

1、在重庆市中心都邮街广场建立一座“抗战胜利纪功碑”，作为永久性的纪念；

2、在国民政府正式还都南京之前，择期举行盛大欢送会。会上，由市参议会呈送《国府还都颂》纪念册，市政府献胜利锦旗，并以此锦旗样式作为会后重庆市市旗。

《还都颂》由参议会来写。

但是写什么，请谁写？胡子昂为此绞尽了脑汁。跟参议会秘书处反复商量，结果定的调子是：写天府之国的山川人物、历史功绩，歌颂四川人民出钱出力，支持抗战。

然后是找人来写。先找著名古文家赖以庄先生执笔。赖先生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便找了个托词谢绝了；又找复旦大学教授李白华，亦被谢绝。最后只好请擅长骈文的成惕轩来写。写成之后，又与张笃伦反反复复修改了好几次，最后还是由张群定的稿。

市参议会、市政府紧锣密鼓，各项准备工作至 4 月底即告完成。经蒋介石审定，5 月 5 日，国民政府正式还都南京。

这一日成了国民政府的盛大节日。

市中心都邮街广场充满了喜庆的气氛，新落成的抗战胜利纪功碑高高傲立在广场的中心，广场四周挂满了彩旗，军乐队一刻不停地奏着军乐、国歌。

蒋介石在宋美龄的搀扶下，率众人徒步入场。所有在重庆的国民党大员、外国使节都参加了这场规模空前盛大的典礼。蒋介石理着发青的光头，身穿长衫布履，宋美龄却是华服裹身，光彩照人，恰如两个生活在不同世纪的人。蒋介石和宋美龄站在前台，俯看着他的臣民们。

典礼的主要内容，先，参议长读《还都颂》；后，陪都市长送锦旗。

这篇古典的颂词文长字多，幸好胡子昂古文底子深厚，此前又已经反复演练多次，因此今天念起来倒也颇顺畅。只是蒋介石自小顽皮，读书不精，这样艰涩的古典文，听得似懂非懂；站在他身边的宋美龄，更是一副莫明其妙的神情，如坠五里雾中。

一口气念下来，胡子昂已是汗透衣衫。然后双手捧着这本《国府还都颂》，送给蒋介石。

张笃伦随后把锦旗送给蒋介石。

蒋介石又讲了一番慰勉之词，便退席而去。

胡子昂这才松了一口气。会后，张笃伦与胡子昂商量，要把这篇《还都颂》署上议长的名字刻上纪功碑。

胡子昂这一次是真的急了，无论张笃伦怎么劝说，横竖只是不同意。张笃伦无奈，最后只好不署名刻上去。

这座碑今天还在。重庆解放后它被改为“解放碑”，至今仍然傲立在重庆市中心，碑高 27.5 米，呈八角柱形，外饰浮雕，内有旋梯可攀登至最高顶，顶的四周均有标准时钟，整个碑恢宏、气派，体现了制作者不凡的构思。

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来这里瞻仰、凭吊，但是恐怕很少有人能想象出它当年落成的盛况，更很少有人知道它的来历了。

胡议长的三件漂亮事与两个遗憾

既然当了议长，胡子昂还是想利用议会这块阵地干一些实事的。

胡子昂就任议长以后，在首次大会上对全体议员提出了五点要求：

- 1、认清时代使命，珍视本市价值；
- 2、尊重议会职权，克尽议员职责；
- 3、协助政府建设现代化都市；
- 4、减除繁苛，培养民力，维持永久繁荣；
- 5、明是非，别公私，树立良好风尚。

但那时的议会派系复杂，议员良莠不齐，贯彻起来却非易事，因此胡子昂的议会道路难免坎坎坷坷，反映民意也只能走“曲线救国”的路子。就是在这种夹缝中，胡子昂还是做了几件漂亮事，震惊重庆政坛。

挂旗之争是其中之一。

一次，参议会举行全体会议。胡子昂坐在主席台上，正要宣布开会，忽见议席上的党方议员古锋站起来，气呼呼地一声大吼：“全体国民党参议员退出会场。”

全场为之一惊。胡子昂刚要开口问为什么，古锋一声大吼：“今天会场为什么不挂国民党党旗？”

胡子昂反应很快，马上答复说：“前次我在南京，据说国大会议会场上

也只挂国旗不挂党旗。”

话音刚落，古锋又抢着说：“国大会议容纳有各党各派，本会参议员无论开起门还是关着门；都是国民党。”

这话一出口，又引起不少参议员窃窃私语：“这话真是荒唐！”

议员温少鹤起立发言说：“议会是以地方福利为目标，而且国民党政府已经表示还政于民，我看党旗是可以不挂的。”

古锋反问：“为什么开会时还要读总理遗嘱呢？是不是也该取消？”

杨重熙接着发言：“我们现在读的是国父遗嘱，而不是总理遗嘱。国父乃中华民族之父，不只属于国民党。”

党方议员李森荣又挑动说：“那不是不要国民党了吗？”

胡子昂站出来以议长身份婉言说明：“本人主持议会以来，有许多事情虽以大会授权，也从未擅自处理，凡事总要提出来征询同仁意见才去办。只挂国旗不挂党旗，事有依据，是效法南京，而且这事还在预备会上提出来交换过意见，当时陈秘书长还说过，他在南京市参议会还看到过同样情形，大家并无异议，不料今天竟发生这个问题，本人十分遗憾。”

古锋仍然坚持：“要挂上党旗才能开会。”

胡议长答复道：“现在大家都主张国共合作，既是国共合作，要挂国民党党旗，也就要挂共产党党旗。”

古锋反对道：“参议会是国民党领导的，离开国民党什么也干不成。不挂党旗，不就是不要国民党了吗？”

胡子昂正色道：“我们是议会，是民选的民意机关，不是国民党的直属机关，议会代表民意，要有公平的主张。”

古锋理屈词穷，忿忿然离席退场。

这时党方议员杜岷英站出来打圆场，说把这个问题保留一下，先开会，回头再议。党方这才平静下来。事实是党方事先没有充分研究，古锋仓促发难，经过胡子昂这一解说，他们自觉理由不够充分，引不起足够的同情，只好暂时退下阵来，另想办法对付。

党方议员经过夜间密商，决定次日大会全体拒不出席。

胡子昂看到出席会议的人超过了法定的人数，于是宣布照常开会。

但是会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再起波澜。有的希望派人劝古锋等人回来开会，有人反对说，是他们自己要走，谁去找他回来。

吵来吵去，竟至拍案破口大骂，大有咆哮公堂之势，会场秩序顿时大乱。不得已，胡子昂只得宣布散会。

胡子昂会后找议会骨干商量，有的主张卷旗收兵，有的要再看一下，有的认为这样闹下去毫无意义。胡子昂拍板，采取两个办法：

1、是否再挂党旗，请中央指示；

2、闭幕时唱国歌。

随后经过调解、斡旋，第三天开会，古锋等党方议员也出席了。

后收到国民政府内政部回电重庆参议会：

“依据此次国民大会先例，民意机关集会，党旗得不悬挂，但必须悬国旗、唱国歌，即请查办。”

一场风波，终告结束。

另一件事是罢免了较场口打手刘野樵。

1946年3月，参议会选举国大代表。这又是国民党派系斗争的大较量。

国民党 CC 派和三青团互相争夺席位，结果三青团不敌 CC，CC 系的五名候选人全部当选，其中包括“较场口事件”打手刘野樵。

较场口事件是在这年的 2 月 10 日发生的。那天，民主建国会发起“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会场设在较场口，出席大会的有郭沫若、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马寅初等人。结果在大会主席李公朴讲话时，一批特务抢占主席台，大打出手。施复亮被迫打，李公朴头部被铁尺打破，血流如注，郭沫若、马寅初也被打伤。这就是当时震惊全国的“陪都血案”。

在众多的打手中，刘野樵就是那个第一个跳上讲台，去抢夺李公朴话筒的打手头目。这桩血案是胡子昂亲眼所见的，而且还是他把施复亮救出虎口（这将在后面章节介绍）。

这一次国大代表，刘野樵因为“反共有功”，被选上了。胡子昂虽是议长，却敌不过 CC 人多势众，也是有怒难言。

7 月下旬，参议会召开第二次大会。此次会议议题，本来是要听取重庆市工务局长的工作报告，三青团议员涂重光突然提出紧急动议，要求大会讨论罢免国大代表刘野樵一案。

三青团显然是有备而来。这一提案是由涂重光与温少鹤、石孝先、丁荣灿等 44 名议员联名提出的。提案的理由是，在刘野樵所办的《社会时报》上，近日刊登了两段“不敬领袖、奚落议员”的材料。

胡子昂心中一喜。尽管他心里很清楚，这一动议，只不过是三青团针对上次国大代表选举全军覆没的报复，但是他对刘野樵这个国民党特务打手素无好感，感到此次正是一个好机会，于是顺水推舟，以大会主席的名义立即表示：

“这是由 44 名议员联名提出的议案，事关重大，应先行讨论。”

随即让秘书长陈云阁宣读提案原文。

宣读后，国民党 CC 派和三青团双方议员展开讨论。双方各不相让，又一次咆哮公堂，会场秩序极乱。

胡子昂稳坐主席台，不动声色，偶尔敲敲桌子，请秘书长大声宣读有关议事条文，提请大家注意。

有人忍受不了这种极度混乱的场面，进言道：“这是对刘野樵信不信任的问题，有什么好讨论的，请主席提付表决。”

胡子昂抓住这时机，当即宣布：

“本案已经充分讨论，若没有新的意见，立即停止讨论，准备表决。”

这时国民党 CC 方面的一些议员反对表决，随即退出会场，表示抗议。

胡子昂看看会场，发现场内议员还多，立即宣布本案提出表决。表决结果：41 票赞成，11 票反对，获得通过。

秘书长马上写了决议交由胡子昂，胡子昂高声宣布：

“原案成立，由大会咨请市政府转报中央主管机关核夺。”

第二天，重庆全市轰动，都说是大快人心。重庆各大报以头条大篇幅报道了这一消息。许多报纸的消息中说：在讨论罢免刘野樵时，情词热烈，声色俱厉。

就连国民党的喉舌《中央日报》也不得不从侧面报道：讨论刘案时，会场气氛紧张，辩论热烈，众口纷坛，感情奔放。

这个以反共起家的打手刘野樵，挨了这一闷棍，立即乖得跟孙子似的。

自然，CC 和中统是不会就此认输。经后台老板陈立夫的幕后活动，内

政部给重庆参议会的批复是：“罢免无所依据，应勿庸议。”

胡子昂愤怒了，立即召集参议员开会讨论，作出五点决议：

- 1、不接受内政部复文；
- 2、登报声明撤销刘野樵当选证书，并致电国大会议备案；
- 3、通电全国民意机关和报馆，一致呼吁；
- 4、立电中央，表示：如有刘野樵参加制定的宪法，本市市民不受约束；
- 5、推派代表，赴京请愿。

此后，参议会又几经讨论，形成共识：不罢免刘野樵，誓不罢休。

陈立夫见势头不对，赶快叫刘野樵不要再出席国大，有会请假不去，同时给了他一笔钱，叫他去上海避避风头。

重庆参议会依然群情激愤，认为“请假”不等于罢免，要求坚持原案。

国民党当局怕事情闹得不可收拾，于是由市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分头给市长张笃伦和议长胡子昂去信，要求平息事态；接着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又致信胡子昂，要求“婉为解释，藉弥争议”。

胡子昂向参议会念了吴铁城、吴鼎昌的来信，大家默然。

大家深知国民党内部乌七八糟，无正义可言，轰刘野樵无非是想压一压特务们的嚣张气焰，至此，目的也算到达了。于是不了了之。

议长胡子昂的第三件漂亮事是不挽戴笠。

1946年3月16日，军统局局长戴笠在从青岛飞赴南京见何应钦的途中，在南京附近坠机身亡，灵柩放在南京灵谷寺。

越年3月，军统局要在灵谷寺后山的一个小水塘旁安葬戴笠。

戴笠生前与蒋介石关系非同一般，葬他的这块风水宝地就是蒋介石拄着手杖、爬上灵谷寺后山亲自选定的。因此安葬戴笠时，仪式几乎超过国葬，全国各大城市的军统特务都要开追悼会。

重庆是戴笠生平事业最得意时的老窝，根基很厚，子弟颇多，因此重庆的悼唁活动搞得格外隆重，由重庆的国民党党政机关和军统共同发起组织。市党部、市政府联名通知各机关团体，一律要送花圈、挽联。

重庆参议会自然也接到了通知。秘书处拿着通知去请示议长，胡子昂对戴笠的特务统治早就深恶痛绝，而且这些年来，也没少和他们交锋，戴笠暴亡，高兴还来不及呢，还要叫他送花圈、挽联，休想。

于是胡子昂对秘书处说：“这件事就不要告诉大家了，我们参议会也不作任何表示。”

到了开会的前一天，重庆市的国民党党政机关、法团，都送去了挽联，唯独没有市参议会的。重庆军统头子于是通过警察局长、议员吴晋航分头来找胡子昂，说重庆市民意机关没有表示，太让戴局长难堪了，哪怕不用议长的名字，只以参议会的名义送一副也好。

胡子昂始终没有松口。

特务们无奈，想了一个臭招：让人以参议会的名义写了一副挽联，挂在追悼会礼堂的外面。

胡子昂知道后大为生气，立即通知参议会秘书处，派人赶到追悼会会场，说是那副挽联要改两个字，将冒名挽联取了回来，双手用力将它撕成碎片。

胡子昂不挽戴笠的事在重庆被传为美谈，却与军统特务的过节越来越深。

总的说来，胡子昂的这个议长当得不自在，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矛盾集中

在他那里，让他举步维艰。

1946 年底的一天，重庆自来水公司董事长潘昌猷、电力公司董事长刘航琛结伴来找胡子昂，说明抗战以来，重庆迭遭日军飞机轰炸，水、电两公司设备损耗过大，加上物价飞涨，公司收入减少，难以维持正常运转，为此要求提高水电价格。这个水电加价的提案已经提交到市参议会了，在提请审议之前，他们来找他这个议长走走路子，希望能获通过。

胡子昂又一次陷入了困境。

从情理上讲，这个忙应该帮。他跟潘、刘二人都有交谊，是商界的朋友，在一些公司里共同持有股份，他本人就是自来水公司的股东，兼过自来水公司的经理，对这个事业有感情，跟自己也有利害关系。

不久前，他还帮过刘航琛的忙。

那一次，是刘航琛搞金钞投机失利，一时过不了关，来求助胡子昂。

刘航琛在重庆工商界的人缘并不好。他当过刘湘 21 军的财务处长、四川财政厅厅长，四川的很多银行都跟他有关系，自己也当过川康、川盐两家大银行的董事长，黑了不少钱，同时运用他的权力、财力插手四川工矿企业。他常常在公开场合吹牛：四川工商界的事，只有别人向他开口，他是从来向别人低头的。闹得大家都不喜欢他。

但是牛吹大了必然要破。这次金钞投机看走了眼，使他的川盐银行亏空了一大笔，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张罗筹钱来填补亏空。由于他过去过于骄横，金融界现在谁还愿意帮忙？

他到处磕头求援，头都磕破了，还是没有人愿意出手相助。走投无路，只得到华康银行找胡子昂，求胡议长帮他渡过难关。

胡子昂本也想借此教训他一下，但转念一想，感到他的摊子铺得太大，如果川盐银行倒闭，势必影响到四川的许多银行和企业，对工商界不利；同时自己又是重庆参议会议长，倘若川银倒闭，势必将引起市场混乱，对不住重庆市民。于是放弃了教训他的念头，答应帮忙。

当晚，胡子昂亲自出面，约请和成银行、川康银行、聚兴诚银行、四川省银行、美丰银行等川帮各大银行的负责人在他的华康银行二楼聚会。胡子昂朗声向这些金融界巨子道：

“川盐银行的刘航琛目前所处困境，想必大家都知道了，所以造成今天的局面，是他自己的责任。但是刘航琛目前与川界各企业都有关系，他垮了，势必对四川的金融、工商企业界造成不利的影响，所以希望各位同行不计前嫌，伸手拉他一把。首先我们华康银行为他承担 20 万。”

参议长亲自站出来说话，分量毕竟不一样，当场大家纷纷表态，有的愿意承担几万，有的十几万，一下子就把刘航琛的亏空给补上了……

但是，今天的情况不一样了。从情上说是一回事，但从理上说，就是另一回事了。由于经常停电停水，重庆市民本来就怨言很多，这次又要提价，而且数目又很大，两公司各达法币 44 亿之多，数额惊人，将会增加市民不小的负担，因此当即表示：不可。

潘、刘二人怏怏而回。

在参议会讨论这个提案时，胡子昂又明确表态，说不能通过。

议会讨论时众说纷坛，于是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了解两公司的情况，再作决定。

不久，胡子昂因中兴公司的事情去上海。

在这段时间里，两个公司极力暗中活动，一些参议员接受贿赂，并和议会秘书长串通一气，在参议会中通过了“水电加价案”。

水电加价案一出台，市民怨声载道，极为不满。

胡子昂从上海回来，得知提案已获通过，非常气愤。

尽管胡子昂知道这其中必有猫匿，但凭一己之力已是无力回天，又无实据，只得听之任之。

此后胡子昂多次说：“水电加价是我在议会任职期间的一件憾事。”

胡子昂在议会的另一件憾事，是两江大桥工程。

在长江、嘉陵江上架设两座飞桥，接通山城重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这是胡子昂多年来的宿愿。以前曾为此多次努力过，但都没有成功。

当了议长后，胡子昂想，凭借议会的力量，这个梦大概可以，圆了。

参议会刚成立时，蒋介石接见陪都全体参议员。胡子昂趁机进言，希望国家支持建设两江大桥，留作抗战陪都的永久纪念。

蒋介石当时正在兴头上，便点头答应了。

参议会第一次大会开幕讲话，胡子昂又以“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为题，提出了本届议会的三大目标：建设重庆下水道、北区干路、两江大桥。

这一提议获大会一致通过，并被写进了闭幕宣言。

市长张笃伦也想在任职期间干一些名垂千古的大事，胡子昂的这些设想正好与他的雄心大志相吻合，因此给予了全力支持。

由于天时、地利、人和，三大工程的前两项迅即开工。成立了下水道工程处，聘请美国市政工程专家毛尔利为总顾问，负责筹划下水道工程，计划分四期进行；沿嘉陵江的北区干路由市政工务局直接主办。

至1947年5月，下水道第一、二期工程相继完成，第三期工程开始进行，北区干路西段工程大体完工，东段工程准备动手。

此后，物价暴涨，每天的物价都在成倍地往上翻，两项工程经费难以为继，几陷瘫痪。

胡子昂和张笃伦先后去南京找蒋介石、张群。此时张群已继宋子文之后，担任行政院长。张群那时虽然手头也很紧，但看在两位老朋友的面子上，答应北区干路经费由行政院补助，下水道工程经费由国家银行贷款维持。

只是那时国共内战打得如火如荼，经费迟迟兑现不了。

这时又传来川黔铁路改道，不经过重庆的消息。这将对重庆经济发展带来极大影响。为此，胡子昂主持参议会，通过了反对交通部川黔铁路改道的决议案。

同时，胡子昂又在重庆工商界组织的“星五聚餐会”上发表演说，大声疾呼：川黔铁路必须经过重庆，重庆下水道、北区干路、两江大桥必须建成！

这时张笃伦去南京，胡子昂让他把自己的意见和重庆参议会的决议转告张群，结果换来的是：“川黔铁路不改道，但停止对下水道和北区干路工程的补助。”

为此又几经奔走，蒋介石终于于1948年2月亲下手令：由四联总处贷款120亿，完成重庆下水道工程。

这是张笃伦、胡子昂搭档期间，为重庆人民所作出的一大贡献。

但是，两江大桥建设的命运就惨多了。自参议会通过议案后，陪都建设委员会便拟了个方案，同茅以升的中国桥梁公司订了建造合同，当时预算是

160 亿，蒋介石亲口答应过胡子昂，这笔款项由中央拨付。

但这仅仅是一张空头支票。

1947 年初，胡子昂去南京，找到张群，一同去蒋介石官邸、要求拨款兴建两江大桥工程。当时蒋介石正在与西北王胡宗南密谋准备攻打延安，哪有心思搞建设，于是被硬梆梆地顶了回来：

“桥非急需，暂缓兴工。”

胡子昂听后非常气愤，回到重庆，即在参议会大会上再一次表明自己的心迹：“本会主张的三大工程必须完成。两江大桥虽有种种阻碍，但我此志不懈，仍当全力促其实现。”

但现实无情。任凭胡子昂大声疾呼，喊破了嗓子，但终究无济于事。

1948 年 7 月，国民党政府选举立法委员。胡子昂在张笃伦的支持下，动用了各方面的关系，当选为立法委员。

按照当时参议会的组织条例规定，参议长不能兼任政府职务。此时也正是胡子昂的议长当得心力交瘁之际，失望之余，趁此机会，卸却了这副担子，也就卸下了当议长惹下的一身麻烦。

在和全体参议员告别时，胡子昂痛心地说：“两江大桥终未促成，是我的终身憾事。”

又当即挥毫，留下 8 个字，算作是临别赠言：谨慎行事，公而忘私。

许多年后，已在北京人民政府工作的胡子昂回到重庆，登上了峨岭。从这里，他久久地眺望着灯火辉煌的山城重庆，眺望着犹如遥相对应的两条巨龙一样，横卧在长江、嘉陵江之上的两江大桥，不禁感慨万千：“我多年的梦，还是共产党帮着给圆了。”

第6章 风雨下重庆

与周恩来握手

1945年10月，重庆。

由于毛泽东、蒋介石在这里握手“言和”，所以这个年度的这个月份，成为重庆历史上最为辉煌、最为激动不安的日子。

参议长胡子昂和重庆各界人士一样，怀着一份和平的愿望和对未来的深深不安，观望着，等待着。

这天晚上，在重庆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处工作的施复亮，忽然来到位于新民街铜鼓台的胡子昂家。

胡子昂与施复亮的关系不错。

施复亮一直是个落魄的文人。人们知道他曾是北大、清华、北师大等京城著名学府的名教授，深受学生的爱戴，当局的仇恨；还有人知道他曾是中共的资深党员，曾与陈独秀一起参加过党章的起草。后又任过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政治教官，1927年在大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他在上海报纸发表文章，宣布脱党，独自去寻找反蒋救国之道。结果闹得谁也不喜欢他，成了一个衣食都很难保的流浪经济学教授。

施先生是抗战初期来重庆的，带着他的妻子钟复光和后来成为中国著名钢琴家的孩子施光南，生活上衣食住行都相当困难。因为他的历史模糊，重庆当时很多人怕同他接触。尽管各方面都很困难，但施复亮是一条硬汉子，有人以参政员之职向他劝诱，他却表示：“宁愿饿肚子，也不投蒋介石”。

而当时胡子昂恰好是参政员，听说这件事后，倒是油然而生出敬意。与之交往，发现他性情坦率，正直诚恳，学问渊博，是个难得的人才，于是便将施复亮推荐给在重庆的四川省银行总经理潘昌猷，担任了省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主编《四川经济月报》，此后，二人交往密切。

“我见到毛泽东先生了！”施复亮一进门，就兴奋地对胡子昂说。

“真的？”胡子昂惊问道：“什么时候？”

施复亮说：“今天下午，毛先生接见了重庆爱国民主人士，我和张表老（张澜）、黄炎培、沈钧儒、陈铭枢等人被邀请参加。”

“毛先生怎么说？”胡子昂又问。

“毛先生说，目前国共和谈，虽然部分协议已经初步达成，但蒋介石仍在美国支持下运兵，准备内战。蒋介石是大打大骗，小打小骗，让我们爱国民主人士不要轻易上当受骗。”

胡子昂陷入了沉思。

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内忧外患，中国人是多么需要和平啊。眼看着这一愿望就要实现了，难道会又一次化为泡影？

“子昂，”施复亮道，“今天我来找你，是要告诉你一件重要的事情。”

胡子昂从沉思中醒来，问：“什么事？”

施复亮道：“西南实业协会邀请周恩来先生后天到‘星五聚餐会’上发表演说，主讲《当前经济形势》，周先生让我转告你，请你参加。”

胡子昂眼睛一亮：“周先生让你来的？”

施复亮说：“是的。周先生让我转告你，不仅希望你去，还希望你尽可能多拉上几位重庆工商金融界的朋友一道去。”

胡子昂兴奋地道：“好，好。请你转告周先生，我一定去，我的朋友们也都一定会去。我正想见他呢，听听他对时局的看法。”

施复亮惊讶地问：“你认识周恩来？”

胡子昂微笑着，自豪道：“是的，1938年我就认识他了。”

胡子昂第一次见周恩来，是在1938年春的武汉。

那一次，胡子昂是代表重庆的华西公司、自来水公司、电力公司、水泥公司等四家企业，去武汉国民政府要求贷款的。当时正值春节，国民政府机关的人很难找，他想等过完了节再接着找人要钱，一时又无处可去，想起重庆《新蜀报》社长兼总编周钦岳也在武汉，于是便去找周钦岳。

胡子昂与周钦岳是中学同窗，知己多年，这一次异乡重逢，又是佳节，不免把酒畅谈。此时抗战刚刚开始，谈起国事，两人都忧心忡忡。

胡子昂说：“看样子，蒋介石恐怕不会打到底的。老蒋这一妥协投降，中国的前途就完了。”

周钦岳说：“我想带你见一个人，你去听听他对抗战时局的看法，一定会大受启发。”

胡子昂便问：“这个人是谁？”

周钦岳说：“周恩来。我想你听说过这个人的。”

胡子昂道：“他的大名，中国人谁不知道？不过，他是中共的高层领导人，他会见我们吗？”

周钦岳笑道：“这你就放心好了。他是我的老朋友，我们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就熟了。我还参加过共产党呢，和周先生交往一直很密切的。”

胡子昂当即表示，很想见见他。这样，在春节后的两天，周钦岳约了胡子昂，一同到周恩来在武汉的住处，拜会了周恩来、邓颖超夫妇。

胡子昂受到了非常热情的接待。周恩来谈锋很健，从国际国内的错综复杂关系，一直谈到抗战形势的变化，阐释了中共的抗日主张，最后总结出一条：抗战必胜，妥协必败。

最后，周恩来说：“钦岳社长是自己人，我就不必多说了。胡先生，你是重庆实业界的新秀，你们要团结四川各界人士，支持抗战呵。”

胡子昂欠身道：“胡子昂亦是热血的中国人，请周先生尽管吩咐。”

周恩来笑道：“那好啊！我们的《新华日报》准备由武汉迁往重庆出版，请胡先生帮助我们把这项工作做好。”

胡子昂满口应承下来……

这一次是胡子昂第一次同中共领导人见面。周恩来的一席话，使他初步了解到中共抗日救国的方针和统一战线的政策。特别是周恩来谨慎、谦虚、和蔼可亲的大家风度，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此后，胡子昂又在重庆见过周恩来几次。

一次是在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的一天，周恩来在白象街邀请爱国工商业者座谈，揭露事变真相，希望工商界坚持抗日救亡；以实际行动制止国民党武力进攻共产党。胡子昂在座，会后还在工商界的朋友中进行了宣讲。

另一次，是抗战接近胜利的1944年冬，周恩来在上清寺的“特园”，邀请包括胡子昂在内的10多位民族实业家座谈，中心议题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应该往何处去。周恩来告诉大家，今后的任务，就是要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独立、富强的新中国，而工商界任务格外艰巨。

而今天，抗战胜利了，国家何去何从？民族工商业的前途如何？

这正是包括胡子昂在内的民族工商业者最为关心的问题。他们为此苦苦思索，苦闷彷徨，希望得到解答。

周恩来来的正是时候。

这一天胡子昂和他的工商业朋友们早早来到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的会议厅。而今天“星五聚餐会”来的人特别多，一直挤到了会议厅的门外，以至于周恩来到来后，竟很难通过人群。

周恩来和大家一一握手，然后走上讲台。

“朋友们！”周恩来微笑着开口道，他的嗓音清亮，普通话里夹带着地方口音，但却极富感染力。他说：

“……抗战后的工业建设，首先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而安定的政治环境，又不外是和平、民主这两件大事。要和平，这是全国人民的要求；要民主，不但要政治上的民主，经济上也要民主。但是，中国今天的情况却是管制得太多，统治得太死，以至于市场紊乱，工商凋敝。……国家资本、私人资本、合作资本，应当在节制的原则下互相配合，反对官僚资本、垄断资本和侵略资本。今天的中国经济还很落后，发展很不平衡，今后中国必然要经过一段保护私有财产、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将来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某种程度，究竟是否转入社会主义，还要用民主的方式来决定。……中国今天的劳动者和民族资本家都受压迫，应当互相让步，共同奋斗，以求中国工业的发展。”

周恩来以一个有力的手势结束了他的讲话：“我希望在座的各位民族实业家能有远见！”

会场立即爆发热烈的掌声。

周恩来公开地全面阐述中共的经济政策，这在重庆还是第一次，胡子昂和重庆的实业家们深受震撼。

此后不久，《新民报》负责人陈铭德、邓季惺在家里宴请周恩来，约请胡子昂等几位工商界朋友作陪。

席间，周恩来又一次强调，没有政治的稳定，没有和平，没有民主，就谈不上建国。中国共产党是主张和平建国、反对内战的，希望民族工商业家和民间团体联合起来，制止内战，共同建国。

胡子昂对共产党的认识和了解主要来自于周恩来。

如果说，胡子昂 1938 年初识周恩来时，更多的是被周的人品风度和人格魅力所吸引的话，那么时至今日，经过这几年的风风雨雨，他则是从周恩来那里，较深层的了解到共产党的主义。

他固有的思想天平开始倾斜，对于国民党、蒋介石的幻想正在渐次消失。

1945 年秋，国共双方经过“重庆谈判”，达成协议，决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集合各党派各方面人士，共商国是。

1946 年元旦，胡子昂对专程来访的《新华日报》记者，发表了公开谈话，表明他的看法和希望：

……我个人对于目前时局的看法，完全同意民主建国会诸位先生的看法，所以不拟多所阐述。对于即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我希望它不是一个徒具形式的官场会议。在这个会议中，一定要产生一个促进民主化的具体方案，然后根据这个方案改组政府，使其容纳各党派和各无党派的人士。但仍然是一元化的政府，所有的军队都必须脱离国民党，真正成为国家的军队。

关于人民的自由权利，我认为一个近代民主国家中人民所享受的各种自由，如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宗教、职业、居住……等自由，都不应该受一丝一毫的束缚。国民大会的代表，最彻底的办法是重新改选，如果办不到，最低限度也要求各方面的协调，将代表的数目和成分加以调整，求其平均，不得有畸轻畸重的现象。

关于和平建国的共同纲领，这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明一切，希望参加协商会议的诸代表，多多注意于报章杂志以及未形诸文字的各方意见，以收集思广益之效，并且在会议中慎重讨论，务期求得一个圆满的共同纲领，作为和平建国的依据，会外人士也要充分而积极地表示意见。

个人从事工矿金融事业 10 余年，今天抗战胜利了，却在替中国兴业公司“治丧”，个人隐曲，令人无话可说。但是，个人对于这次的政治协商会议，却寄予无限的热情和希望。

胡子昂的这次谈话在《新华日报》全文发表后，在陪都朝野引起不小的反响。此时他正在着手陪都参议会会议长的竞选工作，能说出这番话，确实需要一定的胆识和勇气。

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前夕，周恩来又在大溪别墅宁芷村家，约集工商界和新闻界人士谈话。参加的除胡子昂外，还有刘航琛、宁芷村、陈铭德、刘正华、赵纯继以及名记者浦熙修。刘航琛旧习难改，第一个抢先发言，大谈他的“经济建国”理论，还大量引证全国和四川的财政、金融、贸易、工业生产等各方面的数据，以炫其能，喧宾夺主，闹得大家不胜其烦。

周恩来倒是很耐心地听着他的发言，直到他说完了，才接过话头说：

“经济建设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政治问题。政治问题不解决，经济建国是不可能实现的。”

一句话便抓住了大家的心。胡子昂为之精神一振。

周恩来又说：

“《双十协定》虽然签了字，但蒋介石却在和平、团结的响亮口号下，坚持其所谓军令统一、政令统一，厉兵秣马，磨刀霍霍，积极准备内战，一心想取消解放区，这难道不是政治问题？蒋介石打着民主的幌子，实际上箝制舆论，迫害进步人士，镇压爱国运动，这难道不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是重要的，但当前解决政治问题是第一位的。”

周恩来顿了一下，看了大家一眼，指着胡子昂说：“你们当中，有几位是民族资本实业家，如这位胡先生，你们经营的企业受不受官僚资本的排挤、压榨，胡先生是最有体会的。抗战胜利了，他却要替兴业公司‘治丧’。现在的国民政府，是少数人垄断国民经济，保护官僚资本，所谓经济建设，不过是加大四大家族的私人金库，与国家人民何干？这也是政治问题嘛。”

说到这里，周恩来站起来，摊开双臂，开导道：“你们都是工商界中有力量、有影响的人，要想发展自己的企业，就应当支持和平建国的方针，反对内战，反对独裁，为实现《双十协定》，施加你们的影响。”

临别时，周恩来一直把他们送到室外。周恩来和胡子昂并肩而行，周恩来对他说：“你的元旦谈话我看过了，很有力量，影响也很大。你在政界、工商界说话都很有分量，以后望你多多和我们合作。”

胡子昂道：“以前我做过许多救国梦，教育、农业、实业，结果发现什么也救不了。此后多次得到您的开导，获益非浅。周先生放心，我会在民主运动的浪潮中与您相呼应的。”

周恩来紧紧地握了握他的手。

三呼和平成为世纪之响

1946年1月31日，在山城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落下帷幕。

经过激烈争斗，会议终于通过了政府组织、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和宪法草案等五项决议案。虽说后来它成了一纸空文，但当时看来是成功的。为此国人庆幸，山城鼎沸。

2月10日，由民主建国会发起，邀集陪都各界，在较场口召开盛大的庆祝政协会议取得成功的大会。

这次会议胡子昂本来也是要参加的。

会前，施复亮来他家，跟他谈了两个意思：一是要他动员各界人士参加，同时民建会希望他能以参议会议长的身份到会讲话；第二个意思，因为这次大会声势浩大，估计国民党特务可能会捣乱，为此让他以议长的地位协助维持会场。

施复亮来找胡子昂是有道理的。

这些年来，施复亮虽然脱离了中共，但反蒋救国的矢志未移。

1945年秋，他与章乃器、黄炎培、胡厥文等人一起共同发起组织民主建国会。为此施复亮多次找胡子昂商量，希望胡子昂共同发起，胡子昂同意了。这年的12月7日，胡子昂参加了民建会第二次筹备会。

后有一次，黄炎培约胡子昂到家里吃饭，有施复亮、章乃器、杨卫玉等作陪。此时胡子昂正在参加参议长的选举，又在张群、张笃伦等人的策动下，成为国民党的一员，大家认为胡子昂处境微妙，暂不公开为好，以同情者的面貌出来，将更有利于民建的工作。此后，民建的活动，胡子昂便不再出面。但是在许多公开场合，胡子昂多次表示：完全同意民主建国会的看法。

当然这些事说与不说关系都不是很大，只是为此后来还发生过一个小插曲：解放初期胡子昂被推选为民建会西南地区的召集人之一，当时就有人反对，说胡子昂不是民建的创始人，是国民党任命的官吏，不该担当此任。对此，胡子昂只是淡淡一笑，说：后生娃子嘛，我们那时的事，他们知道多少？

这是题外话。

再说施复亮要胡子昂参加2月10号的庆祝大会。

施复亮告诉胡子昂，大会推选郭沫若、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李德全、马寅初等20余人组成大会主席团，还准备请周恩来、董必武、邵力子、孙科、沈钧儒、李烛尘以及参议会议长等12人出席讲话，所以务请胡子昂届时出席并讲话。

胡子昂思考了一会，说：“参议会新近成立，事务很多，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事的话，我即去参加。另外，政协会议深得人心，我想当局不能不有所顾忌，也许不会出什么事的吧？”

施复亮忧心忡忡他说：“这很难说呀，蒋介石可是什么事都能干出来的。”

胡子昂觉得也对。

为保险起见，他立即与重庆市警察局取得了联系，得知担任较场口治安的，是一位警察局副局长，他正好是胡子昂的学生，同时与参议会丁荣灿也有交谊，于是便让荣灿电话约他来自己家里，希望他协助庆祝大会，不要出乱子。这位副局长答应尽力。

2月10日，市长张笃伦约他谈事。大约是上午九点，他从市府出来，

赶忙驱车前往较场口。

等他赶到时，较场口已是一片混乱。在较场口一家杂货铺旁边，胡子昂看见有人正护卫着施复亮朝铜鼓台方向跑，后面一群打手约有十几个之多，挥舞刀棒，吆喝着“打死他、打死他！”穷追不舍。

胡子昂头皮一紧，心想糟了，还是出乱子了！

连忙叫车停下，心想阻止特务，却苦于自己身边无兵无卒，情急生智，从杂货铺中抄起一个凳子放在路中，站上去振臂高喊：

“我是议长胡子昂！今天是庆祝大会，决不允许你们在这里如此打闹！”

这一喊果然把众打手镇住了。议长的名字特务们还是知道的，因此不敢放肆，瞪了他两眼，怏怏而回。

胡子昂又看施复亮，见他眼镜也没有了，全身泥土，脸色发青，已进入昏迷状态。再看保护他的人，也都是一个个披“红”挂“彩”。于是明白特务们这次动作不小，急忙吩咐用他的车把施复亮送往医院抢救。

原来，国民党在庆祝大会的会场内外布置了很多打手。当大会主席宣布请大会总指挥李公朴作报告时，一批特务冲上了主席台，特务刘野樵抢过话筒，在扩音器前狂呼：“打！打！”于是有特务用铁尺狂打李公朴的头部，血流如注；施复亮见状冲上台保护李公朴，高呼不要打人，却被特务诬为捣乱会场秩序，对施复亮拳打脚踢，把他推下台去，连跑过来保护他的几个青年也挨了打。幸好，在撤退的时候碰到了胡子昂……

胡子昂还获知，这次特务殴打的主席团成员及群众达 60 多人，郭沫若、马寅初等人也被打伤，造成举国瞩目的“陪都血案”。

胡子昂震怒了。

血案发生不久，胡子昂即应中国青民社成员、堂弟胡定一的邀请，到中央大学作公开演讲，以《和平民主建国》为题，旗帜鲜明地反对国民党企图挑起内战、继续实行独裁统治，并且在参议会上罢免了打手刘野樵的国大代表资格。

胡子昂支持社会民主活动，不仅是在道义上，而且还在经济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黄炎培、张澜组织中国民主同盟的时候，他们所需的活动经费给予了尽力的支持。民盟总部在抗战胜利后由重庆迁往上海，胡子昂约同和成银行总经理吴晋航，各送黄金两条，每条 10 两；

四川民盟的活动经费，长期给予帮助，有些成员在重庆生活紧迫，胡子昂经常提供赞助。邓初民编辑出版民盟刊物《唯民之友》，所发稿费，也都是按期从他经营的华康银行和川康兴业公司的帐外经费拨付。

民主建国会成立后，胡子昂虽然名义上没有参加，但却介绍他的华康银行襄理郡公复、华西公司机器厂经理萧笠僧参加了民建，通过他们与民建会保持联系，配合民建会的工作，民建的活动经费，胡子昂也负担了不小的部分。

胡子昂和中国青民社的关系更是源远流长，对他们一直给予了父亲般的关怀和帮助。

中国青民社是重庆联中的一些学生在 1937 年成立的，在中共南方局青年组的培养教育下，逐步发展为一个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的进步组织。后来它的大部分成员参加了民盟，一些成员参加了民建，同时始终保持着自己组织的独立性。

在胡子昂的兄弟子侄中，有不少人如胡定一（堂弟，新中国第一任驻旧金山领事馆总领事、英国大使），胡克林（长子，在解放战争中策动刘文辉、邓锡侯等彭县起义建过奇功）和侄子胡甫臣（后任工人出版社社长）、胡夏畦（曾经替胡子昂管过农场，现离休在万县，以诗书画自娱，生活充实）等，都是青民社骨干，有的还是中共党员，军统特务们对他们很是“在意”，称他们为“胡家班”。自从胡子昂不挽戴笠之后，有一个时期，军统所把持的《新华时报》几乎天天都在谩骂“胡家班”，但却碍于胡子昂的影响，迟迟未敢动手。

青民社正是通过他们取得胡子昂的支持，而胡子昂亦受到这批进步青年的影响。

青民社先后办了一些教育、文化和经济实体，以掩护他们的活动，团结联系各方面的人士。在文化教育事业方面，办了重庆适存高级商业职业学校、亚洲中学、民建中学，以及文群新闻社、有郭沫若参加创办的群益出版社、新中国剧社；在经济事业方面，开设了华尔行、华信号、天瑞公司、友恒商行、恰益银号等企业，这些实业，无一不是以胡子昂作强有力的经济后盾。

民盟机关报《民主报》是由胡克林任秘书长，冯克熙任经理，其经费十分困难，大部分的开支，都是由胡子昂的华康银行赞助。青民社的一些成员在大学毕业毕业后，也有很多经胡定一、胡克林介绍，进入胡子昂所经营的公司和机关工作，或介绍到其他企业部门工作。

每到寒暑假，这些青年学生们，总要来胡家聚会。少时 10 来人，多时达三四十人，短住 10 余天，长住就是一个来月，在一起阅读进步刊物，纵论天下大事，安排下一步青民社的活动。这时，胡子昂和夫人，总是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关怀着这些青年人，细心安排他们的饮食，关心他们的冷暖健康。同时约请一些进步的社会活动家、实业家，如《新蜀报》社长周钦岳、《新民报》主笔罗承烈、华西常董胡仲实来家里，和他们一起吃饭、聊天。

后来在解放战争时期，青民社的一些重要集会，以及和一些上层民主人士如张澜、史良、施复亮、陈铭枢、邓初民、朱蕴山等人的碰头，也大都是安排在胡子昂的家中。

直到 1948 年胡公馆受到军统特务监视，他们才转移到别处。

当然，胡子昂的社会民主活动不仅是这些。在一些重大的场合，他亦能不畏权贵，振臂疾呼，震聋发聩。

1946 年 7 月，雾季提前来到山城重庆。

不过，那不是大自然的季节雾，而是国民党政权的白色恐怖。但它恰如雾一样笼罩着这座美丽的山城，挥之不去，令人窒息。

就在这时，胡子昂听到了著名学者、民盟领导人李公朴、闻一多在云南被害的消息，他被深深地激怒了。

这一天，民盟、民建的领导人鲜特生、邓初民、史良等人来找胡子昂，商量办一个大规模的李、闻追悼会，以寄托哀思，也打击一下国民党的反动气焰。

胡子昂当即表示极力赞成。

“我还要代表重庆人民在会上讲话。”胡子昂说。沉思片刻，又道：“可以尽可能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争取国民党的人士参加。这样可以求得追悼会的顺利进行，以避免 2 月 10 日庆祝大会那样的悲剧发生。”

这一建议得到民盟、民建领导人的赞同。

胡子昂所说的国民党人士是张群。此时，张奉蒋介石之命去昆明调查李、闻事件，由南京到了重庆。胡子昂较了解张群，知道他虽对老蒋忠诚不二，但不满特务的做法，同中统、军统均有矛盾。

经胡子昂暗中说项，民盟鲜特生、邓民初又出面劝说，张群感到这正是给自己树立形象的好机会，于是同意由他领衔发起追悼会，并担任大会的主席。

市长张笃伦见有委员长身边的红人张群参加，于是也要参加。

追悼会定在7月28日举行，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7月27日晚，重庆三青团头子陈介生忽然来找胡子昂。

陈介生说：“听说胡议长要在明天的追悼会上讲话？”

胡子昂道：“是的。我有很多话要说，不吐不快。”

陈介生从胸兜里摸出一叠纸，说：“我们商量过了，这次追悼会关系重大，胡议长的讲话是代表全市人民的，要反映市民的要求，所以我们赶着准备了一个讲话稿，供胡议长参考。”

说着把讲话稿递过来。胡子昂接过来，匆匆溜了几行，发现满纸都是“先勘乱，后和平”，一派胡言乱语。于是心里冷笑，明白他也是受人指使，便道：

“谢谢你们的这一番好意。但我讲话历来不习惯用讲稿，更不习惯念别人为我代拟的讲稿。至于该讲什么，我想我这个议长心里还是有数的。”

陈介生被抢白得十分无趣，说了句“请胡议长三思”，便留下讲稿，灰溜溜地走了。

7月28日上午，李公朴、闻一多追悼会在重庆青年馆隆重举行。

这是一个沉重而庄严的大会，反映了千千万万人民的共愤，抗议国民党蒋介石的无耻暴行。

大会由张群任总主席，参加主席团的有吴玉章、张笃伦、孙元良、胡子昂、周炳琳、鲜特生、黄墨涵、史良、邓初民、许德珩。

悼念人群会场容纳不了，还有很多很多的祭吊者站在会场的外边。

先是公祭。与会的人们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在两位民主斗士的遗像前鞠躬、默哀。女宾们在遗像前献上一束束鲜花。

然后，张群首先致词，史良接着报告李公朴、闻一多的生平事迹。张笃伦、胡子昂、吴玉章、邓初民先后讲了话。

胡子昂走上讲台。他没有拿讲话稿，更没有拿陈介生为他准备的讲话稿。他凭着胸腔里奔涌的那份激愤之情，慨然道：

“我个人觉得，中国今天正需要集中人才来校正国家的错误。然而不幸，李、闻二先生竟惨遭杀害，这是中国不可补偿的损失！今天中国是否稳定？政治经济政策是否混乱？工业是否濒于破产？农村是否凋敝？……所有的答案都是令人痛心的。现在李、闻二先生为争取和平民主而不幸牺牲了，从这里我们看出今天中国缺乏一种安定的力量。”

胡子昂越说越激动，最后完全是挥舞着双臂，大声疾呼：

“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我们要呼吁：我们第一要和平，第二要和平，第三我们还是和平！”

顿时，会场响起一片“我们要和平！我们要和平！”的怒吼声。

胡子昂讲话后，是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讲话。

吴玉章走上讲台，抑制不住悲哀的眼泪，频频揩拭。

吴玉章说：“李、闻二先生是为国家的进步、和平、民主呼吁奔走而死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是独立、和平、民主。这种要求是决不会因为两先生被杀而停止的……”

邓初民最后讲话，他在讲话结束时说：“我特别赞成胡子昂议长的三呼和平。今天在这里，我也要大声呼吁：我们第一要和平，第二要和平，第三我们还是要和平！”

会场再一次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

胡子昂三呼和平很快成为这次追悼会最有价值的新闻。次日，不仅重庆各大报纸，就连上海、香港等地的报纸，也以非常醒目的位置，将这一情况报道出去，一时轰动海宇。

吴玉章亲自撰文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对胡子昂的三呼和平大加赞赏。

彼时，正是风雨下重庆。山雨欲来，风灌满楼。在此新旧政权行将交替之时，胡子昂这“三呼和平”，无疑是世纪之响。

会后，那个三青团的头目陈介生气急败坏地来到新民街铜鼓台的胡公馆，劈头便说：“你胡议长是名人，你要讲什么话，我们不能干涉。你‘三呼和平’，一呼百应，但叫我如何向上头交差？”

胡子昂凛然道：“我所讲的话都是事实，是重庆市人民的心里话。让他们来找我好了，我讲的话我自己负责。”

陈介生忿忿而去。

共产党的马前卒

1948年3月，胡子昂打点行装，准备出走香港。

此时，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已把大反攻的号角吹响。蒋政权在大陆已是汪洋中的一条船，眼看不保。

而这种垂死前的挣扎是最可怕的。重庆一片腥风血雨。去年的5月31日夜至6月1日，国民党特务在重庆疯狂大逮捕，抓走青年学生、新闻界、文化界人士数百人。

特务们同时光顾了华康银行，指名道姓要抓华康银行的民建会员鄢公复、赵友亮。赵友亮这时已调到华康银行上海分行工作，襄理鄢公复却未能幸免。

胡子昂盛怒之下，径去找张笃伦。此时张笃伦已经去湖北，当了省主席。张笃伦说，特务抓人的事，我也管不了，但抓走了你的人，我却没办法不管。

于是跟重庆警备司令孙元良交涉放人，不几天，警备司令部用小车把鄢公复送回华康银行。同时，胡子昂赴上海，让赵友亮请长假回家避难。

虽说这一次只是有惊无险，但对胡子昂来说，这是一个信号：

下一次就该他了。

不走后果将不堪设想。他可以救别人，到时谁能救得了他？

于是把银行事务跟鄢公复作了交待，嘱他小心行事。同时放出口风，说他不日将离渝去料理华康银行武汉分行和上海分行的业务，然后堂而皇之地一走了之。春3月，胡子昂由重庆经武汉，到达上海。

在上海，胡子昂常去看望张澜，倾听张表老对于时局的意见。此时，张澜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行动已不自由，在家埋头写《墨子匱义》，准备

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共产主义思想揉到一起，将来在胜利后用，以此实现他的“天下为公、大同之世”的人生理想。胡子昂深为他的精神所感动。

5月的一天，张澜告诉胡子昂：中共在“五一”劳动节提出了“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的口号，正号召各党派、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准备成立联合政府哩。

胡子昂听后，心情为之一振。

正当这时，胡子昂突然接到邓季惺、谭惕吾从南京来电，说立法院要开会，有要事相商，让他无论如何去南京一趟。

胡子昂此时对于立法院早已兴趣全无。他当初竞选立法委员，纯属“金蝉脱壳”之计，是为摆脱参议长惹下的一身麻烦。这次本不想去，但听两位女立委口气紧急，又都志同道合，想必有什么重大事情，觉得不能不去。于是买票起身赴宁。

到了南京，才知道她们是想趁立法院开会之际，申斥蒋介石派飞机轰炸济南。考虑到胡子昂的声望，希望他来放一炮。

胡子昂想，众望所归，那就放一炮。

次日，在立法委全体会议上，胡子昂又一次慷慨陈词：

“绝对不能在自己的国土上向自己的同胞丢炸弹！这种野蛮的军事行动，是令人不能容忍的！”

果然是一记重炮，当即赢得满堂热烈的掌声。

会后，胡子昂马不停蹄，当日由南京返回上海。

1949年1月底，胡子昂又回到重庆。

胡子昂这一次冒险回重庆，目的是想见张群。

他一直把张群当朋友看待，认为张群这个人很聪明，也极灵活，对于当前审时度势，或许会有所觉悟，不必再为老蒋卖命了。

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新年文告》，声称：“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切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听上去像个引退求和声明，事实上却是在觅求喘息的机会。引退之前，蒋任命行政院长张群出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想着抗战的好事再来，把西南当作大后方，图谋东山再起。

张群前脚到重庆，胡子昂后脚就跟来了。

张群见到胡子昂，很是高兴。一来久别重逢，二来他初返重庆，正在招兵买马，准备为老蒋保存实力，建立一个稳固的大后方。于是力邀胡子昂担任他的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秘书长。

张群说：“秘书长一职人选，我是权衡再三的，觉得只有你和伯常（张笃伦）堪当此任，伯常现在湖北当省主席，还是你来干吧。”

这倒是胡子昂临来之前没想到的，赶忙说：

“秘书长之职我是担当不起的，也做不来。不过，我倒想劝你对时局的变化，应该有所警醒，该到了悬崖勒马的时候了。”

张群默然。过了一会儿，才说：

“做人总是要讲义气的。我从军校出来后一直到今天，几十年跟随介公，按过去的说法，是君臣关系，用现在的话说，他是领导，我是被领导。我不能在今天这种时候背叛介公。”

胡子昂说：“据我了解，来重庆之前，你已将家眷送到香港，这说明你

对局势的演变还是看得很清楚的，也是留了后路的。何苦现在还这样勉力维持，去做注定要失败的事呢？”

张群做了个制止的手势，对胡子昂说：“不要再说了。我是决不能做对不起介公的事，但我同样也不做对不起四川人民的事情。”

胡子昂看劝说无益，只得作罢。

2月，胡子昂从重庆再返上海。这一次打定主意要去香港。

这时国民党政府各机关相率南窜广州，去港、穗的机票都很难买。胡子昂找中共地下党联系，托人买了两张直达香港的飞机票，准备和夫人一道去港。

恰好老朋友吴晋航、罗承烈也都在上海，想去香港，却苦于无法买到去港的机票。胡子昂便将两张机票给了他们，自己又用立法委员的名义买了两张去广州的机票，于3月初飞赴广州，随后转车去了香港。

1949年，南中国战燹纷乱。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百万雄师在一夜之间飞渡长江，直捣蒋家王朝的心窝。

而此时，香港却正是内地知名人士和国民政府高官眷属云集避难之地。有人形容说，昨天还在内地某城市的家里一起打麻将，今天就可能又在香港的大街上碰了面。因此港岛空前热闹。

胡子昂在香港深居简出，很少有人知道他在干什么。

事实上，胡子昂在香港并没有闲着，与他经常保持联系的是中共新华社驻港负责人乔冠华和《华商报》记者张峰。此时胡子昂已经完全脱离了国民党阵线，走进了人民民主阵营。

乔冠华定期给胡子昂送去多本新华社和有关部门印发的宣传册子，让他了解各方面最新情况。

1949年4月24日凌晨，南京总统府的红漆大门被解放军攻破。

总统府的门楼上，那面悬挂多年的青天白日旗，像一张被撕破的纸片，缓缓飘落；同时，一面红旗升了起来。

这面仿佛被血染红的旗帜在南京4月的晨风中猎猎飘扬，它庄严地宣告了一个旧时代的结束。

这一天，胡子昂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印刷的一本小册子上，读到西柏坡毛泽东新近的一首诗作：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蟠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胡子昂读罢，不禁豪情顿生。

这时乔冠华来访，两人谈了一会儿毛泽东的这首七律，均为毛泽东的博大雄浑的诗情才学所折服。

乔冠华说：“穷寇现在企图以四南为依托，负隅顽抗。中央一直在做西南之敌的策反工作，你与四川刘文辉私交很好，中央希望你能以个人的名义致电刘文辉，促刘早日起义，配合解放军进军大西南。”

胡子昂有了前次张群的教训，觉得倒戈易帜的大事，仅凭私交怕是很难奏效的。乔冠华笑道：“你以为刘文辉这么傻，会像张群那样对老蒋忠贞不二？刘文辉同我们早有联系，他的辖区还设有中共的秘密电台，后路早留好

了。”

胡子昂于是当场草拟了一封电文，交由乔冠华以秘电发走。后来，刘文辉回了电，乔冠华又拿来让胡子昂拟写复电。如此有几个来回。

6月，青民社成员赵一明受党委托，从重庆秘密赴港，专门找了胡子昂，讨论策动四川军人起义的具体办法。胡子昂说：

“可以去找成都市长李铁夫，我和他是24军的老朋友了，以后也多有交往，他曾当过刘文辉的副官长，与邓锡侯、潘文华私交深厚，同四川军政各界联系也很广。你们可以通过李铁夫直接向刘、邓、潘转达‘香港方面’的指示，要他们当机立断，选择时机，实行起义。”

胡子昂又给李铁夫写了一封亲笔信，让赵一明，或由他的大儿子胡克林拿着这封信去找李铁夫。

后来，胡子昂的这封信，对促成1949年12月数十万四川国民党军队彭县大倒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6月中旬的一天，乔冠华派《华商报》张峰来找胡子昂，郑重其事地向胡子昂提出，希望他能回重庆，去争取在重庆的国民党内二警总队司令彭斌掉转枪口。

彭斌的内二警总队是由国民党新编25师改编过来的，警兵充足，武器装备精良，是当时驻守重庆的国民党王牌正规军。而重庆的水陆交通要道，特别是飞机场，完全由内二警总队控制，如能策动彭斌阵地倒戈，对于解放全四川，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彭斌是胡子昂父亲的学生，跟胡家有曲里拐弯的亲戚关系，两家平时也有些往来。另一方面，胡子昂同彭斌的弟弟彭勋武是同学，交情很深，由他去做策反工作，当然是再合适不过这些事胡子昂不曾跟乔冠华等人说过，但不知他们怎么竟知道得如此清楚。胡子昂不禁对共产党统战工作的周全、细致，深感叹服。

但是，胡子昂又很担心。

因为彭斌本人同蒋介石关系密切，又和时任重庆市市长、兼国民党市党部主任和重庆卫戍总司令的老牌反共头子杨森称兄道弟，因此做这项工作，既危险，又很不容易，希望很小。

几经考虑，胡子昂对张峰说：“虽然这项工作难度大，有危险，但我要尽最大努力，把它做好。”

第二天，胡子昂头上扎一条白纱布，化装成病人，从香港乘飞机回到重庆。

回到重庆的家里后，胡子昂闭门不见人。次日上午，胡子昂派人请来彭勋武，诈称：现在局势很乱，他经营的企业都在重庆，为此他想见一见彭司令，万一有一天重庆不保，看有没有周全的办法。

彭勋武信以为真，于是便去约哥哥彭斌来胡子昂家商谈。

此后两天，胡子昂连续三次与彭斌密谈。

第一次，是礼节性的，彼此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

第二次，胡子昂在家中设便宴招待彭斌兄弟。席间，谈到如何去处，胡子昂说：“我一生经营的事业都在重庆，你的基础也在四川，现在共产党军队已经过江了，国民政府也迁到了广州，西南能否固守很难说，我们总得想一条安全的出路吧？”

这位彭司令眯着醉眼问道：“我想听听你有什么打算？”

趁着酒酣耳热，胡子昂佯装三思道：“我也拿不准，是不是可以同共方联系一下。但如果你不出手，我是没有力量的。所以想同你商量。”

彭斌却端起杯子，连说喝酒，醉话连篇，根本不搭这个话茬。

果然老奸巨滑。

胡子昂不愿就此罢手。第二天晚上，趁天黑人乱之际，乔装了一番，来到彭司令的住宅。

想不到一进门，彭司令劈头就问：“你是不是来给共产党作说客的？”

胡子昂镇静自如地回答道：“你说哪里话？我只不过是担心我将来的出路，来找你商量嘛。”

彭司令这才缓和了口气，说：“我们是至亲好友，我说得很直率，我看呀，你是中了共产党宣传的毒，想同共产党联系，对不对？”

胡子昂道：“我觉着同共产党联系是一条路子，但走不走要由我们权衡得失利害才能作出决定。如果你觉得可以，我倒可去试一试。但如果没有你这个当司令的力量，单是我哪能行？”

彭司令斜着眼问他：“听你的口气，是铁了心要干啰？”

胡子昂忙说：“如果我是铁了心想干，在香港我早就干过了，还大老远回来找你商量干什么？”

彭司令点头，道：

“我看你还没有和共产党那边挂上钩。我老实对你讲，这件事万万干不得的！我与共产党接触过几次，他们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我们这些人跟共产党打交道，一辈子都伸不了皮。我和共产党斗了 20 年，对共产党也没客气过，还杀过他们的人。今天我是绝对不会去找共产党的。共军现在虽然过了江，但我们还有力量。我奉劝你一句，你也死了这条心吧，不要同他们有什么牵扯。”

胡子昂见他把话都堵死了，心想凭自己是开不了这把锁了。于是，敷衍几句，便回去了。

后来在重庆解放前夕，彭斌率部逃到彭山一带，走投无路之际，终于被迫起义。不过，那样便无趣多了。

第二天，傍晚的时候，突然有一个陌生的人来找胡子昂。他什么话也没说，递给胡子昂一个纸团就走了。胡子昂打开一看，见上面赫然写道：

明天午后三点，军警方面要开一个紧急会议，通过一个黑名单，列了十几个人，不准离开重庆，其中第一个就是你。请你务必于明天上午之前，离开重庆，否则难以脱身！想必是共产党内线送的情报。

彭斌果然出卖了自己！

时间紧迫，容不得胡子昂多想，立即打电话给张笃伦，说有要事找他商量。然后驱车找到张，对他说：

“前日，张岳军先生（张群字岳军）说你坚辞白崇禧的剿总副司令不就，回来和他一起干，还要我回来当他的长官公署秘书长，我想大家都是自己人，干起来顺手，舒心，这不，我就回来了。今天又接徐堪的电话，要我去当他的财政部次长。这个徐可亨的脾气你是知道的，我不去广州讲清楚，不好交待。所以我决定明天飞广州，跟他讲清楚就回来。你设法给我弄一张飞机票吧。”

张笃伦现在是张群的西南行政长官公署政务委员会主任，他坚辞不就白崇禧的副总司令是事实，而张群再度邀请胡子昂回来当秘书长、国民政府财

政部部长徐堪又要他去当财政部次长，也是事实。只不过他还都没来得及回话。

张笃伦听胡子昂说他要回来就任，很高兴，满口答应说：

“飞机票好办。长官公署每天都有人飞广州，叫那个人迟走一天好了。”

张笃伦又问要不要先跟张群说一声，胡子昂道：“来不及了，一切等回来再商量吧。”

张笃伦信以为真，下午即派人把机票送给了胡子昂。

次日一早，胡子昂乘车去机场，一路提心吊胆，担心碰见熟人出麻烦。还好，他紧紧靠在车后座上，没人认出他。

刚到机场，就见一个警卫迎上来，对他说：“胡老师，你要上哪去？”

胡子昂吓了一跳，心都提到嗓子眼里，半晌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那人笑着说：“胡老师不认识我啦？我是重属联中的白敬福啊。我在机场负责值班警卫。”

事隔多年，胡子昂确实记不得有一个学生叫白敬福了。但又见他面无异色，也就放下心来，跟他叙了几句，又说有急事需要去广州一趟，很快就回来。

这个白敬福念着师情，热情地帮胡子昂提着行李，又见胡子昂机票上的名字与本人不符，说这是常有的事，有熟人，什么都好办，一路把他送上飞机。胡子昂暗想，这一吓倒也值。

上了飞机又怕重庆警方电告广州扣人。幸好，下午三时许已到广州，没见异常，顺利过关。

出了机场，胡子昂便直奔曾经下榻过的南粤饭店，开了房间，然后打电话给徐堪向他报到。

徐堪随即派其官员包国华、杨晓波来南粤饭店，两人说：“徐部长吩咐把你的办公桌都给你准备好了，就等着你去坐了。晚上徐部长亲自为你接风洗尘。”

胡子昂却装作诉苦道：

“张群要我在西南公署帮忙，可亭兄又要我来他手下效力，经过三思，我还是到广州来了。请二位转告可亭兄，请给张岳军去电解释一下。”

二人答应这就去办。

胡子昂说：“刚下飞机，需要洗个澡换换衣服，我晚7时准时赴宴，再和徐可老叙谈。”说着便去卫生间放水。

胡子昂哪是要洗澡。两人刚走，他拎上行李，出了饭店，直奔火车站，买票上了开往香港的火车。

天安门上听惊雷

回到香港后，胡子昂听夫人李月华说，香港到处都在传，胡子昂被扣在渝，不能出川了。胡子昂听了会心一笑，心道，也确实玄。

随后即去新华社香港分社，向乔冠华、张峰汇报了重庆之行的情况，并对没有完成任务表示遗憾。乔冠华安慰道：

“你能安全回港，已经是很大的胜利了。否则，中央会批评我们的。”

不几天，张峰给胡子昂送来了一份中共中央邀请他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电报。

胡子昂怀着极大的喜悦和高昂的政治热情接受了这一邀请，准备即日北上。

胡子昂在离港北上所作的最后一件事是借钱。

此时，上海业已解放，新成立的人民政府责令各银行、钱庄，用银元券兑换人民币，随即规定：各银行、钱庄限期增加资本，才准继续营业。

华康银行上海分行经理李时辅电告此事，请示办法，胡子昂当即回电：务须遵照人民政府规定办理。

但，胡子昂也是硬着头皮表这个态的。

因为此时，华康上海分行的资金已不足增加到规定的数额，但他在香港又没有现金兑去。这位一辈子和钱打交道的实业家无计可施，决定去找同在香港的两位老朋友金融家吴晋航和猪鬃大王古耕虞，各借了港币 10 万元，电汇上海作为华康银行的追加资本。

事隔多年之后，古耕虞、黄凉坐在一篇名为《献给老友子昂灵前的花环》的纪念文章中追忆道：

……1948 年，子老偕其夫人到了香港，见到了我（古耕虞），对我说，他要“投奔共产党了”。当时，我在香港有公司，有钱。我知道他是政治家，需要政治活动经费，送了他一笔资助。他在香港默默地住了两三个月，不久东北全境解放，他是坐香港驶往东北的第一条船（我的船）到大连的，实现了“投奔共产党”的愿望。

古耕虞老人所说的“送了一笔资助”一事，想必就是指那次借钱给华康银行上海分行增资。胡子昂不是那种靠捐赠从事社会活动的政治家，他首先还是一个实业家，然后兼从政事。

1949 年 6 月，胡子昂接到中共中央的邀请电后，经过几天的秘密准备，于月底偕夫人一同坐上了古耕虞的全港第一条开往北方解放区的轮船。

航行途中，出于安全的考虑，同行 10 多人又被安排转搭另一艘英国货船。

殊知大船亦不安全，船在南海海面上，突遇一艘兵舰徐徐向其靠近，船长大惊，急令所有乘客烧毁一切容易引起政治纷争的文书和信件。而此时胡子昂身上带有乔冠华给张澜的亲笔信以及《华商报》张峰托带给北京的东西，无论如何是不能烧掉的，慌乱中在厨舱里找到一个煤堆，于是把东西一古脑儿全部塞进煤堆里。

不大一会儿，兵舰靠近，却是英国兵舰奉命来保护它的货轮的，胡子昂这才放下心来，又从煤堆中把文件扒出来，拍拍灰把它放好。

船在海上昼夜不停航行数日，这一日到达青岛。一行刚下码头，即受到中共山东省负责同志的热烈欢迎。

那时中共中央正从西柏坡迁往北京。此后的两个多月里，胡子昂一直逗留在山东。他头顶着一方崭新的天，踏踩着胶东平原那坚实的地，心中激情难抑。他学会了那首在革命的大后方广为传唱的民歌：“解放区的天是蓝蓝的天”，并且感受犹深。

自此，胡子昂走上了一条全新的光明的道路。

1949 年 9 月中旬，胡子昂从青岛乘火车到达北京。

到京后两天，周恩来即接见了胡子昂。

在重庆最后一次相见以来，胡子昂已经有 4 年没再见到周恩来了。这 4 年，整个国家发生的是“天翻地覆”的变化，胡子昂本人的心灵也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变化过程。而周恩来的变化则是集中地反映在他的脸上，重庆谈判

时的周恩来是满脸浓密的连鬓胡子，现在已被刮得干干净净的，清瘦的脸上闪着青亮的光，人便显得格外精神。

两人交谈了一个多小时。周恩来首先代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欢迎胡子昂和他的家人从香港归来，询问了在港企业界人士的有关情况，最后说：“全国的解放已是为时不远。解放之后，我们要医治国民党留下来的烂摊子，恢复和发展经济，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虽然会有很多困难，但这是胜利中的困难。我们希望同各方面的朋友很好合作，共同努力，建设新中国。”

胡子昂听了备受鼓舞，动情他说：“我觉得，一个人最愉快的事，就是能力自己的祖国作一些有益的事。”

像4年前一样，周恩来紧紧地握了握他的手。

几天后，作为特邀委员，胡子昂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首次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是一次非常隆重、非常成功的大会。

后来，胡子昂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参加这次会议，是对我有生以来最深刻的一次教育，使我对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和光明前途，加深了理解，增添了无比的信心。”

这正反映了经历过那个伟大时代的许多民主人士的共同心迹。

10月1日，胡子昂应邀登上天安门广场观礼台，参加隆重的开国大典。从观礼台看天安门广场，这个广场是那样的广阔、博大、深邃，尽管此时已是人山人海，但在还没有纪念碑、纪念馆、人大大会堂、博物馆的广场上，仍还留有很开阔的余地。

不知为什么，胡子昂突然走神了。他忽然觉得广场上空无一人，仅有一个20多岁穿长衫的青年，背着沉重的行囊，自东而西，踽踽走来……那正是1919年春赴京求学的胡子昂。

整整30年了。

真是弹指之间，往事依稀如梦……

突然，天安门城楼上响起一个伟大的声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这是毛主席的声音。

胡子昂的心为之一振，个人的觉醒、国家的尊严、民族的自豪感，顿时填满胸间。

参加完开国大典之后，胡子昂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又一次发电给刘文辉，催促他尽快作好起义的准备，迎接解放军进入川康。

又过两天，张澜在家里宴请进军大西南的二野领导人刘伯承、邓小平、王维舟、陈锡联等，特邀胡子昂和周钦岳作陪。

说来也巧，挥戈进军大西南的两位主要领导人刘伯承，邓小平都是四川人，而这一桌的主客又大多是四川同乡，因此桌上吃的是四川菜，说的是四川话，谈的是四川事。刘、邓勉励他们这几位四川各方面的人士，要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和影响，协助解放军早日解放大西南，做好西南的工作。

说到这里，邓小平问胡子昂和周钦岳：“请问，你们两位是否愿意随我们大军一同入川？”

两人满口答应，表示愿为解放军入川做些工作。

这时中央正好组织东北参观团，办公厅通知胡子昂，问是否愿意参加。胡子昂因与邓小平表态在先，而解放后的东北状况如何，又是他很想知道的。

于是举棋不定，请领导决定。

中央决定还是让胡子昂先去东北参观。

1950年初，胡子昂随东北参观团从北京出发，先后到了沈阳、哈尔滨、大连等地，同行的有周士观、巩天民等10余人。

此时，从内心里说，胡子昂感到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是成熟的，军事上也非常成功，但是对能否尽快搞好经济建设，信心还不够。但是转了东北的几个城市之后，胡子昂的信心大增。

东北解放的时间不长，但所受战争的摧残却是十分严重。在不长的时间里，由于工人阶级工作热情高昂，开展了生产竞赛和新纪录运动，生产恢复很快，许多被破坏了的机器，预计一年恢复不了的，半年就恢复了，而且东北的工业具有相当规模，前景相当乐观。

胡子昂深受鼓舞，暗自庆幸自己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人民、为新中国的建设做些有意义的事情，这条路是走对了。

建设两个字，对于胡子昂来说，有着另一种实实在在的内容。

20多天后，胡子昂返口北京。此时获悉四川已经解放，便去张澜家，了解四川及重庆的情况。张澜告诉他，北京的新政协会议召开以后，蒋介石见与会名单中，许多昔日国民党人士的名字赫然见诸报端，大怒，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宣布开除了33人的党籍，有宋庆龄、张治中、邵力子、傅作义、邓宝珊、董其武等人，还有胡子昂。

胡子昂一笑置之。反正他早不把自己当作国民党的人了。

还有比这更糟的。国民党重庆市长杨森同时宣布没收了胡子昂的全部财产，查封了华康银行，抄了他的家，还下令通缉，家属四散逃生，80多岁的老父亲被逼躲进了一个山洞里。

张澜最后说：“我已电告重庆，让解放军照料你的家人。”

胡子昂悬着的一颗心落下地来。容。又过两天，周恩来让人捎话给胡子昂，希望他回重庆工作胡子昂欣然从命。1950年1月，胡子昂经由上海回到重庆。

第7章 走上大舞台

赤条条来去

1950年初春的一天，胡子昂从新民街驱车来到北碚，参加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大会。

西南军政委员会是管辖西南地区川东、川南、川西、川北、云南、贵州、西藏7省区的最高军政机关。这次会上，胡子昂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到达开会地点时，胡子昂又见到了西南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还有贺龙、王维舟、张霖之等负责人，他们都穿得那样简朴，军服制服，布衣布履，说起话来平易近人。

因为跟刘、邓在北京就认识了，所以在握手的时候，胡子昂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他们说：“我在重庆见过的达官贵人不少，但人民军队的领导人给人一种崭新的印象。”

这个话题让小平很感兴趣，于是笑问道：“哦，我们和国民党政府官员有何不同？”

胡子昂说：“我在重庆见过几次蒋介石，他那个委员长啊，不管走到哪里，卫兵都要高叫‘立正！’，一副杀气腾腾威风凛凛的样子，完全是一个君临臣下的独裁者。”

小平点点头，道：“国民党的军队是属于蒋介石的，而我们的军队是属于人民的，这是我们的根本区别所在。对人民群众，我们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党外人士我们应该是亲切、尊重和热情帮助的。”

胡子昂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吃饭的时候，胡子昂与邓小平、贺龙同席。边吃边聊中，邓小平说：

“胡先生，你最近被选为副市长，你身上的担子就加重了啊。重庆这个地方被蒋介石统治了几十年，后来又成为陪都，特务横行，袍哥遍地，烟赌满街，如何作好整理改革工作？你这个副市长不好当哟。”

邓小平又列举了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采取许多革命措施的具体事例，强调说：

“解放后首先要肃清一切反动势力，团结各方面的力量，实行共同纲领，实现新的历史任务。但我们不能用敌人对付我们的那套办法来对付他们，以暴政对暴政，是不好的。在延安时，保卫机关搞过逼供信，有的人被打了，放也不好，不放也不好。

毛主席是很反对这样做的，主席曾经说过，我们如果不是依靠人民，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就容易犯错误，杀错人。这一点，对于刚刚获得政权的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贺龙了解胡子昂在重庆长时间经营工商业，搞过议会，社会关系广泛，他朝桌上泼了一点米酒，伸出食指在酒里蘸了蘸，在桌上画一个像制钱一样外圆内方的图形，对胡子昂说：

“我们既要机动灵活做好各方面的团结工作，又要坚持原则，坚持真理，不可动摇。”

这些话给了胡子昂极大的启发。他永远忘不了那样真诚的教言。

胡子昂是在1950年1月重庆市人民政府成立时，被任命为副市长的。

当时的市长是陈锡联，还有一位副市长是曹获秋。

胡子昂上任的第一周，曹获秋副市长就对胡子昂说：“我俩办公室靠得很近，就一墙之隔，欢迎你随时到我的办公室来，我所有各方面的文电，除部分关于党内的文件以外，你要尽量翻阅了解。”并说盼胡子昂随时提出相同或不同的建议，随时交换意见，不要拘谨。相信胡子昂对地方情形的了解，对于政治措施，特别是稳定市场、建设计划、人民生活的供应需求等方面，经验较多，希望胡子昂放手共谋，多做推进工作。

共产党的干部如此以诚相待，让胡子昂备受感动。

使胡子昂最感惊讶的是，重庆解放不到三个月，面貌一新，鸦片烟禁绝了，娼妓没有了，最难得的是币制稳定，供应有序，全市人心大变了。

他不止一次对过去的工商界的朋友说，人民政府确实是有办法的。

这年夏天，重庆组织党政负责人暑期消夏休假团，到昆明休假，王维舟、张霖之、陈锡联、曹获秋、李唐彬、罗士高等党政负责人几乎都参加了，大家都带有眷属同行。

但党外人士参加的只有胡子昂和他的妻子李月华。休假一月，他和共产党的干部朝夕相处，畅所欲言，国事家事，都广泛交换意见，归结到一句话，就是共谋政事，搞好市政建设，维持治安，有利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包括统一战线工作 189 的发展。

这次休假是胡子昂在建国初期最愉快的感受。

那些工农出身的干部对待他不分彼此，情同骨肉，这是胡子昂在国民党旧官场从来没有受到过的礼遇。

知识分子于是最容易被感动的。

早在胡子昂从香港北上参加人民政协的途中，他就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把他所经营的企业和所持有的股票全部交给国家。

当党组织要安排他担任重庆市副市长时，他便向当时重庆的党政负责人张霖之、陈锡联、曹获秋、统战部长杨松青多次提出过这个要求。

陈锡联等人很为难。因为全国还没有这个先例，不知该不该这么做，便答复胡子昂道：“这个愿望很好，但要慎重考虑。”

胡子昂说：“我既然参加了人民政府的工作，又负责筹备工商联会，再继续经营私人企业，一是精力上顾不过来，二是不便于起带头作用。各处的投资如果不好处理的话，可以稍慢再作考虑，但请政府先行接收我私人经营的华康银行吧。”

陈锡联、曹获秋两位市长见胡子昂其意已决，便去请示邓小平，经大区领导研究后，邓小平答复陈锡联：“现在全国还没有这个先例，那我们就从胡子昂先生这里开个先例吧。”

于是重庆市政府通知胡子昂：华康银行可由人民银行来接收，全体员工转入人行工作。

胡子昂接此通知后十分兴奋，第二天便约了当时华康银行的两位业务负责人刘芝祥、李时辅等人来商量。但他们都不同意。刘芝祥格外激动，不客气地对自己的老板道：

“华康银行过去被国民党查封，现在好不容易人民政府发还了，你又当了负责人，又是将要成立的工商业联合会的负责人，正好可以利用这个便利来发展华康银行的业务，你倒好，却想白白把他拱手送掉，也不替各位同仁想一想。”

胡子昂倒不计较他们说话的口气，耐心解释道：

“国家并不是想吞一个小小的华康银行，政府是希望我们和工商界的朋友们对发展国家生产、繁荣经济起到很好的作用。大家想发展华康业务，真正赚到大钱的，还不是我胡某人，而胡子昂拿着人民政府的一份薪贴，吃穿不愁，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对于大家来说，把华康交给人民银行，所有的员工都变成了人民银行的员工，前途不是更加光明？”

想一想，大家也觉得这话在理，于是同意了胡子昂的决定。

1950年夏，中国人民银行接收了华康银行的全部产业，在全体职工大会上，胡子昂兴高采烈他说：

“从今天起，华康银行的职工就成为国家的工作人员了，这是我们大家的光荣，我个人愿意追随大家，努力为国家效力。”

1951年夏，重庆市召开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会后，张霖之、曹获秋要胡子昂兼任市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主任。胡子昂有感于党的信任，再度要求让他把全部资产交给国家，使他没有牵挂，好放手大胆地在人民政府工作。

市长曹获秋又为难了，对胡子昂说：“你在西南工商界影响这么大，这样做好不好，别吓着了别人啊？”

市委书记张霖之也说：“按照党的现行政策，对私营工商业是要保护的，在恢复国民经济中私营工商业还要发挥作用。你这样做不仅不符合党的政策，而且还容易在工商界引起不必要的担心。”

胡子昂却决然说：“我既然已经决心跟党走，决心在党的领导下做一个新中国的干部，我还留这些私产作何用？留下了还会给我执行政策、处理问题带来诸多的不便。如果你们怕我捐献影响工商界，那就保密好了。”

看来胡子昂是铁了心要让自己一无所有了。

市领导没办法，只好再去请示西南大区的领导。

一个多星期后，曹获秋约见胡子昂，说：“领导上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同意你的要求，由重庆市人民政府保管你的全部产业。”

胡子昂非常感激，随即清理了所有的投资和房地产，造编成册，核对无讹，亲手交给了市长曹获秋。全部投资由重庆市政府保管，重庆、成都两地房产，由当地房管部门接收。

胡子昂奉献产业是奉献得十分彻底的。在清理房产的时候，新民街的小院里有几间房子是他大儿子胡克林住的。当有关工作人员提出重庆住房比较困难，是否可以酌情处理的时候，他板着脸说：

“这是我的房子，我不能给儿子。克林没有房子应该向房管部门申请租用。”

胡子昂共向国家交出个人产业近20万元。

胡子昂长出了一口气，对家人说：“这下子好了，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了，从此我可以专心致志地在党领导下做一个国家工作人员了。”

后来在私营工商业改造时，胡子昂称他这种做法是：决心改造从“断后路”开始。

从此，叱咤工商界的实业家胡子昂消失了。

胡子昂成为新中国工商业界听党话、跟党走的带头人。

与资本主义告别

胡子昂是重庆分管工商业的副市长。

1950年4月，胡子昂受命筹组重庆市工商联。工商联成立的目的是要把旧的各类行业、同业公会改造成成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工商业联合会，并把他们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实现共同纲领规定的任务，发展生产，繁荣经济。

先成立筹备委员会，胡子昂担任主任委员，温少鹤、李志亲、张茂甫担任副主任委员。西南统战部部长程子健，重庆市统战部部长杨松青对于重庆工商联的活动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帮助。

历经一年左右，筹备工作就绪，1951年3月，重庆市工商联正式成立，川云贵7个城市的工商界领导人都来参加成立大会，表示祝贺。

胡子昂主持的重庆工商联是其历史上最为兴旺的时候，有会员数百人，号称是“八百壮士”。工商联的篮球队是重庆市最有实力的球队之一，曾得过重庆篮球联赛的冠军。胡子昂和贺龙都是体育迷，每次比赛总能看见胡子昂和蓄着唇髭，叼着烟斗的贺龙坐在一起，挥着手臂为双方的球队加油助威。

胡子昂抓工商联，首先是从思想教育入手，在工商业界中大力开展思想辅导活动，不到半年，就在44个行业中建立了76个学习小组，共有2053人参加。西南统战部部长程子健、市委书记张霖之、市长曹获秋、著名教授费孝通等，都曾在工商联作过学习报告。胡子昂自己也参加讲课，前后讲了20多节课，听众累计多达1.8万余人次。

重庆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商埠，到抗日战争时期，逐渐形成为西南地区的经济中心，工商业比较发达。

但它又是蒋介石政权崩溃的最后一个巢穴，在三大敌人的长期压榨和摧残下，到解放前夕，民族工商业早已凋零破败，气息奄奄。

解放以后，新中国政府贯彻执行《共同纲领》，实行“四面八方”政策，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扶植私营工商业，发挥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

当时，邓小平亲自主持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工作，一个重大决策是兴修成渝铁路。

那时胡子昂也是西南财经委员会委员。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胡子昂竭力赞成，并陈述胡子昂在解放前多次为之奔走呼吁的夙愿，以及过去华西公司承包成渝铁路工程的教训。成渝铁路筑路工程开工，实现了四川人民几十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大大带动了各项经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接着，抗美援朝运动兴起，更加推动了工商各业。

胡子昂在工商联为重庆工商业的发展，干了几件实事。

1950年，胡子昂在出席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就提出了“扶持和帮助私营工商业恢复和发展生产，实行统一订货、加工、收购”的议案，得到通过。随后在《关于重庆市公私企业间加工订货合同暂行办法》中规定，企业间的加工订货，须经总工会和工商联的签证同意，觅具适当保证后，再经工商局签准，才算有效。

仅在重庆解放的头两年，经由工商联签证的加工订货合同就达3500余件，各部门直接投放的业务更多。

同时，推动组成了全市金融业联合贷款银团，配合人民银行，贷款扶持私营企业。头两年，仅几次专案贷款的数额就达300多亿旧人民币以上，有力地推进了私营工商业从被战争摧残处于停顿、瘫痪状态中的复苏。

从某种意上来说，这带有计划经济雏形的味道。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此时，新中国刚成立，万机待理，百废待兴。

美国人在支持蒋介石彻底失败后，决定趁这个东方新生的共和国立足未稳，从朝鲜半岛方向包抄过来。朝鲜战火眼看已烧到中国东北边境，严重地威胁着年轻共和国的安全。

毛主席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

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浩浩荡荡，跨过鸭绿江，协同朝鲜同志，打击美国侵略者。

前方在打仗，后方的人民，则是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

那些资本家们属于有钱的。

在1951年下半年捐献飞机大炮的运动中，重庆工商界捐献出旧人民币390余亿，计每架飞机15亿，捐献飞机26架，表现了重庆工商界人士反帝爱国的热忱。

不仅支援飞机大炮，还支援人。

在刚刚觉醒的工商界中，不少昔日的资本家送自己子女参加志愿军赴朝作战，胡子昂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参军，两个女儿去了朝鲜战场，为抗美援朝的正义事业献出年青人的力量。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前后打了三年，中朝人民并肩作战，打败了资本主义世界最大工业强国的第一流军队，把敌人从鸭绿江边和图们江边打回到三八线附近，把他们限制在开始发动侵略的地方，不能前进一步。

美国人在朝鲜战场上丢尽了脸面，共伤亡100多万人，消耗战费达200亿美元以上，迫使美国人不得不于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签订停战协定，取得了抗美援朝斗争的决定性胜利。

正是在志愿军出国作战三周年的时候，胡子昂参加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贺龙是总团长，胡子昂所在的是西南总分团，王维舟是总分团团长，胡子昂和阎红彦几位都是副团长，到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

进入朝鲜的第一站，就有规模很大的欢迎队伍前来欢迎。

在欢迎的人群中，胡子昂忽然发现参军赴朝的二女儿胡静、三女儿胡萱，手捧鲜花站在欢迎的队伍中。

也许这是领导的刻意安排，但事前，胡子昂却一无所知。此时此刻，在异国的土地上，久别重逢，骨肉相聚，该有多少的话儿要说。泪水在胡静、胡萱的大眼睛里打着转儿。

慰问团的全体成员都为他们父女相遇感到高兴，贺龙向战地记者打了个手势，记者立即摄下了这一感人的场面。所有在场的人，不论是援朝的志愿军，还是赴朝慰问的人，都是一片欢呼声。

那是欢庆抗美援朝胜利的呼声。

后来，组织上还安排两个女儿随胡子昂到旅邸，同住了大约一个星期，两个女军人喋喋不休地向父亲详述了她们从军后的惊险历程。

在朝鲜，胡子昂所在的慰问团分别参加各地报告会，接触朝鲜军民，会见志愿军许多领导同志和战斗英雄，带去了党中央、毛主席和祖国人民对他们的慰问，给他们介绍祖国建设的成就，鼓励志愿军同志们继续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帮助朝鲜人民治好战争创伤，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朝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

慰问归来，在重庆，胡子昂把从朝鲜看到的种种情形，看到的中朝军民

团结战斗的友谊，特别是志愿军英雄儿女光辉的战斗业绩，给工商界一一作了介绍，以共同提高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

1952年，新中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揭露私营工商业的“五毒”行为，打击它的破坏性。

运动一开始，胡子昂在重庆《大公报》撰文拥护，希望工商界彻底消除资产阶级腐朽的污毒，响应和实现毛主席增产节约的伟大号召。

此文一发表，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人民日报》在醒目位置加以节录转载。

运动开始后，大家对搞揭发批判、供认和检讨都不熟悉，不少人不习惯和反感，有的工商界人士甚至自杀身亡。胡子昂震惊了。

但他并不认为这是运动本身的错，为此，他常常日以继夜，千思万虑，想方设法到处作报告，举例子，作解释，使认罪者减轻思想包袱，心情舒畅，重新改造自己，从而帮助和挽救了不少的老朋友、社会名流和工商界同行。

当年的合作伙伴、老朋友宁左村来他家，绝望地对他说：“子昂，我深感自己长期剥削人民，罪孽深重，怕是过不了这一关了，不如自己了断吧……”

胡子昂一把拉住他的手，动情地对他说：“不，你的罪孽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你要相信共产党实事求是，你要好好的活着，听党话，跟党走，错不了。”

他的话，使宁芷村又产生了生活的勇气。

运动过后，鉴于工商界生产经营上存在着困难，胡子昂向党和政府作了反映，把曹荻秋市长请到工商联临时代表会议上，按照政策，逐个加以解决，推动工商界爱国守法，积极经营。

1953年，遵照民建总会的安排，成立民建西南区办事处，作为民建中常会的派出机构，领导西南地区的会务工作。

当时国内有华北、东北、西北、西南、中南、华东6个大区，民建在大区设派出机构的只有西南一处。办事处成立后，胡子昂为主任，王磊和其他几个同志作副主任。

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和川云贵3省党委的领导和支持下，西南地区的民建会务发展迅速，除重庆、成都以外，先后建立了昆明、贵阳、泸州、南充、自贡、乐山等十几个地方组织，发展了几百会员，培养了一批工商界中的骨干分子。

1953年，党提出“一化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

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两三年间，重庆以至全国的私营企业，或实行公私合营，或接受加工订货，或承做经销代销，逐步逐步地纳入了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

到1955年底，重庆市私营企业纳入公司合营的有纺织、钢铁、机械、煤炭等15个行业的691户，年产总值为26783万元；私营中纳入经销、代销形式的已达4000余户，占总营业额的73.5%。

此时，胡子昂坚定不移的认为，走社会主义道路已是势所必至，理所当然。

1955年10月，全国工商联召开执行委员会会议。

开会期间，毛泽东主席约集全联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谈话，紧接着又对全体执行委员作了重要讲话，教导工商业者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

的命运，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那时，胡子昂已是全国工商联和民建会副主任委员，接连两次听到毛主席的指示，亲切深刻，兴奋之情，难以言喻。

的确，放弃剥削，不怕共产，前路那样光明；一张选票，一个饭碗，安排如此周到，这使以胡子昂为代表的工商业者感激之不暇，还有什么吊桶放不下？

胡子昂应约在天津《大公报》、上海《新闻报》分别撰写短文，发表了自己的体会和感想，表示坚决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

胡子昂就是工商业界听、跟、走的带头人。

会后，胡子昂赶回重庆，约集了重庆工商界 300 多名代表人士，进行了 15 天的大会小会，以宏亮的嗓音，把毛主席的指示，原原本本，一字不漏地进行了传达。要求大家务必联系实际，敢于亮相，不怕丑，不怕痛，“脱了裤子割尾巴”，使自己从猴子变成人。

胡子昂的传达，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全市 42 个行业的代表人士兴高采烈，当场提出申请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要求，使重庆工商业界一次性实现了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改造，统统跨进了社会主义的门槛。

重庆市是走在全国的前头的。

工商界的申请，迅即得到市政府的批准。

1956 年 1 月 17 日，胡子昂率领全市工商业者和家属，加上职工，共 8 万人之众，分区举行庆祝大会。

工商业者们庆幸自己获得新生，欢呼：同资本主义撒手告别，奔向社会主义光明大道。

一时，重庆市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歌声嘹亮，盛况空前。他们高举红旗，高擎喜字金牌，载歌载舞，浩浩荡荡上街游行，以最快的步伐一步跨进了社会主义的门槛。

接着，胡子昂又到北京开会。

在休息室里，胡子昂向毛主席专门汇报了重庆工商界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盛况和喜悦的心情。毛主席当即高兴他说：这件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伟大胜利。

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以后，胡子昂由重庆调到了北京，参加民建中常会、全国工商联的领导工作。

1957 年 5 月，胡子昂代表民建中央，向共青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致贺词。

在贺词中，胡子昂号召工商界的青年子女，努力清除资产阶级的影响，划清思想界线，背叛出身的家庭，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胡子昂这番话，引起了青年们的注视，特别难得的是，得到了毛主席的鼓掌欢迎。

这次大会是胡耀邦主持，在会刊上作了专题的表扬和鼓励。

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为工商业者通过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实践和学习，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创造了条件。

1959 年底，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同时召开全国代表大会，1000 多名代表，开了 70 多天，和风细雨谈改造。

这次会议，便是著名的“神仙会”。

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向工商界提出了“顾一头、一边倒”的要求；李

维汉作了《坚决靠拢共产党，努力自我改造，一心一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讲话，全面地分析了工商界改造的情况，系统地阐述了改造的任务、途径和方法，为工商界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

这次会议的精神传达下去，各地都开了这样的“神仙会”，工商界心情舒畅，思想愉快，进一步调动了积极服务、自我改造的积极性。

以后，工商界循着这条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道路走下去，经过了迂回曲折，特别是经受了十年内乱的严峻考验和锻炼，绝大多数工商业者终于改造成社会主义社会中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真是“阶级消灭，个人愉快”。

胡子昂兴奋、鼓舞、感激的心情，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

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民族资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经过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来达到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作为阶级的资本家阶级，这是一个奇迹和创举，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

回顾胡子昂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经历的道路，感到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起了重大的作用，它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一起来搞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从而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得比较顺利，比较迅速。

换句比较好懂的话，就是共产党对胡子昂这位昨日的资本家给予了极大的信任和鼓舞，使他得以在工商业改造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在重庆工作的那几年间，无论在工作上、生活上，或是在其他方面，市统战部长杨松青对胡子昂的关怀和帮助，都是具体而微的。

解放后，如何团结工商界朋友，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作。胡子昂虽然比较熟悉重庆工商界情况，但对于如何协助党和政府做好工商界工作，没有实际经验，主要依靠党的教育和帮助。

在那几年中，工作上遇有重大难题，胡子昂总是找市长曹荻秋、统战部长杨松青请教，他们同胡子昂不分彼此，肝胆相照，不仅使胡子昂得以顺利开展，而且心情十分舒畅。

1952年，开展“三反五反”运动，胡子昂和杨松青在白象街工商联宿舍内专辟一大间办公室，常在此联合办公，仔细研究，慎重决定一切重大问题。

还应当提一下李维汉。

李维汉长期主持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工作。他在毛主席、周总理领导下全心全意作好统战工作，为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付出了大量心血，作出了重大贡献。李维汉广泛结交工商界朋友，关心帮助工商界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为社会主义服务道路上不断前进，使大家从内心感激他、敬佩他。

胡子昂自解放以来，特别是从重庆调到北京工作以后，同李维汉时常接触，得到他许多帮助。

李维汉多次对胡子昂说，要团结工商界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仅要帮助工商界改造思想，提高觉悟，还要敢于代表工商界的合法利益。教育帮助和代表合法利益这两条，丢掉哪一条也不行。

他对胡子昂说，要勇于反映工商界的意见和要求，敢于代表工商界的合法利益，才能够更好地团结工商界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

1959年，民建、工商联全国代表大会开会前夕，李维汉同胡子昂等两会几位负责人交换意见，他提到工商界的改造，要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条腿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实践，一条腿是政治思想教育。

他一面在房间里一步一步地来回走，一面生动形象地讲述服务与教育两条腿的辩证关系。

所有这一切，都深深地印在胡子昂的脑海里，永难忘怀。

赫鲁晓夫和中国式资本家握手

莫斯科的冬天是寒冷的。

1956年的冬天自然也不例外。

但是，在这个冬天，彭真、胡子昂等所率领的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的代表们，却感受到了苏联老大哥火一样的热肠和情怀。

这个代表团是在1956年的11月离开北京，踏上苏联那广袤无边的大草原的。

红色实业家胡子昂参加了这个全国人大代表团，出访苏联、捷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6个国家。

这是中国第一次派出的全国人大代表团，团长是彭真，副团长有李济深、章伯钧等，胡子昂也是副团长之一。

工商界代表能够参加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代表团出国访问，而且还委胡子昂以副团长的重任，这使胡子昂感到莫大的光荣。

胡子昂觉得，这是工商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接受了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定地全国人民站在一起，人民才给他们以这样大的荣誉。

工商界参加代表团的共有胡子昂、乐松生等5人。在访问中，他们随同代表团的同志们与各国的议会、党和政府的领导人进行了亲切的交谈，会见了许多劳动群众，参观了不少工厂、商店、农庄、学校，游览了各地的名胜古迹。他们每到一个地方，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隆重的接待。

这个时候，是中、苏“同志加兄弟”式的友好达到顶峰的时期。此后不久，赫鲁晓夫和毛泽东翻了脸，苏联被中国人叫了几十年的“苏修反动派”，那个时代出生的许多人被取名为反修。

苏联人一直以老大自居。即便是中苏关系最好的时候，苏联人也不大把社会主义中国放在眼里，认为中国是一一切都摹仿他们的“小老弟”。

同样把苏联当作样板的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都是看“老大哥”的眼色行事。

苏联人可以不看重中国的其他革命实践，但他们却不能不重视中国成功的改造了民族资本家这一事实。

这是苏联等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没能做到的。

所以，这次访问，胡子昂等人感受最深的是：各兄弟国家对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以独特的形式来发展中国革命，团结和教育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一起参加新社会的建设，都给予了很大的注意和赞扬。

在苏联，代表团访问过许多工厂、农庄。有些工厂和农庄的工人还为代表团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工商界的代表，好几次应邀在这些欢迎会上讲了话。

作为一个资本家的代表，能够向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讲话，在他们苏联工人，在胡子昂等中国资本家，都是破天荒第一次。然而当他们了解到接受改造的中国资本家的具体情况后，便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朋友，对胡子昂等表示热情的欢迎。

在著名的工会圆柱大厅，莫斯科市苏维埃为代表团举行了盛大欢迎会。

到会的苏联朋友很多。胡子昂代表改造后的中国资本家，详细说明了中国资本家为什么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道理，受到苏联老大哥们的热烈欢迎。

在乡村的集体农庄里，在雪地里燃起的篝火旁，中国资本家欣赏着农庄工人跳着圈舞，高唱《喀秋莎》、《三套车》和《红莓花儿开》，感受到了新型的生活所注入在农民身上的巨大活力。这种活力深深地感染了这些在过去的年代里过着奢侈生活的资本家们。

他们想，这种活力，也就是社会主义的活力。

最使他们感到兴奋的，是在结束这次访问的前夕，代表团全体同志在克里姆林宫同苏联领导人的会见。

这次会见的规格很高，参加会见的苏联领导人有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赫鲁晓夫等，这些苏联革命的领袖们，无疑都是中国革命家和资本家们仰慕已久的。

会见时，发生了一件让胡子昂深感意外的事。

会见被安排在上午 9 时 30 分。直到 8 点半左右，苏方才送来有关这次会见的领导人、会谈内容以及座位安排。

胡子昂看后大吃一惊。

胡子昂被安排坐在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之间，这个位子仅是仅次于彭真的显著位置。更让他意外的是，他被指定要求作重点发言。

而重点发言原定是由彭真来作的。胡子昂感到事出仓促，又是在这样高规格会谈的场合，是不能随便讲话的。胡子昂深感不安，不知如何是好。

彭真笑道：“苏联人对你们被共产党改造好的资本家有兴趣，你就讲讲吧。事先没研究不要紧，只要实事求是，讲真心话，总不会有错的。”

胡子昂只好接受了这一安排。会见时，胡子昂作了即席讲话。他说：

“……中国共产党对我们，采取的是包下来的办法，不仅使每个资本家都有自己的工作岗位，可以安心工作，发挥自己的能力和专长，而且使我们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获得了空前未有的地位。现在有许多人担任了国家机关的重要职务，更有许多人被选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委员，或者被派为企业单位的厂长、经理等……”

“对于我们的思想改造，中国共产党以说服教育的方法，一贯地，耐心地对我们进行帮助。这些都使我们清楚地看到：遵照共产党指引的方向，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所以，在今年的年初，我们的私营工商业，全部要求加入公私合营，一次性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敲锣打鼓，欢天喜地的迎接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

会谈进行了将近三个小时。

会见结束时，苏联领导人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民族工商业进行改造所取得的伟大胜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胡子昂又向苏联领导人表示，我们回去后一定要转告全中国工商界同志们，要更加坚定信心，全心全意走社会主义道路。

会见结束后，苏联领导人设宴招待了中国代表团。

苏联领导人纷纷和胡子昂碰杯，对他今天的精彩发言表示感谢，伏罗希洛夫称胡子昂是“经过了改变的资本家”。

赫鲁晓夫接连喝了几杯伏特加后，说话舌头都有点直了，他抓住胡子昂的手不放，称胡子昂是“中国式的资本家”，还喋喋不休地说：“我很愿意、并且一定要和你这位中国式的资本家握一握手。”

随后去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胡子昂们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在这些国家访问中，许多朋友都向他们询问中国资本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情形，并表示了极大的关心和兴趣。

他们访问了阿尔巴尼亚斯库台一家水泥厂，这个厂的负责人告诉胡子昂，这个厂在 1936 年时，因为意大利等外国资本家怕阿尔巴尼亚的水泥在中东、远东市场同他们竞争，便暗中勾结厂里的外国工程师，借口原料缺乏而怠工，结果被迫停工。

可是，阿尔巴尼亚的资本家虽然遭受外国资本的排挤，却不愿摆脱帝国主义，想在外国资本控制下苟且偷生。这在人民民主国家当然不会实现，结果被阿尔巴尼亚人民所唾弃。这位负责人说，中国资本家选择了不同道路，理所当然地赢得了今天的地位。

南斯拉夫人民对中国工商界接受改造的情况也通过这次访问，加深了了解。

1957 年 1 月 29 日，南斯拉夫总统铁托接见了中国代表团，彭真团长向南斯拉夫领导人介绍胡子昂等几位工商界代表时，说：“这几位是资本家的代表，他们是接受了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资本家的代表，他们不仅在言语上，而且在行动上有所表现。”

铁托认为在欧洲是找不出这样的资本家的。他说，这是中国很大的成就，把国内所有的力量都团结起来了，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

作为中国工商界的代表，在这些兄弟国家受到这样的欢迎和重视，胡子昂的心情是异常激动的。一方面感到无比光荣，一方面也在清醒自己的头脑。他对自己说：

“这个光荣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给我们的，是全国人民给我们的，也是全国工商界跟着共产党走，愿意接受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胜利成功。”

在苏联访问时，胡子昂得知，毛主席在全国工商联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开幕前夕，再一次指示工商界，进一步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他禁不住激动万分。

胡子昂约集乐松生等五个同志从莫斯科打电报给大会，表达了他们对党对毛主席的衷心感激，祝贺大会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胜利完成任务。

这次访问，历时逾二月，行程过万里。

通过这次访问，胡子昂了解了一些各国社会主义在若干不同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特点，增长了许多知识，对照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更感到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商业政策的英明、伟大。

回国后，胡子昂在《大公报》、《工商界》月刊上，撰文谈了访问的收获和体会，要求工商界同志们共同努力，戒骄戒躁，不可有一刻的懈怠，学习再学习，改造再改造，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1965 年 3 月，胡子昂又再一次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出访非

洲。

出发以前，胡子昂一行先到上海。

当时周恩来总理正在上海视察工作，他特地接见了代表团的全体成员，对他们说：非洲许多国家刚刚赢得独立，正在建设他们自己的国家，尚未摆脱贫困和落后的状况。前去访问，要以中国人民同非洲人民的战斗友谊为重。谆谆叮嘱，不要有大国沙文主义。

周总理对胡子昂非常关心，对刘宁一团长说：“胡子昂快 70 岁的人了，才从医院出来不久你们就约他到非洲去，我赞成，但对他要好好照顾。”

他这样一叮咛，胡子昂沿途处处受优待，内心既不安又感激。

代表团于 3 月 9 日启程出国，先后访问了几内亚、马里、中非共和国、刚果（布）、加纳 5 国，行程 3.6 万多公里，历时 35 天。

在访问期间，代表团拜会了 5 国的总统，同这些国家的议长、议员、政府部长、工会、妇女和青年组织的领导人以及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友好的交谈，同各国的议员们就议会工作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并且同各阶层人民群众见了面，还参观了不少工业、农业和文化教育设施。

5 国议会为了接待他们，都成立了有议会领导人和议员参加的接待组织。他们为中国代表团的访问作了很好的安排，并且一直陪着他们。

不论在哪个国家，不论在城市或农村，代表团到处受到热情的欢迎和亲切的接待。兄弟的非洲人民，身着鲜艳的民族服装，成群结队，鼓乐喧天，高举欢迎的标语牌，挥动花束，载歌载舞，欢迎中国来客。

这种浓情厚意，充分体现了非洲人民同中国人民的深厚的战斗友谊。

在访问中，非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坚强意志和斗争精神，给了胡子昂十分深刻的印象。

非洲人民是威武不屈的人民，处在非洲反帝斗争前线的刚果（布）人民，坚持八月革命的精神，不畏强暴，斗志昂扬，一再粉碎了美帝国主义策划的颠覆和破坏活动。刚果（布）的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入了这场斗争，不少男女青年还参加了警惕队，在全国的企业、学校、机关都成立了警惕委员会。在几内亚、马里等国，也组织有群众性的警惕队。这些警惕队，在反帝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几个世纪来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鱼肉宰割的非洲人民，充满着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同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进行着英勇的搏斗。今天的非洲，已成为觉醒的非洲，先进的非洲。

在非洲，所到之处，到处呈现出一派新生气象。新兴国家的人民正在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清除殖民主义势力，努力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要以经济上的独立来巩固政治上的独立。

马里政府把殖民主义企业“尼日尔公司”断然收归国有，棉花产量大幅度增长，而且第一次成功地在马里的土地上种植了小麦、甘蔗，建立了茶园，粮食已能自给而有余。

几内亚建立了火柴卷烟联合工厂，自给而外，还要出口，一改独立前依赖外国进口的旧观。胡子昂相信，一个繁荣富强的新非洲定会在世界上出现。

他们还有机会观看了几内亚艺术家们表演的话剧《乌斯曼》。这个剧通过“乌斯曼”这个典型人物，批判了某些知识分子盲目崇拜西方的错误思想，发扬了几内亚人民热爱祖国、热爱劳动、奋发图强的精神，为人民群众所喜爱。他们运用各种文艺形式对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禁止演唱西方的黄色歌曲，这同中国今天的努力也正是相同的。

最使人难忘的是非洲人民对毛泽东主席，对新中国的热爱。

代表团无论走到哪里，哪里都会听到人群中迸发出来的“毛泽东”、“毛泽东——中国”的欢呼声。

许多非洲朋友都说，毛泽东主席的著作在非洲已成为群众最喜爱的一种读物。特别是毛主席支持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声明和谈话，得到了非洲人民的热烈拥护和积极响应。

因为都是第三世界国家，都有相似的经历和共同的命运。

5 国领导人和非洲人民对新中国和中国人民，怀有十分真挚的友谊和信任。

几内亚塞古·杜尔总统对代表团说：“中国人民是非洲各国人民和几内亚人民的可靠朋友。”

中非共和国戴维·达科总统说：“在中非共和国的朋友之中，我们首先推举中华人民共和国。”

刚果（布）马桑巴·代巴总统说：“帝国主义在搞反华，但是刚果（布）人民决不会改变他们对中国的友谊。相反，这种友谊将继续加强和巩固。”

加纳克瓦米·恩克鲁玛总统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和中国的解放是对帝国主义的最大打击。”

胡子昂亲自听到这些充满热情和友好的谈话，深信非洲人民是把中国人民当作他们最可靠的战友。

绝唱

1956 年之后，胡子昂调北京工作，分别襄助民建中央主委黄炎培和全国工商联主委陈叔通，担任两会的副主任委员。

从 1958 年起，民建会和工商联成立协作委员会，胡子昂担任主任委员。

协作期间，许多有关工商界的重要问题和重要工作，都是由胡子昂、胡厥文、孙起孟、孙晓村、胡子婴等共同协商完成。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工商界的事儿就少多了。民建会、工商联的主要任务就是推动工商业者加强自我改造，提高思想觉悟，缩短与广大劳动人民的距离，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

胡子昂在此期间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特别是就公私合营后的公私共事关系、工商业者的安排使用、定息、工资和生活待遇等方面的问题，向党和政府反映，提建议。

十年动乱期间，胡子昂受到了冲击。

周总理一直在关心和保护着他。每年的五一、国庆节，胡子昂仍被邀请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对于工商界人士来说，这是很大的安慰。

他的老朋友们对他说：子老（他的工商界朋友或后辈都这样叫他），只要能在电视上看见你在天安门城楼或参加国宴，我们就会想到，中国共产党仍然很重视与民族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

林彪叛逃事变发生后，周恩来为此邀集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举行了一次重要的座谈会。会后，周恩来问胡子昂对严峻的形势有什么看法，并殷殷问及他的遭际。胡子昂如实地回答了他对形势的看法：

“一个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受到严重破坏，当前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恢复统一战线的活力和凝聚力，使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和工商界能在党的领导

下，群策群力，分工合作，把国家建设搞好。至于我个人嘛——”

胡子昂停了一下，接着道：“我是能自制的，我对共产党的领导的信念是不会动摇的。”

周恩来又一次握紧他的手，深情地说：

“你是党的诤友。”

文革结束后，两会着手恢复工作。当时的统战部长乌兰夫召集民建会、全国工商联座谈，胡子昂又代表两会说了句话：“十年动乱期间，两会始终没有动摇对党的信任。”

乌兰夫赞许道：“这是最为难能可贵的。一些共产党员都没能经受得住这一严峻的考验。我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两会要努力恢复工作，把过去的损失给夺回来。”

党的信任又使胡子昂焕发出巨大的工作热情，他的爱国、报国之情愈发炽热。

当时，广大工商业者深切盼望党对原工商业者落实政策。胡子昂深知落实政策对于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意义，也能理解工商业者的心情。

1978年，胡子昂和几位工商联的领导亲赴上海、江苏等地调查，倾听工商界的呼声，了解落实政策中的各种问题。仅在上海一地就开了近30次座谈会，接触工商界人士300多人。

此时正值盛夏酷暑，子老又年事已高，望着他疲惫的脚步，汗湿的衣衫，大家备受感动。

1979年1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南海会见了胡子昂、胡厥文、荣毅仁、周叔弢、古耕虞等5位工商界代表人士，阐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计，就如何在经济建设中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征询了他们的意见。

邓小平同志说：“落实政策以后，工商界的钱要用起来，工商界的人也要用起来。要把门路搞得宽一点，把有本事的人找出来，用起来。”

这次会见，给了胡子昂等中国工商界的宿将们以极大的鼓舞，同时也向他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即：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后，工商界人士应该如何发挥作用，怎样贡献自己的力量？

胡子昂以极大的热情和魄力，带领工商联的同志，努力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路子。

小平同志与5人谈话后不久，经国务院批准，先后成立了三大公司，即由荣毅仁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信公司）、由王光英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光大实业公司（光大）和由胡子昂任董事长的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

这三大公司的主要负责人都与工商界有密切关系，被工商界亲切地戏称为“三兄弟”。

可惜这“三兄弟”有一个夭折了。

就是胡子昂任董事长的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

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是赚了钱的。公司的总经理聘请的是美国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主要是从事国际贸易，业务重点，一是向外国的大企业诸如美国的通用电器公司、碳华氟公司等15家大公司、大银行提供咨询服务；二是代理，例如代理我国纺织工业部进口外国毛条，加工成毛纺织品出口，代理山西煤矿扩大外销等业务。

在这家公司业务正呈上升趋势的时候，根据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指示，公

司停办了。

胡子昂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伤心。他一生所经营的企业，差不多都是成功的，很少失败，想不到这最后一任董事长却没能当到底。

但他还是对公司其他的负责人说：“我们一定要清清白白地办起来，清清白白地交出去。”

后来据说有关部门对此还后悔过，说查得过分的严了。但却谁也无回天，无法让它死而复生了。

可惜了这么大的一个公司。

1979年10月，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四届委员会代表大会同时召开，胡子昂受两会执委的委托，作了题为《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共同工作报告。

这个中心思想为跟党走的报告发表后，反响强烈，成为工商联的行动纲领，一直沿用至今。

这时工商联的老会员们，大都是老人了，报国之日虽短，报国之心倍切。子老殚精竭虑，多方奔走，努力把国家的需要和工商联的特点结合起来，发挥工商联这个人民团体的作用。

在胡子昂的主持下，工商联在经济咨询服务、工商专业培训、协助发展集体经济、帮助安置待业青年就业、兴办企业、支援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建设、参与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发展同海外工商界人士和工商社团的联系和合作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工商联再度辉煌。

1979年，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期间，他就联合82位工商界的全国政协委员，提出了“关于广开就业门路，安置待业青年”的提案。

在工商界，流传着“二胡一响，必有戏唱”的佳话。

胡子昂多次与民建中央主席胡厥文联名写信给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同志，报送有关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建议，如《关于设备维修和管理的建议》、《关于扶持和振兴中药事业的建议》、《关于恢复传统食品，走出一条具有我国特色的食品工业的新路的建议》，受到党中央的赞扬，许多内容都被有关部门采纳，如开展1500万知识青年就业前培训、创办天津商业一条街等。

1981年，在中共中央统战工作会上，胡子昂与胡厥文联名，就加强统战理论、政策的再教育和听取各方面代表人士的意见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1986年夏，针对一国两制构想提出后统一战线出现的新格局、新情况，胡子昂与胡厥文联名发表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意见》。

胡子昂在港澳和海外工商界中也有很高的威望和影响。他先后三次率团访问香港和澳门，加强了大陆工商界与港澳工商界的合作与联系，宣传了一国两制的理论。

还有一件事，足以让广大下乡知识青年记住胡子老。

知识青年返城就业后，在开始的时候下乡的那几年并不算工龄，知识青年们的意见很大。

1985年初的一天，胡子昂收到一封老友陈叔敬从重庆寄来的专函和部分知识青年联名所写的申诉书一份，要求国家能将下乡插队的时间算作工龄，胡子昂很快便将申诉书交给了全国政协办公厅，让他们商请有关部门酌

处。不久，问题便得到了解决。

于是在今天的工资袋里，下乡知识青年们在乡下务农的那一段时间便有了工龄补贴。

80 时代中期，坐在轮椅上的邓朴方致力于残疾人的福利事业，他几次找胡子昂洽谈此事。子老对残疾人怀着深深的同情和爱意，一次从全国工商联的互助资金中拿出 100 万，交给了邓朴方，解决了全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中的大问题。

作为发起人之一，胡子昂等全国著名 10 老人一齐上书中央，提出了开发黄山，把黄山办成世界公园的著名建议，极大地推动了祖国旅游业的发展。

和全国农工民主党主席季方一起，在全国人大等会议上提出扶持中医事业，开发祖国中草药的著名提案，并获通过。同仁堂是直接的受益者之一，那里的老职工们至今谈起子老，言词中仍饱含着浓浓的爱戴、眷恋之情……

胡子昂一生崇尚俭朴，廉洁自律，洁身自好。

1983 年，全国工商联有个代表团访问港澳工商界。参加代表团的都是内地工商界著名人士，胡子昂是团长。港澳工商界提供了热情招待。代表团成员都在港澳有很多朋友，纷纷送礼。胡子昂规定，任何团员不准收受礼物，包括亲友私人送的礼物在内。

当时政府规定，凡赴港澳或出国人员，回来时可带一件免税商品。全国工商联代表团成员归来时，却没有带一件免税商品，使海关人员惊讶不已。政府还发给了一笔外汇，作为特需费。到港澳后，这笔外汇也没有花出去，按照子老吩咐，归来后原封不动上交国库。

当年重庆朋友的子侄辈们，已有不少人都功成名就了，在海内外主持着相当规模的事业。每次见面，总有人要送给他这样那样的东西，他都婉言谢绝了。

如果他稍微松点口，港澳方面送给他的名车大概都可以装备一个车队了。仅有一次是个例外，他接受了香港方面送给他的两辆奔驰，转交给工商联了。因为全国工商联的交通工具太紧张了。

与子老高昂的工作热情相映衬的，是他个人生活崇尚恬淡，节俭随意。他的一块手表用了几十年，一修再修，始终没有舍得丢掉。直到 80 年代中期，他家的电视，仅有一台 14 吋的，还是黑白的。许多人劝他换换装备，他总是笑着说：“能看个新闻就行了。”后来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静仁来看他，见到他的电视，说：“你这里人来客往的，这台电视实在是损您的形象，也不利于国家形象的宣传，还是换一台吧。”不由分说，便让人把全国政协会议室的一台即将换代的 18 吋彩电搬来，换走了他的那台黑白电视机。

1991 年 11 月 19 日，胡子昂，这位著名的实业家、政治活动家、爱国老人，终于走完了他将近一个世纪的风雨人生。

胡子昂在久病之中曾表示：死后丧事从简，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遗体献给医学部门……

正是这最后的高风亮节，完成了他生命绝唱中的最后一个音符。

